

庞进文集第三卷

# 西安宝马彩票案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 内容简介

2004年3月，古城西安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西安宝马彩票案”。本书以详实的资料、深入的调查、全面的析理和章回小说的结构、精当生动的语言，对该案作了全景式的追踪、揭槩、讲述。阅读本书，读者不光能了解该案的来龙去脉、波澜起伏，还能随着作者的目光、思维、笔逐，对该案背后的精神动因、文化心理、国民品性等作进一步的审察和思考。



作者简介：庞进 作家、龙凤文化研究专家。1956 年生于陕西临潼。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http://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1979 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婆》《龙情凤韵》等著作三十多种，获首届中国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微信号：  
pang\_jin

# 世界色彩案例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庞进文集第三卷

# 西安宝马彩票案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Western Ontario Press Inc.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

119 Chateau Crescent, Cambridge Ontario N3H 5S3 Canada

Tel: 001-416-729-4381

Email: wopressbook@gmail.com

2023年7月第1版

开本: 300mm x 240mm

字数: 170千字

书号: ISBN 978-1-988641-55-3

定价: \$38: 00



# 目录

第一波	开售彩票	起潮卷浪热古城	
	中得宝马	披红戴花喜刘亮	1
第二波	当头一棒	假彩票堂皇露脸	
	拼命三郎	真楞娃登高明志	7
第三波	言之凿凿	杨永明以攻为守	
	信誓旦旦	贾安庆拿头担保	16
第四波	针锋相对	农家召开记者会	
	疑愤交加	平民举起法制旗	23
第五波	媒体曝光	百姓眼中有天平	
	众人指陈	麒麟皮下藏马脚	31
第六波	央视调查	承包商面目暴露	
	镜头直击	孙承贵人间蒸发	37
第七波	拘留杨氏	涉案者落入法网	
	追加被告	刘家人有望胜诉	50
第八波	调包出错	刘亮幸运从天降	
	杨氏上任	体彩黑幕由兹始	61
第九波	舆论质疑	块垒积聚待疏解	
	上级查处	官员落马丢乌纱	68
第十波	董萍懵懂	不知其懂些什么	
	公证不公	何以公信于天下	77
第十一波	威海就擒	孙承贵写书悔过	
	陕北作秀	杨永明建校买名	85
第十二波	角色分析	看杨氏何许人也	
	关系排列	知官员权倾谁家	93
第十三波	央视追踪	巨额奖金归何方	
	省长发话	设立专案查到底	101

第十四波	案情再突破 托儿王军落网 公证又露丑 开奖细则出台·····	107
第十五波	五嫌犯被捕 做案手段曝光 四托儿在逃 收网之日可期·····	114
第十六波	案中案 黄四清制造假彩票 骗连骗 孙承贵索贿中奖者·····	119
第十七波	兴高采烈 刘亮领回宝马车 扬眉吐气 小院再开记者会·····	125
第十八波	六大员被铐 刘家罢打官司 百余人涉案 陕西深挖蛀虫·····	133
第十九波	卖掉宝马 开心刘亮飞北京 感谢媒体 鲜亮锦旗送报社·····	138
第二十波	揭黑幕 贾安庆受贿十三万 查省彩 舞弊者再现十余人·····	148
第二一波	现场森严 彩民重抽宝马车 前途光明 刘亮接踵好事来·····	156
后记·····		166

## 第一波

### 开售彩票 起潮卷浪热古城 中得宝马 披红戴花喜刘亮

“我中大奖了!?”当“草花K”的图样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时,小伙子竟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揉揉眼睛看仔细了——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草花K!小伙子的心房怦怦跳,惊喜得合不拢嘴,不禁手一扬,剩余未刮的四张彩票全飞了——有这张“草花K”就够了!

小伙子姓刘,名亮,小名亮亮,生于1986年11月7日,生肖属虎,家住西安市灞桥区洪庆镇街子村,摸奖时的身份是本市东郊纺织城某超市的保安员。

这一天是公元2004年3月23日。



图一 1 2004年3月20日,陕西省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活动在西安市东大街开锣。(资料图片)

这次即开型体育彩票（简称“体彩”），是三天前，即 2004 年 3 月 20 日，上午 8 点 58 分启售的。主办方选择这么一个时刻开锣，让人联想到“发，吾发”和“发，勿发”的谐音。是的，彩票售卖，虽说属造福社会的有“微笑的纳税女神”“无痛的税收”之称的公益事业，但也是一个吸引人“撞大运”的、带有赌博意味的事情——永远都是许许多多想发财的人，成全极少数能发财的人，永远都是“勿发”大于“吾发”。

这是陕西彩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即开型实物奖体彩。最初的报道是这样介绍其奖品构成的：十五辆宝马轿车、一百六十五辆奇瑞系列轿车、三千台纯平彩电。头奖共设十五个，奖品为宝马轿车加十二万元现金，总价值达六千万元。按主办方的宣传，由于每四百万元设一个奖组，中奖率将高达 10%。彩票每张贰元，图案为扑克牌，谁有幸刮中其中的“草花 K”，谁就能成为轿车的主人。

体彩大卖场设在西安市民乐园十字东北角属东新街管辖的空地上，和人们在全国各地看到的场面类同，筑台搭门，横幅高挂，锣鼓喧天，彩旗飘扬，高音大喇叭将广告词、鼓动语和进行曲轮番播放，似乎人家在全心全意地为你着想、帮着你发财，你若不买，就把人家的一腔好意辜负了似的。而那摆放在红地毯上的一百八十辆崭新的轿车，也流光溢彩，似乎在向彩民们飞着媚眼，说：快去买吧，快去买吧，你看那标语上写的啥：“彩票刮刮刮，轿车开回家”“中得宝马，潇洒人生”“收获在奉献之后，利己在利国之中”嘛！

对主办方的大力鼓动，彩民们报以热烈的回应。尽管细雨绵绵，卖场内外回荡着嗖嗖的凉意，购买者依然称得上踊跃。

如果开彩的第一天，就有人摸中了头等奖，对主办方而言，可谓“开门红”；对购彩者也有“强心剂”的作用。这样的好事落在了一位名叫“杨小兵”的四川籍小伙子身上。“杨小兵”告诉到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工，经常购买彩票，但从来没有中过奖，这次本来打算花一千五百元买彩票，没想到只用了近一千元就中了头奖。还说他领到宝马后就返回四川老家，不再外出打工了。不过，有记者发现，一般人中个彩电，都高兴得合不拢嘴，而这位“杨小兵”，不知为何，脸上竟没有多少笑容。

除这个“杨小兵”外，还有四位幸运者，他们分别摸中了奇瑞“东方之子”轿车一辆、奇瑞 QQ 轿车三辆。主办方向媒体公布，说即开体彩首日的销售情况

“非常火爆”，销售额已超过二百万元。并再三说明，还有一百七十五辆轿车在等待幸运的中奖者，其中宝马车十四辆。

第二天，即3月21日，雨过天晴，人们摸奖的热情更见高涨。上午10时40分，自己驾车到西安旅游的重庆人代先生，刮中了一张“草花K”，将一辆“奇瑞风云”揽到怀中。几十分钟后，一位自称来自汉中某乡村，到西安走亲戚的名叫刘小莉的女士，摸中了宝马轿车外加十二万元的头奖。当主持人宣布这个喜讯时，这位看上去有几分朴实，又有几分富态的农家妇女双手直拍，高兴得又蹦又跳！她说自己原本是冲着彩电来的，没想到竟然中了宝马！接下来，便是胸戴大红花，巡游西安城，这位被众彩民争相“一睹芳容”的刘女士，着实洋洋火火地风光了一把。

中午时分，出奖进入高峰时段，每小时售出的彩票达四十万张，平均每小时就有四辆轿车被人刮出，敲锣打鼓的送奖宣传车已经搞不清该跟着谁走了，登台领彩电、领现金者络绎不绝，不计其数。截至当天下午6时，即开体彩销售总额已突破一千万元，三十辆小轿车、五百零九台纯平彩电花儿有主。“每个售彩棚都新增了小奖兑奖处，总计有二三十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解决小奖兑付问题。”

“由于出奖频率太快，卖彩票的销售员没有零钱给彩民兑小奖，就干脆整本出售彩票，以图多快好省。许多彩民举着钱挤不到跟前，或者兑不到奖，回头看着台上领奖的人，忍不住抱怨个不停。”当地的《华商报》（2004/03/23）如是报道，其标题之一则是：“即开体彩‘卖疯了’”。

刘亮是8点多下了夜班后，于23日上午9点左右来到售彩现场的，他掏出六十多块钱购买彩票。由于还中了些可以再获得数张彩票的奖励票，最后落到手中的彩票总共有三十多张。他用指甲一张一张地刮这些彩票，刮到最后五张时，刮到了那张“草花K”。

起初他对自己的幸运有些怀疑，一时拿不定主意，想了想，就拨通了跑出租的堂哥刘超的电话，告诉堂哥刮到“草花K”的消息，让其开车过来。刘超起初不相信，说你别开玩笑，我正忙着呢。急得刘亮赌咒发誓一番，刘超才信了。他让刘亮不要着急，等他过来后，再一起处理。

上午10点半左右，刘超匆匆赶到现场，刘亮让他看了看那张“草花K”。然后，兄弟俩一起走向兑奖台。在台子上等了一会儿，11点40分，主持人宣布由

刘亮进行第二次抽奖。这个时候第三组的奖项还剩下四个信封，分别是：1、2、9、10号，没有怎么犹豫，刘亮就选择了第9号信封。——之所以选“9”，是因为刘亮忽然想到昨晚和几位同事打牌时，一把牌里曾出现过三个“9”。

信封很大，是常见的用黄灰色的牛皮纸做的那种。当着刘亮、体彩工作人员和众多彩民的面，公证人员拆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白色的纸条，打开来，只见上面写着：“恭喜你中了宝马+12万”。刹那间，刘亮兴奋得气都有些喘不过来了。

公证人员当即宣布：“恭喜你中宝马325，外加十二万元现金！”

这时，两个工作人员走上前来，为刘亮披戴上了红花——那花比刘亮的头还大，穿黑制服的刘亮笑容满面地走到宝马车边，四周是无数双兴奋、羡慕，甚至嫉妒的眼睛。



图一 2 刘亮中奖（资料图片）

个头高挑的女主持人不失时机地进行“造势”渲染，尽管有点前言不搭后语：“朋友们，第三辆宝马要开走了，保安公司的一名年轻的小保安。小伙子，刘亮，看你走的都是背着手走了，醉翁之意不在酒，酒不醉人宝马醉，他已经醉了，他已经喝高了，高大了去了，有没有女朋友了？”

刘亮脸红红地答：“没有。”

主持人老练地指导了一句：“晚一点找。”

午后1点左右，媒体记者们赶到现场，对获奖者及宝马车进行拍摄。一时闪光灯亮个不停。随后，现场一位负责人安排刘亮坐在宝马车第一排副驾驶的位置上，让一位丰盈标致、长发飘飘的礼仪小姐站在车中央，继续由媒体拍照。当时现场围满了看稀奇的彩民，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幸运儿长得是个啥模样，有的还想摸一下宝马车，沾点喜幸气。

随后，宝马香车载着刘亮离开了摇奖现场，开始巡游西安市各大街，为本次体彩做宣传。一路上，笑逐颜开的刘亮频频向路人招手，神气得像电视里的演艺界明星。



图一 3 刘亮坐在开出的宝马车上（资料图片）

刘亮一行先到位于西安高新开发区的宝马公司汽车销售处。在这里，体彩中心工作人员杨永明将“第一个中大奖”的杨小兵介绍给他。刘亮兴冲冲地问杨小兵打算怎么处理宝马车，杨小兵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做声。这让刘亮多少有些奇怪：这人咋了？重了大奖一点都不兴奋？——宝马公司的工作人员事后表示，他们当时也都有同感：和刘亮的兴奋形成显明的对比，杨小兵、刘小莉来领奖时，脸上都没有什么兴奋的表情。

按照杨永明的安排，刘亮在宝马公司换上了杨小兵中的那辆白色宝马，由杨永明驾驶，刘亮仍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沿街巡游继续宣传。中途，杨小兵和杨

永明先后下车，换上一位男子继续开车巡游。一直游了好几个小时。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唐代文人孟郊中了进士后的自况诗。用这两句诗形容初中大奖的刘亮，好像也很合适。是啊，宝马车外加十二万元的奖品，不说千年之前的孟诗人无法想象，也不说未满十八岁的刘亮不曾拥有，年近半百的刘亮的父母不曾拥有，灞桥区洪庆镇街子村的乡亲们不曾拥有，就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普通公民，能拥有者也属极少数。所以，将“大喜过望”“喜从天降”“喜不自胜”“喜上眉梢”“喜形于色”“喜气洋洋”……等等成语全拿来形容此时的刘亮，都不过分。

在刘亮沿街巡游，享受无限风光的时候，刘亮的父亲刘耀利已得到了喜讯，电话是刘超打的，他让家中赶快准备三千元，用来交兑大奖需要的公证费。随后，刘超赶回灞桥，接叔父和婶母进城。下午接近4点的时候，三人携款来到兑奖现场。工作人员先是告诉他们“当事人不在，不能兑奖”；等了一阵，又告诉他们“公证人员下班了，无法公证”，“只能明天来取车”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不顺，这个小不顺，其实是和后面的大不顺连在一起的。刘耀利有点预感，但没有朝更多的方面去想，他用“好事多磨”的成语来安慰自己，全家人依然沉浸在中大奖的兴奋和喜悦之中。

晚上，回到家中的刘亮接受闻讯而来的亲友、乡邻们的祝贺，刘家除用香烟、糖果招待外，还把一些亲友带到了街上的饭馆。席间，大家纷纷举杯庆祝，有的说刘亮手气好，有的说刘亮父母以后可以享福了，有的说可以用这笔钱投资办企业，有的说来刘家说媒的人要脚后跟撵着脚后跟了……很快，全村人都知道刘亮在城里中了宝马大奖，刘家人的耳朵里，灌满了好听的话。

入夜，客人们告辞后，躺在床上的刘亮翻来复去不能入睡，白天的情景老在眼前晃悠：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呢？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人说“天上掉馅饼”，这可不是几毛钱的馅饼，这是几十万元的宝马呀！这几十万元，要是一张一张地数，得数多长时间啊？……天快明时，他真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把宝马车开回了灞桥区，开回了洪庆镇，开回了街子村，开到了自己的家门口，远远近近的乡亲们都来观看，父亲买了一盘长鞭，亲自用烟头点燃，噼哩叭啦，噼哩叭啦，噼哩叭啦……

## 第二波

当头一棒 假彩票堂皇露脸

拼命三郎 真楞娃登高明志

2004年3月24日上午，在应付了一拨前来贺喜并要求刘家“意思意思”的乡亲们后，刘亮和父亲刘耀利乘刘超的车去领奖。半路上，刘超的手机响了，是体彩中心打来的，说十二张中奖的“草花K”中出现一张假票，让刘亮就不用过来了，等事情查清后再说。

假票？竟然出现了假票！刘家人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满腹疑惑地赶到领奖现场，体彩中心那位叫杨永明的工作人员明确地告诉他们，刘亮所持的兑奖彩票可能是假票，要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真所谓当头一棒，刘家人有些懵了：怎么会是假票呢？就是这张票，昨天，刘亮戴红花，上奖台，乘宝马，登报纸，上电视，弄得漫天下人都知道，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假的呢？他们问杨永明：“昨天还是真的，今天怎么就假了呢？”杨永明说：“我咋知道呢，反正这张票多半是假的。”再问：“真假由谁说了算？”杨永明说：“得经过有关部门的检验。”再问：“如果是假的，对刘亮有啥说法？”杨永明说：“如果是假票，刘亮将涉嫌造假，那就是刑事犯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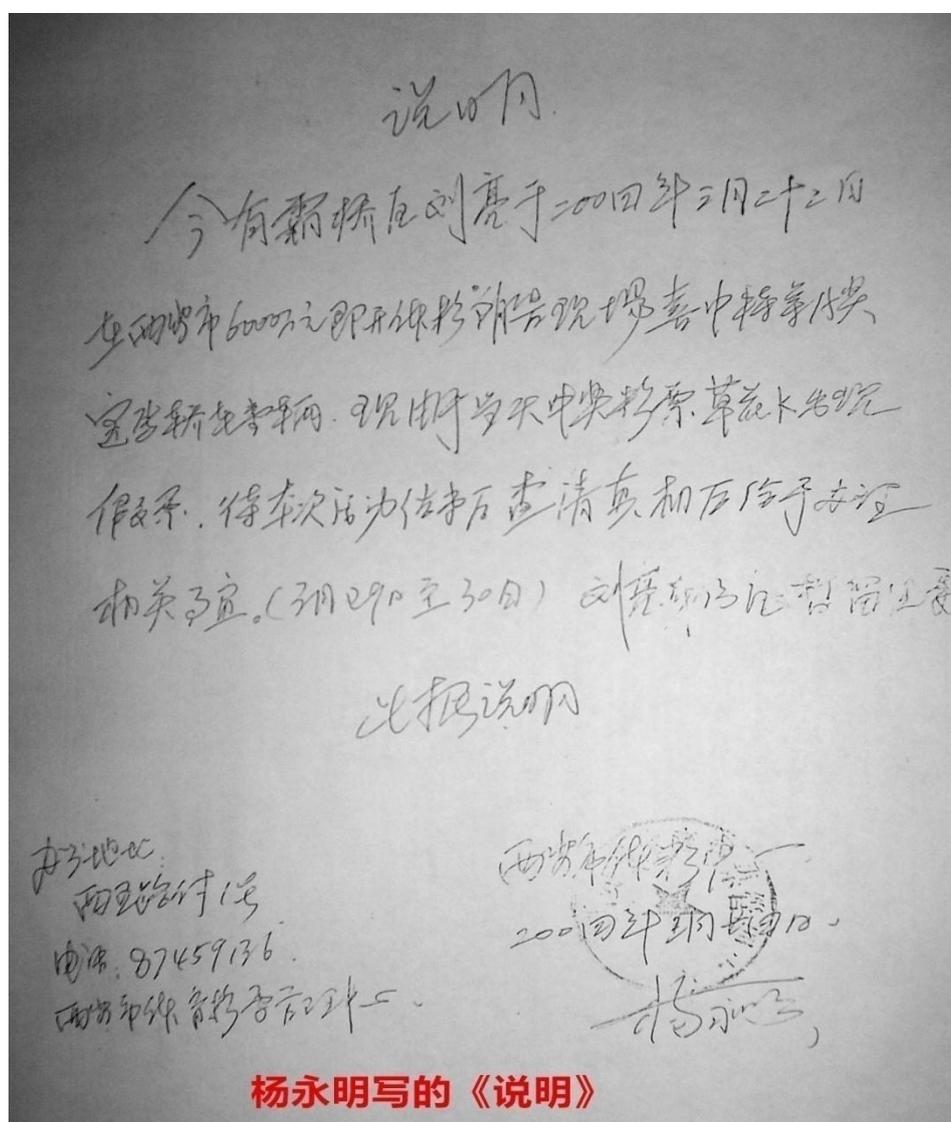
这样的说辞让刘家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事情若不弄清楚，奖品得不到且不说，刘亮还有可能成为一名“罪犯”！

看来得和这个姓杨的“理论”一番了。刘耀利气愤地质问道：“既然昨天有十二个人中了草花K，那你凭什么断定那张假票就是刘亮的？你既然认为刘亮的彩票是假的，那你为什么当时不把票封了，还要开奖？还要巡游？还要让报纸朝出登？让电视台朝出放……”杨永明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就再三劝刘家人先回去。刘耀利说：“你叫我回去可以，但你必须给我写个东西，盖上你们体彩中心的章子。”

没想到刘家人如此“不好惹”，无奈之下，杨永明只好提笔写了如下的说明

“今有灞桥区刘亮于 2004 年 3 月 23 日在西安市 6000 万即开体彩销售现场喜中特等 A 奖宝马轿车壹辆，现由于当天中奖彩票草花 K 出现假票，待本次活动查清真相后给予办理相关事宜。（3 月 29 日至 3 月 30 日），刘亮的身份证暂留组委会。”

写好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加盖了西安市体彩中心的红印章。后又在刘耀利的要求下，添写了体彩中心的办公地址和电话号码。



杨永明写的《说明》

图 2 1 杨永明写的《说明》（资料图片）

返回的路上，刘亮怎么也想不通：“我的彩票都验了三次，怎么会是假票？！”  
“我记得很清楚，首先是保安旁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看了我的票，然后上台；后来拐角处一个工作人员又看了我的彩票，最后在兑奖登记处几个工作人员再次看了我的彩票，下来还经过了二次抽奖、公证员确认，这才宣布我中奖的呀。”

接下来，刘亮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见人就说：“咋会是假票呢？咋会是假票呢？我摸的真是草花K呀！我摸的真是草花K呀！……”用刘亮的大伯刘志涛先生的话说：“当时娃都神经了，看着让人心酸。”



图二 2 刘亮爬上广告牌架（资料图片）

第二天，即3月25日，上午，刘亮和父母及叔叔李安民（刘耀利的朋友）等家人先来到体彩大卖场，不见杨永明的人影，找到西安市体彩中心，见到一位负责人，该负责人先说他不清楚，后借故走开。无奈，等到下午，刘家人又来到体彩大卖场，终于见到了市体彩中心主任樊宏。这位樊主任把刘家人叫到授奖台西北角——那里喇叭声小些，然后毫不客气地指着刘亮道：“你的彩票百分之百是假的，用肉眼看都是假的，你是拿着假彩票诈骗国家六十万来了！”



广告牌架上的刘亮20040323

图二 3 广告牌架上的刘亮（资料图片）

一听这话，刘家人顿时气愤难已。刘耀利质问樊宏：“既然是假的，你们当时就应该把他扣起来，为啥还要公证？为啥还要开奖？你们都是吃醋的？眼睛都

瞎了？”刘亮则二话不说，直奔耸立在体彩现场一边的巨型广告牌架。那牌架用三角铁焊成，高达六七米，刘亮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三脚两把地爬到了牌架的顶端，坐在两根并排延伸的三角铁上——刘亮在保安学校学习、训练过，爬墙攀高是保安员的基本功之一。

刘亮的举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所以很快就被彩民们认出：“那不是中了大奖的刘亮吗？咋爬到高牌上去了？”有知情者马上说：“咳，你不知道？中奖不算数了，小伙子八成要被人黑了！”有人感叹：“把个老实娃逼上绝路了……”也有人调侃：“这下有戏看了，小伙子要成新闻人物了。”也有人赞赏：“好，很好，小伙子有种！中国的事情，就怕你闹不大……”

身穿迷彩服的刘亮是引人注目的，很快，四面八方的人聚拢而来，东新街和解放路的交叉口人头攒动，已经围得有些水泄不通了。这时，高架上的刘亮开始指着广告牌上悬挂的中奖公布单，向站在地面上的数万人众呼喊了——

“看！上面的刘亮就是我，报纸上也都登了，现在还不给我车！”

“他们让我准备三千块钱的公证费，回头又说彩票是假的，他们在欺负我！”

“我没造假，他们冤枉我！”

“这是个大骗局，我要我的宝马！”

“不给宝马，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

他喊得声嘶力竭，他喊得慷慨悲壮，他喊得震天动地！喊着喊着，他哭了，嚎啕大哭！哭得满场动容，哭得众人揪心！

街上的巡警赶来了，附近派出所的民警也赶来了。面对突发事件，民警们负起了疏散围观群众、维持现场秩序的责任——秩序有些混乱，但还未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只是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一时难以疏散。同时，做刘亮的工作，喊道：“小伙子快下来！有事好好谈。你看这广告牌摇晃不稳，上面还有高压线，地上也满是砖头石块……”情形十分危险。但不管民警们如何劝说，刘亮还是不愿下来，大喊道：“你们要上来，我马上跳下去！”

——十多天后，当中央电视台记者问刘亮“你当时真的要跳吗？”时，刘亮回答说，“我跳，我就敢跳这一下，为啥？我家里还有一个哥哥，我跳下去也没啥，对不对？我想的就是这样，我跳下去是无所谓的事，我以命证明了我的清

白，证明我没有造假，没有以假彩票来诈骗国家的钱财。”

劝，无效；上去救吧，又怕刘亮真的朝下跳。僵持了一阵，民警们想出了办法，他们请来了还在和组委会交涉的刘亮的家人。

刘亮的家人见状非常焦急，呼叫不止。刘亮父亲的朋友李安民则一步一步地接近广告牌，开始朝上爬。刘亮见状，喊道：“李叔你上来，你上来我就跳呀！”李安民说：“等我一下嘛，听我说几句话。让我再近一点，远了你听不见。”说着，又爬了两道。然后大声道：“刘亮你听我说，家里还有你七八十岁的奶奶，对不对？为这个宝马咱值不值？你今年还不到十八岁，前途还远着哩，对不对？这个宝马能值多少钱？生命可是无价的呀！”

这些话看来是起到了作用。刘亮的情绪渐渐平缓。5点10分左右，刘亮终于答应从广告牌架上下来，两个警察上前去扶他。看着他双脚落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随后，刘亮上了110警车，被带到新城区公安分局问话。许多彩民随车而来，聚集在分局的铁门之外。一些群众还借机进了院子，其中一个穿胶鞋的小伙子为刘亮喊冤，结果被两名干警控制，扭进巡警值班室。一个多小时后，干警们对刘亮的问话结束，刘亮同家人安全回家。

刘亮的爬广告牌之举，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当众喊出了自己的冤屈，毫不妥协地表达了对邪恶的反抗，显示了处于弱势群体中的一个“老实人”渴望公正的力量；它制造了一桩非常抢眼的新闻，吸引了传媒和公众的注意力，从而推动了整个案情向少数人控制不了的方向发展；它还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人们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思考的蓝本——

北京《现代商报》（2004/06/11）的记者苏文洋和李海，将刘亮和潘冬子、小兵张嘎、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赖宁等“少年英雄”相并列，称“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个英雄少年的名字，正在亿万中国人民口中传诵——”，“苍天在上，彩民在下，一声呐喊，一阵惊雷，中国体彩业的黑幕从此撕开，中国公证业的面纱从此揭开！”“少年刘亮勇敢地攀上高高的广告牌，向黑暗的即开足彩、虚伪的体彩公证发出抗争，他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代表的是最广大彩民的利益，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坚定的实践者。”“我们向在市场经济时代涌

现出的少年英雄刘亮致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少年英雄，刘亮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少年英雄。他撕开了中国体彩业的惊天黑洞，由此改变了中国体彩业的游戏规则。人们有理由相信，当后人书写新中国彩票史的时候，少年英雄刘亮的壮举无疑将是最为抢眼的一页。……少年英雄刘亮以大无畏的精神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时代。”

文中提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2000 年 2 月 25 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的，具体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探求”（2004/06/02）评论频道的作者大林认为《刘亮是另一种榜样》：“我们的社会正在飞速前进，我们国家文明的领地正在与日俱增。前进中免不了沉渣泛起，文明也总是迎着邪恶的挑战成长壮大。现代公民理念主张，建设社会文明最具活力的因素源自公民；沉渣泛起不可怕，邪恶势力不可怕，甚至少数政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胡作非为也不可怕，只要有公民面对邪恶不畏惧、不言败的精神，每一起恶性事件都会还公道于受害者，每一例丑闻都将以造丑者被钉上耻辱柱而告终，社会文明向善的总体趋势无人可以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亮通过宝马案表现的抗争精神，使他无愧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榜样。”刘亮精神有这样几个闪光点：“面对不白之冤，绝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不平则鸣，诉告于天下。……正是他那一声声嘶力竭的‘他们在欺负我！’，吸引了包括中央主要媒体的关注，刺激了社会公正的警觉，由此才撕开一方彩票发行长期造假黑幕的一角。他的及时反应没有给那些‘以人格担保’‘以人头担保’的真正造假者留下充裕的时间施展阴谋诡计，让他们游刃有余地摆平方方面面。”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的记者张凯华事后谈及刘亮：“我们的镜头曾经捕捉到刘亮这个十七岁的大男孩非常纯真和质朴的细节……谁也没有想到，面对冤屈，刘亮不假思索地爬到了广告牌上，此举打乱了造假者的所有布署以及可能预想的协商解决。作为一个最无权无势的人，刘亮凭血性和勇气改变了这一切。在新浪、搜狐、新华网、央视国际数万条评论中，有一个帖子这样说：建议把刘亮评为本年度十大杰出青年之首和五十年来感动中国人物。刘亮的故事教育了很多人：弱势并不等于渺小。”

士心先生则《从“刘亮案”反思“跳楼秀”》（“新华网”2004/06/11）指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大喜大悲，使刘亮做出了惊人之举。”“这一幕对不少人来说都似曾相识。近年来有不少农民工因讨要工钱不果，只好爬到高处，以死相威胁。这种行为还被起了个怪名：跳楼秀。这个名称的潜台词是，想跳楼的人并不是真的想死，而只是‘作秀’而已。‘作秀’就是有虚假的成分，自然不会博得同情。更令人惊奇的是，有的地方还专门为此出台规定，凡上演‘跳楼秀’的，要以扰乱治安等罪名进行处罚。”“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感到自己受冤太深，刘亮是不会轻易爬上那么高的地方以死来逼还公道的。毕竟，痛失宝马已够人心智失衡的了，被毁损人格更是考验一个人生存的勇气。刘亮肯定也并不要真的去死，但是出演了‘跳楼秀’这一幕，如果仍然没有讨回公道，他能否继续很好地生存，还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当然，我们并不提倡用跳楼等极端方式来讨回公道、维护自身的权益。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政府部门，面对这样的事情，首先应当想到有必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问题。更应当举一反三，认真想一想，我们还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防止再出现这种人们不愿见到的场面，而不是讥笑他们没有真死的勇气，用这个‘秀’那个‘秀’来进行嘲笑。如果他们不是‘作秀’，是真的要去以死抗争，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社会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感到寝食难安。古语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谁也不想让这种情况出现，谁都应当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刘亮的举动，使笔者想到了“关中楞娃”或“陕西楞娃”这样的称谓。

“楞”字的本义是有棱有角的“四方木”。的确，关中人或陕西人，从外表到内涵，给人的印象和感觉，往往是敦厚、淳朴、实在，多少有点粗犷，且棱角分明。

“楞”字有“凶狠”“横蛮”等意思，这是贬义词。褒义的说法是“倔强”“较真”“坚毅”；不褒不贬的说法是“执拗”“认死理”“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刘亮后来到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栏目当嘉宾，主持人崔永元说刘亮的性格很“轴”，这个“轴”是北京方言，其意思便是“执拗”。而那期节目的名字叫《犟犟犟》，“犟”，也是“执拗”“固执”“不服劝导”的意思。

“楞”字还有“鲁莽”“冒失”“二杆子”（就有媒体报道刘亮爬广告牌是

“情绪失控”“行为过激”)等意思,这还是贬义词。褒义的说法是“开拓”“创新”“奋勇”“果决”“胆大”“不怕死”“不畏难”“无所惧”“敢为天下先”。

从后一个意思出发,有人将“楞娃”又称“冷娃”,“冷”者,“冷酷”“峻烈”“意外”——“冷不防”也!

刘亮的作为,让世人再一次领略了“陕西楞娃”的风采!

刘亮爬广告牌的一个多月之后,西安市公安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妥善处理以攀爬设施的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通知》。《通知》指出,一段时期以来,个别人为解决民事纠纷攀爬供电、通讯、水塔等公共设施及其它民用高大建筑物,扬言自杀,要挟他人。这种行为造成不良影响,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通知》规定,对这样的行为,公安机关除及时实施营救外,还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没有人站出来说,这个《通知》的出台与刘亮爬广告牌事件有关。但是,不难设想,如果《通知》出台在前,刘亮爬广告牌在后,那么,迎接刘亮的,就有可能是另一种局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对“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的”……要进行处罚;处罚分为“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拘留”的最长时间可达十五天。

幸运都意味着一个机会,而任何机会,都意味着一个恰当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幸运之神还是蛮眷顾刘亮的。

### 第三波

言之凿凿 杨永明以攻为守

信誓旦旦 贾安庆拿头担保

在刘亮爬广告牌的当晚，也即 2004 年 3 月 25 日晚 10 点半左右，西安市体彩中心就此事向媒体做情况说明，言：23 日销售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在核对奖票时，发现刘亮所持的中奖彩票刮开区密码与设定奖项的密码不符。24 日，体彩中心曾通知刘亮本人，刘亮当时讲要商量一下。25 日下午 4 时许，刘亮及其家人来到体彩销售现场，要求将车开走并以爬到广告牌上相威胁，引来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后来在值勤民警和现场保安人员的劝说下，刘亮才从广告架上下来。



图三 1 陕西省体彩中心官员公布假彩票（资料图片）

代表西安市体彩中心发言的是其负责人樊宏，这位樊主任明确表示：体育彩票以诚信为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们会认真负责地维护彩民的正当权益；同时，对那些伪造，涂改彩票以获取不当利益的不法之徒，将依法追究。“此事已引起省市体彩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省体彩中心正以最快的速度将有问题的彩票送呈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进行鉴定，很快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第二天，结果出来了。3月26日下午3时，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召开新闻通气会。会上，该中心的副主任张永民手举由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传回的《真伪查询表》，宣布刘亮用来兑奖的“草花K”是假彩票，其真实面目是“草花2”。



图三 2 假彩票“草花K”（资料图片）

张永民说：本次即开体彩只设立了一百八十个特等奖，即一百八十辆小轿车，但根据已中出的奖数和剩下的奖数，再算上当天中出的这辆宝马，总数成了一百八十一个？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出了假票。经过仔细鉴别，这张中奖者留下的彩票有较明显的挖补拼贴痕迹，有人将“草花”图案移花接木贴在了一张有字母“K”的彩票上。而且按中奖人所登记的编号核对，根本对不上。“那张票，用肉眼看，都百分之百是假票。”张先生还告诉记者，本次体彩销售的是2004年的新票，虽在西安属于首次面市，但此前在河北、江苏等省已销售过。即开型彩票又称“刮刮奖”，持假票兑奖的现象近年来在全国各省市屡有所见。

那么，是谁将这张“草花2”涂改成“草花K”了呢？

坐在主席台中间位置的省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明确地告诉记者：“刘亮所持的中奖彩票是假的，不管是他作假还是别人作假，他拿这张假彩票领奖，就是诈骗行为。我奉劝当事人尽快投案自首，诈骗六十万，不是个小数目。”——贾主任的话再清楚不过了，用刘亮家乡一位老者的话说，就是“硬是把一个尿盆子，扣到刘亮头上了”。另外，在另一个场合，贾安庆严肃地指出，“一些律师想出名，为刘亮辩护，最终会身败名裂的。”

这里，人们又要问了：既然是经过涂改了的假票，如何能够接连闯过三次验证的“关卡”，堂而皇之地走上兑奖台呢？

体彩销售现场的负责人杨永明接过了话筒，说：“因为下雨，光线不好，票面也受了潮，当时工作人员已发现该彩票票面不平整，有些异样，由于考虑到可能是被雨水打湿的，便让中奖人参与了二次抽奖。中奖结果宣布后，由于已看到票面有异常，并发现领奖者现场表情不太对劲，办理相关手续时极不配合，只是急着要把车开走。为稳妥起见，当天就没有让中奖者将车开走。”杨永明还说，23日，刘亮来领奖时的表情和常人中奖不一样，神色很是慌张，当时要登记电话、地址、身份证号码和本人签名，刘亮不愿留电话号码，后来虽然留了一个，却是他堂哥的手机号码。

——事后有记者将上述说法转述给刘家人。当事人刘亮很不以为然。他从裤兜里掏出了那张后来给他的那张彩票——这张废票他一直带在身上，用手指刮了刮那个“2”字，说：“这上面都压着薄膜呢，怎么会被雨淋湿？即使我把2改成了K，那下面的密码与编号，我又咋能改得和草花K上的一样呢？如果改了，为什么当时那些验票员看不出来？他们是瞎子？还有，‘即买即开，即中即兑’是你们承诺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当天提车？”对电话问题，刘亮父亲刘耀利说：“不留家里电话是因为家里经常没人，不是留了刘亮堂哥的手机了吗？”

——笔者翻阅了一下那几天的报纸，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是这样预报的：20日、21日有小雨；22日和23日是阴天——刘亮的父母则用十分肯定和语气告诉笔者，刘亮23日中奖那天，是个晴天；24日是阴转小雨。这说明杨永明所谓“因为下雨，光线不好，票面也受了潮……可能是被雨水打湿的”之说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而且，从记者们拍摄的当天售彩现场的情况，及刘亮中奖、巡游的

照片上，也看不到下雨的迹象。

穿西服、打领带、脸庞圆胖、鼻梁挺凸、眼皮成双、头发油亮的杨永明，年龄不大，却处处显示着精明、练达和温雅。他的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得还算过得去，声调不高不低，语气不紧不慢，还恰当地打着手势，显得认真、严肃而诚恳。“跟真的一样，不，比真的还更像那么回事。”一位记者事后回忆说。



图三 3 杨永明（资料图片）

而且，市体彩管理中心的樊宏主任补充说：“昨天早上他给刘亮打电话，让其前来参加今天下午这个通气会，当时是刘亮的堂哥刘超接的电话，答应说下午一两点到会。到1点多，刘亮的父亲回了一个电话，说现在家里人多走不开。会议开始后，他又给刘超打电话询问情况，刘超说他和刘亮不在一块儿，而刘亮家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听。”

对此，刘耀利告诉笔者，当天从上午到下午，家里都有记者采访。下午1点多多的时候，刘耀利接到樊宏的电话，让刘家把记者推走，赶快过来，刘家不好意思让记者们走。下午4点，记者们离开后，刘耀利叫妻子和刘亮坐刘超的车进城，到省体育局后，会已经散了。

那么，现场公证又是怎么回事呢？

也在主席台就坐的西安市新城区公证处公证员董萍解释说：“我们公证员在彩票销售现场只是负责监督整个出奖过程的真实可靠，至于彩票的真伪必须由专业人士鉴别。刘亮持彩票二次抽中特等奖后，仅做了一个登记，我们没有给他出具中奖《公证书》。”

——董萍的话半真半假。事实是当天已作出了《公证书》，只是没有交给刘亮而已。笔者后来到刘家采访时，刘亮的母亲杨敏贤拿出了这份上面盖有董萍的蓝色签名章和西安市体彩中心的大红印章的《公证书》。其内容为如下：

刘亮于2004年3月23日在西安6000万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有奖活动中摸有‘梅花K’图案奖票一张，根据西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本次中国体育彩票所设大奖产生办法，刘亮在公证员监督下参与第一组幸运抽奖活动，并在我的面前，抽出特等A奖，奖宝马325系列轿车壹辆及奖金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据此，本公证员证明，刘亮所中A等奖结果真实、有效。

有意思的是，刘亮二次领奖时，公证人员出具的还是这份盖有董萍签名章的《公证书》。也就是说，本该在中奖当天，即3月23日就应拿到的《公证书》，经过一场悲喜交加的风波，七十天后，6月4日，才到刘家人手中。

然而，刘亮所持的奖票毕竟通过了体彩工作人员的鉴定。那么，有关工作人员是否负有责任呢？身材魁梧、嗓门宏亮的省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语气肯定地说：“我们将追究这次事件中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也正是这位贾主任，第二天以毫不客气的口气，回答媒体记者对体彩中心监督环节是否健全的追问：“你是不是弱智呀，问我这样的话，我怀疑你的智商。”接着，这位副厅级干部信誓旦旦地表示：“彩票的信誉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拿生命开玩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弄虚作假，我拿我的头担保。”说这番话时，贾主任有些激动，嗓门很高，还抬起右手，做了个用枪敲头的动作。他还粗鲁地指责当地一家发行量比较大的媒体：“你们整天质疑，质疑个毬！”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说的某句话，做的某个动作，往往会成为经典。比如这位贾安庆主任“我拿头担保”的话，就注定会成为经典，成为人们谈论宝马体彩案的一个经典。

西安市六千万即开型体彩发售活动是3月25日晚上截止的，十五个“宝马+12万元”大奖只兑了四个。



图三 4 “拿头担保”的贾安庆（资料图片）

陕西省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用“发行成功”来评价这次体彩。他告诉传媒：西安市此次大规模发售即开型体育彩票，而且采取宝马做特A奖，这在近几年是第一次。这是国家恢复实物设奖后，作为全国十五个试点省市之一，这次试点发行是成功的，仅仅六天就销了一千七百多万元。这在今年试点省市中，名列前茅。他还强调：此次即开体彩的设奖也是提前报经财政厅、财政部批准的，整体出奖情况完全符合设奖规律和规定。

说的是发行六千万，结果只发了一千七百多万就不发了，其个中原因显然与假票事件有关，可贾安庆却说是另外的原因：售彩场地在闹市中心，西安市政府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一节一会”，担心交通堵塞引发其他隐患，所以只批准到3月25日。省体彩中心和西安市体育局想申请延期，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只好提前结束”。

贾安庆的说法经不起拷问：起初宣传“这是陕西彩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即开型实物奖体彩”。设置的头奖是宝马轿车加十二万元现金，而且事实上是按一天出一辆的“设置”操作的，那么，十五辆宝马出完就得十五天，怎么会“只批准到3月25日”呢？

当问及“假票事件”怎么评价时，贾安庆说：有人蓄意制假造假……这张中奖彩票经最高权威鉴定机关鉴定是假票，证据确凿，证实了体彩中心是清白的。“说实话，在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鉴定结果出来前，我心里也是在打鼓，尽管信任市局的同志，但我不敢打保票。结果出来后，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说得真好，“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事情发展到后来，果然使贾主任的这句话得到了验证。

## 第四波

### 针锋相对 农家召开记者会 疑愤交加 平民举起法制旗

将一张长方形桌抬出来，铺上白色的塑料布，摆上一瓶花；所有的高椅子低板凳都拿出来、擦干净，让来客们随便坐；买来一次性纸杯子，一一地给客人把茶倒上：一个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洪庆镇街子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院召开了。这是宝马事件的主角——刘亮家的院子，时在 2004 年 3 月 27 日 11 点到 13 点。事后，刘家人私下对媒体朋友说：“这事如果放几天前，打死我们也想象不出来。”而省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得知这件事后，轻蔑地说：“农民摆几个杯子，摆张桌子，那就叫新闻发布会？”

然而，贾大主任有所不知，这个发布会可是非同一般，它的意义已超越了此次事件本身，注定要在中国的新闻发展史、社会文明史、民族进步史上留下不可多得的、鲜亮的一笔！在当今之社会，新闻发布会稀罕吗？不稀罕。几乎天天有，到处有，可在农家庄户院召开的、由无职无权也无势的老百姓主持的、能吸引众多媒体积极参与、且为普天下老百姓关注的新闻发布会，你见过几次？

这个新闻发布会是逼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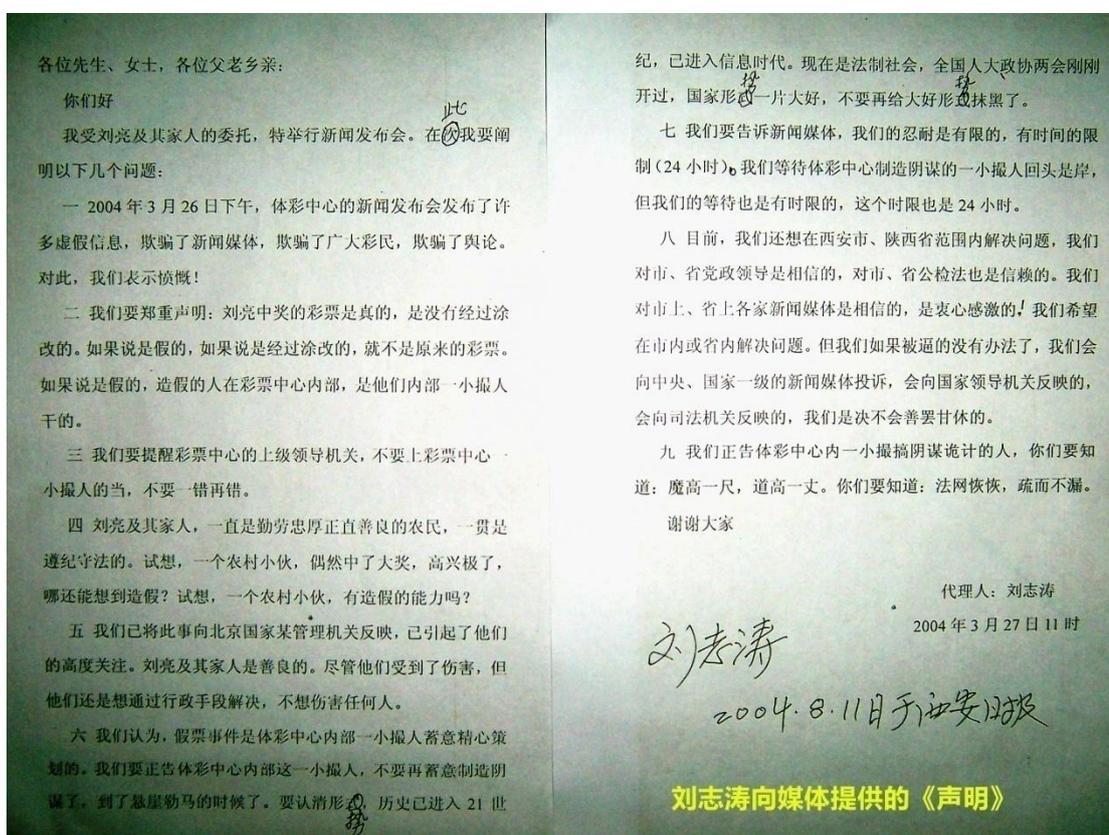
3 月 26 日下午，省市体彩中心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刘亮的中奖彩票是假的，且要承担造假的责任。从媒体朋友打来的电话中获得消息后，刘亮一家人感到非常震惊。怎么办呢？是忍气吞声，任人宰割，还是针锋相对，奋起抗击？全家人经过一夜的商讨，选择了后者。“这个脏，咱说啥也不能背！”刘亮的父亲刘耀利咬着牙说。

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点子是刘亮的伯父刘志涛提出来的，年过花甲的刘志涛是某师范学院的教授，是刘氏家族中学问最高，且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仔细地询问了刘亮中奖前后的整个过程，认为刘亮根本就没有作假的可能，于是决定接受刘亮父母的委托，全权代理此事，“一定要为刘亮讨回公道，还孩子一个清白。”

新闻发布会上，皤皤白发的刘志涛戴上了眼镜，双手捧起一份事先准备的《声

明》。针对体彩中心发布的消息，刘先生首先反驳说，那是“欺骗新闻媒体、欺骗广大彩民、欺骗舆论”的虚假信息，“我们表示愤慨！”他郑重声明：刘亮中奖的彩票是真的，是没有经过涂改的。“如果说是假的，是经过涂改的，那就不是刘亮抓到的、原来的彩票；如果说是假的，造假的人也只能在彩票中心内部。”

“贾主任以脑袋担保体彩中心没有弄虚作假，我也可以以我的人头担保，刘亮也没有弄虚作假。”“不管是谁在弄虚作假，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都将自食其果。”刘先生激动地说，“刘亮及其家人是勤劳、忠厚、正直、善良的农民，一贯遵纪守法，试想，一个憨厚老实的农村小伙，有造假的能力吗？”



图四 1 刘志涛向媒体提供的《声明》

刘志涛告诉记者，刘亮及其家人是善良的。尽管他们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他们还是想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不想伤害任何人。刘先生说，目前他们还想在西安市、陕西省范围内解决问题，但如果被逼得没有办法，他们会向中央一级的新闻媒体投诉，会向国家机关、司法部门反映。刘志涛认为，假票事件是体彩中心内部一小撮人蓄意精心策划的，他希望这些人悬崖勒马。“这是一场斗争，我

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二十四小时之内得不到说法，我们就用法律手段来要回自己的宝马，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刘志涛说，“尽管刘家家境比较困难，真的打起官司来，在物力上非常吃亏，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杀手锏’，有自己的应对之策。”

刘志涛说，刘亮现在还不满十八岁，刚刚步入社会，以后还要找对象，找工作，在社会上生存，不能因为这件事而让他担负一辈子造假的、被人唾骂“罪名”。“我们一定要将此事追究到底，决不善罢甘休，决不动摇。”



图四 2 刘亮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资料图片）

像一块陨石猛不丁从天外砸来，彩票事件一下子打乱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寻常生活。

中大奖应该说是一个人老几辈没有遇到过的大喜事，一开始，刘亮的父亲刘耀利自然是很高兴的。侄儿刘超的电话打回来，刘耀利赶忙连取带借地筹了一万多块钱。他是这么考虑的：刘超电话里不是说了吗？光公证费就得三千块，说不定还得打点呀、请客呀，所以得多带点钱。路上她还给妻子杨敏贤说，如果让咱请客的话，咱一定得大方些，不要让人家小看了咱。当他将钱和户口簿等小心



——刘耀利说儿子“刘亮从小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念的书不多，脑子里没有什么歪门邪道”，这当然是事实。但仔细一想，也多亏了这个事实：如果年龄再长些，念的书再多些，脑子再复杂些，他还能做出爬广告牌的举动吗？没有这个冲天一怒的举动，事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还真的很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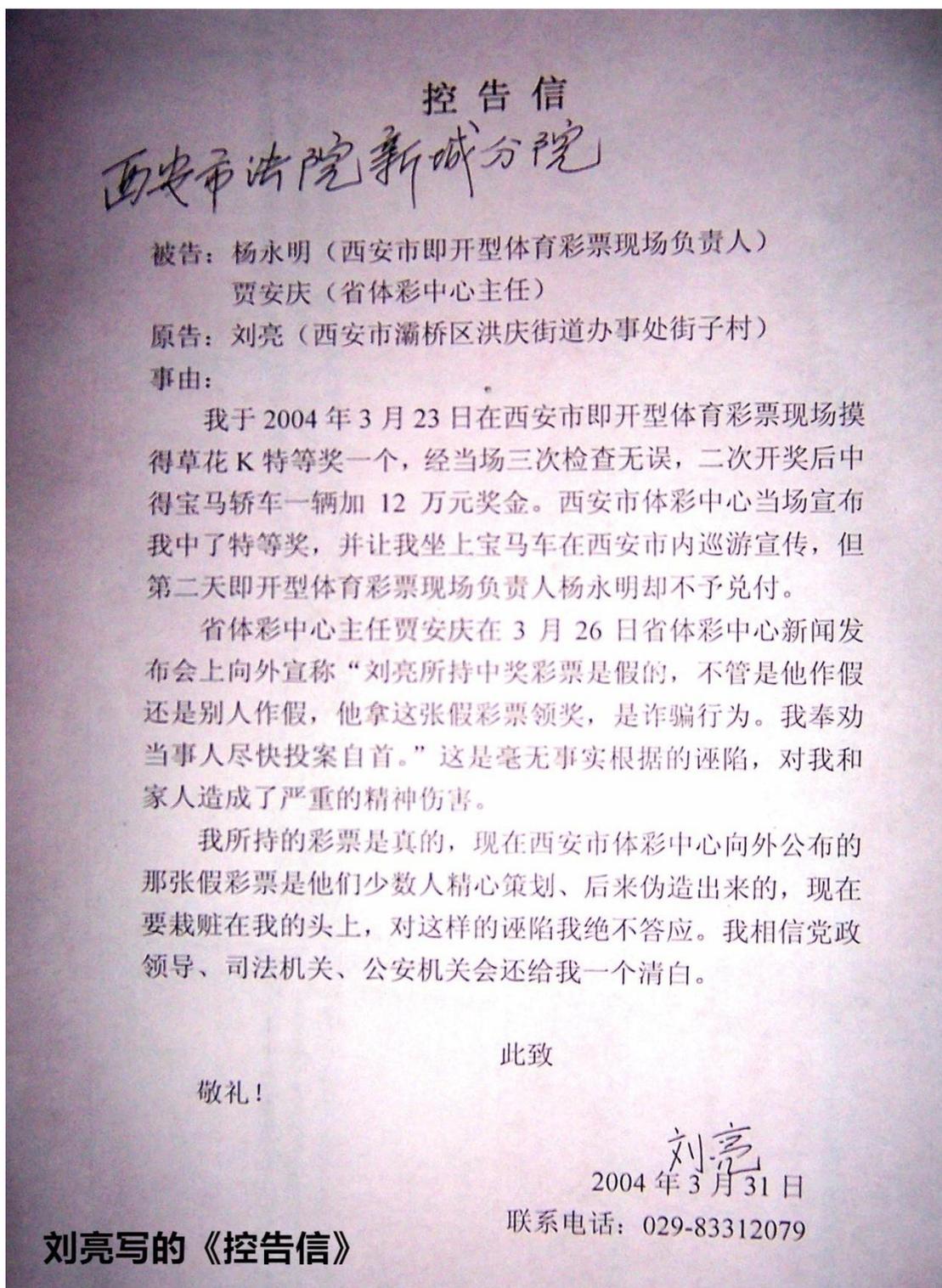
刘亮中奖的消息传开后，村镇上的乡亲们、刘耀利供职（他是被聘用的水暖工）的“二炮”干休所同事，和刘亮一块耍大的伙伴们，都要求刘家请客，“意思意思”，村里的“闲人”也露出口风，要向他家借钱；他和刘亮的母亲不敢随便迈出家门一步。一旦出去，每每都会被知道此事的人团团围住，善意的问候居多，不怀好意的嘲弄也有，有个别人甚至暗中造谣，称刘家是一个团伙造假的黑窝点。

由于兑奖的事情，抽不开身的刘亮将月薪五百二十元的保安工作也辞掉了。“家里电话不断，来人不断。没有见到车，外面不知道情况的人都以为我们把车换成现金拿回来了，可是我们不仅没有拿回一分钱，反而花了很多钱，把人烦得连觉都睡不好。早知道是这样，说啥也不让亮亮去摸什么彩票。”患有胃病，心脏也有些问题的刘耀利疲惫地对记者说。

3月25日的晚上，即刘亮爬上广告牌振臂一呼欲证清白的四个小时之后，《华商报》记者李克和王井来到街子村。他们打听到刘家，敲门十几分钟后，刘家才开门，以致于使他们曾产生“是不是这家人都跑了？”的怀疑。进屋后，他们发现，“刘亮抱着被子躺在床上，刘父刘母眉头紧锁，屋子里除了沉默，就是弥漫在空气中呛人的烟味。”

和人们见到过的许多农村妇女一样，刘亮的母亲杨敏贤是淳朴、善良、实在的，她话语不多，逻辑性也不强，而且胆小。儿子中奖她高兴，儿子爬广告牌她揪心；平日里经管一家老小的吃穿，做饭洗衣，总是从睁眼忙到天黑。如今，除了日常的家务外，还得尽心尽力地招待来客，连气带累，高血压病犯了，胸口闷得慌，手脚也有点发麻。“这些都没啥，”她擦着眼角对记者说，“就是娃难受，娃他爸难受，我也难受。我就是想不通，公家人为啥要红口白牙地胡说？为啥要诬陷我娃？”3月27日下午，新闻发布会之后，当着很多记者的面，她不禁大哭出声！哭得在场的人眼睛发潮。是啊，这事无论摊给谁，谁都会感到委屈莫名，况且，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关中农村，人们把清白的名声，往往看得很重——

有时重过生命！



图四 4 刘亮写的《控告信》

两天后，在堂哥刘超的帮助下，只有初中水平的刘亮写出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控告信。他来到街上的打印店，将控告信打印了八份，题头分别为：中共

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

这天吃罢午饭，刘亮带着这些控告信，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在父亲的陪同下，上路了。

他们先来到陕西省人民政府，走进大门旁边的接待室。刘亮从包里取出一封控告信，小心翼翼地递进窗口，却很快被推了出来。里边的人告诉他们，去那边的信访办公室吧！

父子俩来到信访办，呈上控告信，人家照样不收。说，既然写了控告信，就通过邮局寄吧，呶，这是地址、单位名称和邮政编码。

一个小时后，父子俩步行到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分局的民警认出了刘亮，笑呵呵地让他们就坐，还问他们喝不喝水。然而，当刘亮递上控告信时，民警却有点莫名其妙。笑着说：“你们报啥案？直接去法院起诉就行了。”刘亮说：“你们不是要抓我吗？”警察说：“抓你干啥呢？又没有人报案说你犯了罪！”

父子俩又步行一个小时，来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人在楼道里转了几圈儿，才找到立案办公室。一位姓顾的女士接待了他们，顾女士告诉他们，告状得一级一级来，你们得先去区法院，还得写一份正规的起诉书。“这样吧，”顾女士热心地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律师，这是他的电话，你们可以找他帮忙。”

顾女士把控告信还给刘耀利。这时候，走进来几名穿着标志服的年轻法警，他们显然都从媒体上见识过刘亮。一个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我支持你！”另一个握起拳头朝刘亮晃了晃，说：“刘亮！我们都支持你！”

从中院大楼里出来，已到了城里人快下班的时候，天上阴云密布，小雨点儿滴滴。“唉，跑了一天，人困马乏的，一份控告信也没有送出去。”刘耀利自嘲地叹了一口气。不过，也学了些门道，“看来法律这条路，也不是轻易能走的。”他对儿子说，“咱家人老几辈没有和法院打过交道，这是头一回！”

闻知刘家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陕西有十多位律师站了出来，表示“愿免费帮助刘亮”。陕西王炳森律师事务所的甘军律师给华商报社打电话，说他2001年的时候，曾代理过西北第一例彩票纠纷案。这次愿为刘亮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同许多律师的观点一样，甘律师认为，刘亮兑奖并被体彩工作人员确认，后刘亮失去了对彩票的控制，而此时体彩中心再以彩票的真伪性存在问题而不履

行兑奖义务，不能成为法律上的正当理由。他表示，必要时可由众多律师组成一个律师团来为刘亮打赢这场官司。

公元2004年4月6日，刘亮一纸诉状，把西安市体彩中心告到西安市新城区法院，要求该中心履行兑奖承诺。西安的毛家兴律师将和上海的邵鸣律师一起，共同无偿担任刘亮的代理人。

这期间，有人冒充记者和彩民来刘家打探底细，问看能不能私下了结这个事。面对这些人，刘亮及家人的主意很正，说不能，为什么呢？这牵扯到一些人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肯定有受贿行为，“我不能放纵他们，我不可能私了”，刘亮说。“私了？你就是给一百万也不行！媒体都关注着，谁敢私了？”刘耀利说。

8日，法院正式立案。

从此，西安宝马彩票案进入司法程序。

## 第五波

### 媒体曝光 百姓眼中有天平

### 众人指陈 麒麟皮下藏马脚

一石激起千层浪。宝马奖票是假票，中奖者涉嫌造假的新闻，经过各种媒体的报道，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大凡智力正常的人，都对体彩中心的说法产生了疑问：既然出现了假彩票，真彩票又在哪里？既然怀疑是假票，且涉嫌犯罪，体彩中心是否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更有细心的观众发现，体彩中心展示的《真伪查询表》竟然没有编号，也没有加盖公章，这又是什么原因？还有：到底谁在作假？谁该为假票承担责任？明知彩票有异为何张榜公布？……

通过热线电话，人们纷纷把疑问提供给媒体，敏感的记者们将一部分问题，迅捷地摊到了体彩中心负责人的面前。

对第一个问题，省体彩中心副主任张永民是这样解答的：“因为当时已销售彩票四百万张，按规定，这中间应有十二张‘草花K’。但我们发现了十三张‘草花K’，这说明其中有一张是假的。十二张真‘草花K’已全部兑奖，出现的第十三张‘草花K’，我们在4月26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已做了说明。”

张副主任的解答依然让人疑惑。道理很简单：如果“草花K”只有十二张，那么出现了一张假票，就应该还有一张真票未出现；也就是说，如果刘亮是用假票兑的奖，那么持真票兑奖的那个人又是谁呢？如果“草花K”是十三张，那就意味着真假彩票已同时出现，摸到大奖者不是十二人，而是十三人，这也就等于说，体彩中心在计划外多发出去了一个奖，而体彩中心又从未说明有这样的事实。

对第二个问题，张永民告诉记者：在3月25日中午得到鉴定结果后，西安市体育局就向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报了案。然而，截至3月27日，公安新城分局的回答是：“没有接到有关假彩票一事的报案。”为了明确此事，认真的记者又到案发地的辖区派出所——中山门派出所做了查询。该所值班人员查看记录后，明确回答：“派出所没有报案记录。”

看来，我们这位张副主任没有讲真话。

那么，西安市体彩中心的樊宏主任又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是在3月26号晚上报的案。”樊主任说。于是，记者先后询问了西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公安新城分局经侦大队和公安新城分局刑侦大队，三个单位的负责人都明确地说：“没有接到报案。”

体彩中心到底是什么时间，向哪个部门报的案呢？当记者再三追问时，樊宏先生陷入沉默，嘴唇紧抿，不再回答这个问题。

这样，人们就有理由怀疑：省市体彩中心是不愿及时报案或不敢及时报案，他们怕什么呢？

对《真伪查询表》为何无编号、未盖章的问题，张永民推给了上级，说：“这就要问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了，因为原件如此。”



图五 1 体彩发售现场的“中奖公告”（资料图片）

那么，到底谁在作假？谁该为假票承担责任？明知彩票有异为何张榜公布？

《华商报》（2004/03/27）记者华欣就这几个问题特意咨询了陕西中俊律师事务所的郜清河律师、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的毛家兴律师，和陕西王炳森律师事务所李俊英律师。

郜律师认为，刘亮第一次将彩票交给体彩中心后，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对彩票的控制和保管，而该彩票也曾被体彩中心人员检验过多次，其间彩票本身已经过多人倒手，如果是假的，不排除中途被人掉包的可能。因此如果一定认为彩票系刘亮伪造则显得不太合理，尚需相关证据支持。

郜律师进一步分析：如果彩票是假的，那么其可能产生的环节主要有三个：一是刘亮私自造假，采用伪造中奖彩票的方式骗奖；二是刘亮买到的彩票本身就是假的，即在刘亮购买之前，或者在印刷时就被别人动过手脚；三是刘亮的彩票本身是真的，只是在交给体彩主办方后被人掉包。以上三种情况都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在事实真相没有查清之前还不能妄下结论。

对于以上第一种情况，如果确实能够证明彩票是刘亮伪造的，那么无疑刘亮的行为将构成诈骗，应该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对于第二、三种情况，由于刘亮和体彩中心是一种合同关系，那么此案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谁具有过错，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即使最终彩票是假的，体彩中心也应当承担兑付义务。因为过错方并不在刘亮本人，体彩中心应该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毛律师也表示，对于彩票真实性的认定问题，举证责任应该在体彩中心一方，体彩中心必须出具刘亮有骗彩的有力证据，而刘亮本人则没有为自己举证的义务。如果司法机关最终没有认定刘亮有骗彩行为，体彩中心就应该履行兑奖的义务。

李律师认为，体彩中心没有完全确定刘亮彩票的真伪，就大张旗鼓宣传他是宝马得主，又是巡游又是张榜公布，且未阻止新闻媒体报道，确有故作声势、吸引彩民眼球的作秀之嫌。虽然此举没有构成对刘亮名誉上的侵害，但一夜之间的大起大落，确实给刘亮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她认为，体彩针对的是众多彩民，尤其应将诚实信用放在首位。否则，既会破坏体彩中心的信誉，也会对彩民感情产生伤害，同时也不利于体彩事业的发展。

郜律师还对体彩中心未及时通报公安机关提出了看法：体彩中心在事发时没有对突发事件采取适当、有效的应急措施，处理方式也存在不妥之处，许多地方不符合法律程序。按照正常情况，如果当时发现彩票有伪造嫌疑，应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立即当着双方当事人面，对彩票进行封存，同时双方还应签字证明；二是在现场公证人员的公证下，对彩票进行证据保全，以便以后司法程序之用，而且这张彩票也始终不应脱离当事人双方的视线。……我国以前出现过的伪

造假彩票兑奖的案例，基本都是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得到处理的，如果体彩中心怀疑刘亮骗奖的话，最适当的做法是将其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上述之外，西安市一位法官还以普通读者的身份给三秦都市报社打电话，提出疑问：为什么刘亮的中奖彩票在中奖当时没有核对密码，而在当天销售结束后才核对密码？刘亮中奖后的公证费问题不合情理，刘亮的公证费用完全可以从中奖金额中扣除，而没有必要从家里拿钱；刘亮中奖后，彩票交给了体彩销售中心，任何人都会质疑奖票是否经过了调包；公证人员为何在进行公证登记时不出具《中奖公证书》？因为这时体彩销售中心还没有发现刘亮所持中奖彩票有问题。

随之，刘亮家人也将体彩中心当日的几个“可疑的举动”提供给媒体：为何彩票先后被验了三次，工作人员都没看出是假票，而在体彩中心过了一夜就变成了假票？宣传广告上说的是即买即开，即中即兑，刘亮叫来会开车的堂哥刘超陪同兑奖以后，为什么不能当天把车提走？……分析综合种种疑点，刘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推断：这假票就是体彩中心内部“一小撮人”造的。

对上述问题，刊发于《北京青年报》（2004/05/10）的《记者手记：细节真实构成公信力》一文很有见地。作者乐倩认为，彩票也是一种游戏，它与魔术表演的区别就在于，彩票游戏需要公开细节，细节的真实构成了它的公信力。

“综观这一事件，彩票有假，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迫不及待想知道的是：究竟谁在造假？该由谁为假彩票埋单？西安体彩的信誉该拿什么做保证？在警方找到确凿证据之前，人们之所以宁可选择相信刘亮无辜，除了对弱势方先天性的同情心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体彩中心没有在媒体上拿出可令人信服的细节。

“体彩中心说刘亮拿的是假彩票，说通知单上有手写的彩票号码为证；现在刘亮说，当时签字时，那上面就没有登记彩票号码，你们凭什么说这张假彩票是我的？问题有了：当时为什么没有让中奖人在应该登记的号码上按手印？这是细节。（笔者按：还应该再在兑奖彩票后面“背书”。）

“彩民中奖后，彩票由体彩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保管，在第二天才告诉刘亮：“你昨天交来的中奖彩票是假的。”让中奖彩票在一个人手中过夜，谁能保证不会被‘调包’？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对中奖彩票实施严格的公证封存？这也是细

节。

“假彩票事件发生后，西安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是因为需要向国家体彩中心核实彩票，所以只能第二天公布彩票的真伪。问题出现了：是宣传中说的‘即买即开，即中即兑’？还是操作中做的‘当日开奖，次日确认’？为什么不提前公布如此重要的信息？这还是细节。

“当天，中奖人被体彩中心安排乘车绕着全城巡游，而体彩中心还不能保证他们就是真正的中奖者。玩笑似乎开大了，可能连体彩中心的人也不明白：早一步完成这些细节真的很难吗？……”

其实，完成这些细节并不难，是有人不愿意完成而已。有道是“混水摸鱼”，水要是清楚了，到哪里去摸鱼？

宝马假票事件曝光之后，初到陕西的一位外地记者，通过出租车司机了解情况，没等他开口，这位“的哥”就主动说道：“彩票在你体彩中心搁了一夜才说是假票，那就说不清楚了。人家一个农村娃，我看挺老实的，一定是体彩中心有人在里头‘日鬼捣棒槌’。”

和刘亮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子村村民，更为此事愤愤不平。他们对记者说：“干啥哩，人家得了大奖就不想给了，简直是糊弄人哩！”“亮亮还会弄那事？这个娃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老实得很，根本就没有那心眼，性子也直得很，根本就不是弄虚作假的人。再说了，他也根本没有弄假票的本事。”

于是记者们发现，“的哥”和村民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几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宁愿倾向于相信刘亮的无辜。”

的确是这样。笔者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帮家伙，多半是想坑人家小伙子。不说一个农村娃不具备造假票的本事，就是有那本事，他怕也没有那个胆量。同时也为刘亮担心：人家有权有势，你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娃，斗得过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只因这些年来，“坑人”的事情，尤其是“坑”底层老百姓的事情，已多得让人见怪不怪了。过去的“为人民服务”，现在的“三个代表”，以及“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好话。问题是常

看到的情况是，上面讲上面的，下面做下面的。有些官员，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他们当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或者说他们整天琢磨的最核心的内容，是如何为自己，以及小集团谋利益。就这件事情而言，不说你一个小小的刘亮，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刘亮，在他们心目中都算不了什么，坑了你刘亮，就像踩死一只蚂蚁。而且，官员终归是官员，平民终归是平民。

当然，我也不是悲观得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毕竟进入了 21 世纪，老百姓也非愚不可及。不说别的，就这件事而言，众多媒体能如此干预，各界人士能如此关注，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从这个意思上讲，刘亮已不是蚂蚁！

## 第六波

### 央视调查 承包商面目暴露

### 镜头直击 孙承贵人间蒸发

西安宝马彩票事件曝光后，很快引起了中央各大媒体的注意。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记者张凯华和寿蓓蓓闻讯，立即从外地赶到西安，他们不辞劳苦，扛着摄像机，多处奔走，尽可能地深入采访，拍录了《体育彩票个人承包承包商有造假前科》的节目，于2004年4月11日播出，首次把该事件摊开在全国观众眼前。

回过头来看这档节目，你会感叹两位记者的细心、锐利和智慧，他们像拿了一把解剖刀似的，从细节处进入，顺脉沿络，剥皮抽丝，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地接近事件的内瓢。

先说那张假彩票——

面对央视镜头，刘亮说：“我拿上去的兑奖彩票不可能是假的。那天共有五个人看了我的彩票，过了三道关卡，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彩票要是假的，我第一关都过不去。……我中了奖却拿不到宝马，这显然是个骗局。”

樊宏（西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出镜，说：“从这次事件来看，就是刘亮，持的假票来领的奖。……因为前一天下了雨，部分彩票受潮，刮开以后出现了图像不清的情况，尽管当时现场的兑奖员已经感觉刘亮的彩票和其它票略有不一样，但没有做进一步的确认，还是让这张假彩票蒙混过关了。”

樊宏的说法，和杨永明在新闻通气会上的说辞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杨永明说的是当天“下雨，光线不好，票面也受了潮”，樊宏说的是“前一天下了雨，部分彩票受潮”。记者问他：“看不清的彩票，而且感觉到略有不一样，能给他兑奖吗？”樊宏回答：“实际情况是兑了，就是因为他们工作做得不是很细。”

——请注意这个“他们”，樊主任把自己划在“他们”之外了。还有，“不是很细”，意思是已经够细的了，只是不“很”而已。

当记者展示假彩票，并将国家体彩中心的鉴定结果说明后，刘亮说：“这张假票不是我当初中奖的那张，我的彩票，草花是在左边，CK 是在右边，位置正好和这张假票相反。……我刮出了特等奖草花 K 之后，就把它交给了领奖台上的彩票兑奖员，兑奖员在验证之后，就把这张彩票揣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由公证员宣布我中奖。……我看其他人中彩电的、中五千元钱的，一样的，都是一检查，票往兜里面一装，登记表上连个票号都不填，人家有张贴彩票处，也不张贴彩票，也不封包也不干啥。”

这是一个关键点。就此，记者问樊宏：“兑奖员应该把已经兑了奖的彩票放在自己兜里吗？”樊宏答：“肯定是应该是放兜里。”记者再问：“肯定是放在兜里，这是你们的规定？”樊宏有点改口：“是由他自己保管。”

——“保管”到自己兜里去了。还说“肯定是应该是”，这位樊主任真是“主任”得有水平！

于是，记者再问：“……已经兑了奖的奖票在工作人员的身上放了十多个小时，怎么能够确保说送到上面鉴定的这个假票就是刘亮交上来的这张彩票呢？”樊宏回答：“这个当时不是有签字吗？有记录，有记录表，完了以后有关到底是谁在造假，这要公安机关最后去侦破去。”

——公安机关肯定要侦破的。问题是，作为监管领导，你的责任负到哪里去了？

记者展示了由西安市体彩中心提供的刘亮的《中奖登记表》。“……假彩票就粘在这张表上。这个登记表应该是中奖者经过验票，把彩票交给工作人员手上保管时填的，那么签字应该是刘亮本人。但在这张表上我们可以看到，领奖人签名的这一栏，根本就没有刘亮的签名。也就是说，这张登记表并不能证明这张假票就是刘亮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刘亮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经过验证的彩票交给了西安市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而西安市体彩中心现在却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这张假票就是刘亮的。双方的纠纷，最后不得不靠公安机关来解决。这场纷争，暴露出了当前彩票发行管理中的漏洞。为什么当初不能用一种更严格更细致的办法来确定每张中奖彩票的来源？……”

——问题问得好，如果“更严格更细致”的话，也就没有什么“漏洞”了，没有“漏洞”，贪食的硕鼠们怎么去钻营，从而中饱私囊？

**中国体育彩票大奖组销售活动中奖登记表**

中奖名次	4	中奖时间	2009.3.23	中奖符号	
姓名	刘亮	性别	男	年龄	19
中奖等级	特A	奖金	空马+12万	万元	
工作单位或住址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洪庆办街子12号				
身份证号码	610111198611072535				
电话					
中奖彩票 粘贴处	盖章处	备注 119749710			
领奖人签名	工作人员签名				

**没有刘亮签名的《中奖登记表》**

图六 1 没有刘亮签名的《中奖登记表》（资料图片）

接下来由介绍彩票知识入手，经知情人士王晓斑之口，引出彩票销售的内幕——

记者说：“……这次事件的焦点是一张即开型的彩票。也就是说，它是现场购买、现场刮奖、现场兑奖的彩票，和先投注，再统一开奖的选号式电脑彩票比，它们的整个操作过程并不一样。对于这次出现的假彩票，刘亮和西安体彩中心各执一词，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身上。但一位彩票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我们，在这种即开型彩票的发行、销售和兑奖过程中，并非只有体彩中心和刘亮两方当事人，其实还有一个第三方，那就是彩票的发行承包商。”

这里所说的“彩票行业的业内人士”指的是王晓斑，原陕西省体彩中心的

一名司机。面对镜头，王晓斑说：“许多彩民在购买即开型彩票的时候，总是认为这些彩票是由政府机构发行的，但事实上一些政府机构常常把这种即开型彩票的发行工作交给了私人来承包。国家本来是为了公益事业而发行彩票，但是当私人负责承包发行工作的时候，彩票就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

——什么叫“一针见血”？王先生的话是也！

王晓斑说：“发行商他们也都是商人，商人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节省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所用的手法你根本想象不到。像过去以奖品兑奖的时候，奖品就有差价，低价进，高价标，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自行车一百五十元钱从私人的自行车厂买来，但是在现场标的时候就标到二百八十元钱。”

——王先生的话让人想到“万恶的旧社会”，恶霸地主剥削农民的常用方式之一，便是“大斗进，小斗出。”

王晓斑告诉记者：“近几年国家不允许实物返奖，因此承包发行商们想出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二次抽奖。因为国家印制的彩票他们无法控制，所以他们往往规定，彩民必须摸中了某个图案的奖票，才能上台来抽大奖，而当彩民拿着中奖彩票走上台的时候，他们的运气其实就在这些承包发行商的掌控之中。他们一般是在奖球上做手脚。把大奖拿出来。……比如，2000年，西安彩民李选利进入二次抽奖时，就遇到了大奖被拿出来的情况。公证员说有七个球，可摸时里面只有三个球。最终李选利没能摸到二十万元的大奖，而只摸到了五万元的小奖。交完个人所得税和公证费以后，李选利只拿到了三万九千八百元。但是在我们的体彩中心所出现的是李选利中奖二十万元的公证书，这个公证书就是由承包商和彩票中心的一些人还有公证员勾结在一起，做的假公证书。”

王晓斑向央视记者提供了彩民李选利中奖五万元的手写证明，和盖有公证处公章的李选利中奖二十万元的公证书。记者注意到，这两份证明所注明的中奖时间和地点以及中奖人的姓名都是相同的，但是中奖数额却相差十五万元，那么哪一份是真，哪一份是假呢？西安电视台的记者曾经采访过中奖者李选利，他证实这份五万元的手写证明确实是他写的。而当他看到二十万元的公证书时，显得非常惊讶，说：“这绝对胡说，我当时拿到三万九千八百元，上税上了一万元，然后又上了二百元钱的公证费。这个绝对是胡说！”

王晓斑说：“他已经做出来了二十万元的公证书，如果上税以后，这一关过了，主任签字了，那么划账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数字，划到承包商的账上。”

——注意，这里至少经过四个环节：公证，上税，主任签字，银行划账，也就是说承包商要拿到十五万元的差额，就得打通这四个关节。

再下来，这次事件的关键人物杨永明被推到全国观众面前。记者先展示了3月24日杨永明写给刘亮的那份说明，指出，根据这份说明，杨永明最晚是在3月24日知道假票事件的。按照正常的程序，杨永明应该立即向管理彩票发行的陕西省体彩中心报告，并且向警方报案。可是体彩中心和警方，都是在3月25日刘亮爬上广告牌之后，才听说假彩票的事。“杨永明当初为什么要对中心和警方都保持沉默呢？”

西装革履的杨永明侃侃而谈：“人啊相互之间都是一种以诚相待，我这个人特别实在，包括刘亮这个事件上，假如说我可以跟他们认真一点，这个事情当然就把他们抓起来。可以这么说，是由于我们考虑到整个彩票市场的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也包括了刘亮他们的这一块。来自于善良的这一块。”

——听听，这位杨先生讲得多么好听！多么具备“大局”意识！而其心底，又是多么的“良善”！难怪体彩发行一事非他莫属——这样的“特别实在”的好同志到哪里去找？似乎广大彩民不应当声讨杨永明，反倒应当敲锣打鼓地给他送上一面锦旗或一个大匾，写刻上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真诚表率，慈善天使”！

杨永明告诉记者，他们在发现刘亮的彩票是假票之后就通知了刘亮，并告诉刘亮造假的后果。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他们希望能够在事情闹大之前，和刘亮解决这件事。”

——杨永明所说的“解决”，就是所谓的“拿钱买平安”，只要钱出到一定程度，事情是有可能“摆平”的。这一点，刘亮后来在央视做节目时也不否认。问题是杨永明一开始就打错了算盘，他不想花钱，他想“空手套白狼”，即用栽赃和诬陷的手段逼刘亮就范。他显然低估了刘亮。

“他们威胁我，说验了指纹要是这票是你做的假，你就要负刑事责任。我说我是在你卖场买的票，凭啥负刑事责任？我领我中的车是理所应当。”刘亮说，“我完全可以到公安局去澄清，我也不怕验指纹，就是按十个指纹、一百个指纹，

哪怕是按脚趾头印，我都敢！”

——宝马案真相大白之后，许多人都说，杨永明当时若顺水推舟，将错就错，把宝马车给了刘亮，岂不嘛事没有，照样将以后的体彩发行掌控在手中？“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谁能想到，偏偏遇上了个“愣头青”刘亮！

最后，记者介绍了2000年发生的，浙江彩民庄士农，把一张没有中奖的福利彩票涂改成了一张奖额高达三十万元的一等奖彩票，结果在兑奖时被工作人员当场识破，后被余杭市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的事件；和2001年4月发生的湖北体彩中心的摇奖彩球被人填充了金属制品，一年后，造假者章国新被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的事件。指出，这次西安市的宝马假票事件，显露出了当前彩票的发行和管理还存在着许多漏洞，这些漏洞既为彩票发行机构以及承包发行商提供了造假机会，也为一些不法的彩民通过造假骗奖提供了可乘之机。目前西安市体彩中心已就假彩票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刘亮也在前两天，把一纸诉状递到了西安新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西安市体彩中心履行兑奖承诺。“事情虽然都还没有结果，然而有一点很清楚，这买彩票啊，运气的确很重要，但规则也是缺不了的。”记者说。

——“规则”问题是个老话题了。这里有几个层次：一是有没有规则？二是有怎样的规则？三是即使有规则，执行不执行规则？怎么执行规则？四是没有“明规则”“显规则”，或“明规则”“显规则”不健全，那么，有没有“暗规则”“潜规则”？事实上，没有“明规则”“显规则”的地方，没有“明规则”“显规则”的时候，都有“暗规则”“潜规则”在通行、在起作用。杨永明若不熟稔，甚至精通这些“暗规则”“潜规则”，若不按“暗规则”“潜规则”行事，他凭什么将一个省的体彩发行这样的大好事揽到怀里，凭什么经营多年而不烂包？

八天之后，即2004年4月19日，《西安体彩风波》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出。在这档节目里，记者张鸿勋和他的同事们，由细节入手，顺藤摸瓜，力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刘亮是不是手持假票兑的奖？

记者采用还原法，将刘亮带到售彩现场，问了“你是在这儿的哪个位置，从

哪个工作人员手中买的？”“在哪个地方刮的？”“存在不存在那样一种可能，你在拿到票的时候其实身上可能有一张假票，你在这个过程中刮的时候，手换到前面然后让他看见？”“当时你身边就是你和卖票的人？”等几个问题。

刘亮回答说，他是从一个串脸胡的男的手上买的彩票，“就在卖我票的人面前刮的。刮住那张草花K后，我还叫串脸胡看了一下，他拿在手上还不想放，我直接用手一拽就拽过来了，我把票往钱包里边一装，把钱包往身上一揣。”“我身上哪来的假票呢？不信，你可以查，我没啥说的，那你查。……只要那个卖彩票的人敢站出来，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看来这个卖票人是一个关键的证人。按刘亮的说法，此人长着串脸胡，外貌特征是明显的，应该不难寻找。然而，不管记者怎么询问，体彩方面始终不愿让这个串脸胡露面，说彩票发售人员是临时组织的，很难寻找。后来记者从另外的渠道得知卖票给刘亮的“串脸胡”叫田小宝，一个叫赵爱的女士是组织发售人员，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赵爱找到田小宝，但是体彩方面依然不提供赵爱的联系方式。

——央视的介入，使“体彩方面”陷入“尴尬”境地：不接受采访吧，说明你心中有鬼，而且是惹不起、躲不掉的中央媒体；接受采访吧，难免要“拔出萝卜带出泥”，于是，只好采取或推托，或装傻，或答非所问式的不积极配合的态度。

后来记者设法打听到了赵爱的电话，打通后，赵爱说：“……嗯，田小宝说，刘亮是在我这儿买的票，但买的是什么票，他没在我面前刮，把身子转过去了。”记者问：“是转过身之后又再转过来，然后说他已经拿到了一张票，这张票是草花K？”“是这样的。”赵爱答了这么一句后，电话突然断了，过后再打，无人接听。

赵爱不接电话了。记者没有拿到田小宝的联系方式，事实上，如果赵爱转述的田小宝的话是真话，那么田小宝也只能证明刘亮的确买过票，而不能证实中奖彩票的真伪。……于是，记者将目标转到有可能接触彩票的另一个人，刘亮的堂哥刘超。

面对记者，刘超说：“接到刘亮的电话，我说你别骗我，我在跑车，你不要影响我的生意，他说是真的，你把车开到东新街来。我赶到后，他让我看了一眼，

是一张草花K……”

于是，有了第二个问题：刘超是不是假票持有者呢？他会不会利用同刘亮会合的机会，来一个“偷梁换柱”呢？

对这个问题，刘超说：“票一直在刘亮手上拿着，我连摸都没摸。”刘亮说：“我只拿到手上叫他看了一眼我就抽回来了，我不可能叫他拿上。因为他拿上就成他的了，不成我的了。小时候我们整天在一起玩，我们两个就是：他一拿东西我问他要要不来，我拿东西他一拿就拿跑了，所以说我不可能叫他拿的。”

——刘亮的这几句话，讲出了刘超小时候的“赖”，这种“赖”，农村孩子身上常有。同时说明刘亮虽有点“楞”，但不傻。

记者问刘超：“有人在怀疑刘亮作假的时候也怀疑到了你，有这种可能吗？你敢肯定自己没作假吗？”刘超回答：“没有，绝对没有，我敢拿人头担保，开玩笑。真是我作假马上把我枪毙了。”

——又一个“拿人头担保”，这个“拿人头担保”多半是受了贾安庆主任那个“拿人头担保”的影响。前面我们说过贾主任“拿人头担保”的话语具有可资流传的经典性，由此可见一斑。

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假票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是由谁发现的？发现人到哪里去了？

就这些问题，记者先采访西安市体育局副局长蔡全发，据蔡副局长讲，第一关是经过保安人员验票。——慢放的现场录像显示，过此关的时间不超过三秒，验票没有任何工具。然后走到领奖台中间，披红戴花，这时候，两位披红戴花者，也要看看中奖者的票，这是过第二关。——另一段录像显示，两个穿着毛衣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应用任何仪器，仅凭肉眼看了看，就给中奖者披红戴花。然后过第三关，到兑奖处，填登记表，由兑奖员再验一次票。而这个兑奖验票员叫孙承贵。——现场录像显示，刘亮的票正是经这个孙承贵的手验过，才被确认为中奖。

接下来，记者将镜头转向樊宏和杨永明，问了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验这张票？”“验票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历？”“即开型是要即开即兑

对吧，但你们有验证假票的能力吗？”“出现之前你们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它是假票的话怎么这么顺利地就通过了前面几关？”

樊宏回答说：“兑奖员有这样的资格。他起码应该是做过这项工作，曾经从事过这项工作。”杨永明则说：“出了这个假票以后我还跟我们领导说过呢，我说应该是上级印制部门和管理部门，应该跟检验人民币一样有一个验票的机器。……这之前我们只能是凭肉眼。……因为这个假票我也看了，确实做得很严密。”

“假票事件”发生三天后，体彩中心向媒体出示假票时用了新买的放大镜。对这个举措，省体彩中心的副主任张永民这样解释道：“拿回来以后我们要看，看不清楚我们就专门买了两个放大镜，现在这两个放大镜还在我们桌上放的。”



图六 2 放大镜下的假彩票（资料图片）

记者问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张永民说：“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杨永明则说：“其实这样的假票，用肉眼细细看也能发现。”问“一辆宝马车大奖，凭什么

不细细地看？”杨永明说：“是，这个，第一个是知道这个彩票是刚刚推出来的新票，就放松了这个警惕，这是最关键的一个，脑子里就放松了警惕。”又说“当时我们操心的什么？操心这个彩票里面的符号印错。”

记者再问：“你刚才讲了每一个票上都有一个编码？那么，这一组里面的号码为什么不在旁边放一张单子，随时拿过来一登记，就像你们说的很简单，为什么不放？”樊宏回答：“这都是事后我们要总结的问题，包括我们以后再发的时候要总结的问题。”

——是要总结，但无论杨永明还是樊宏，此时大概都没有想到，或不愿意想到，他们的总结，要在看守所或者牢房里进行。

体彩方面讲，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做核对工作，将获奖者重新登记。晚上 11 点的时候，彩票保管员在自己的工作室，发现刘亮的彩票是假票。而这个彩票保管员和给刘亮验票登记的人是同一个人：孙承贵。

为什么会将如此重要的工作放在一个人肩上呢？蔡全发解释说：“我们想由他一个人专人负责，不会出现两人交叉出现问题说不清的情况，出了问题也是他一个人的。”

——这话说得有点糊涂：出了问题是他一个人的，几十万彩民的权益受到损伤，他一个人担负得起吗？还有，什么都是他一个人的，哪你们这些领导的监督职能如何体现呢？

那么，现在出了事情了，这个负责的孙承贵怎么不见影了？于是，记者和樊宏有了下面几番问答：“孙承贵是管理中心的人吗？”“是本次活动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这个工作人员属于您手下管的人吗？”“不完全是。”“怎么理解这个不完全是？”“因为搞即开型彩票活动规模很大，像办大型运动会一样，方方面面需要很多的人，孙承贵是在我们底下的‘大世界’工作。”

财政部 2003 年发布的《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的第二十一条规定，彩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替彩民保管未兑付的中奖彩票。而事实是，刘亮的彩票就是在这个“不完全是”工作人员的孙承贵手中保管了一个晚上后，才被鉴定为假票的。

然而，令人生疑的是，无论是在西安市体彩中心还是陕西省体彩中心公开

的工作人员名录上，记者都没能找到这位据称是第一个指出假票的人。——不但名单上找不到，现实中也见不到，体彩方面以警方已介入，要求涉案人员拒绝媒体采访为由拒绝向记者提供有关孙承贵的联系方式，这位由陕西省体彩中心销售部部长杨永明聘请来的重要的当事人，就像人们形容的那样：从人间“蒸发”了。

第四个问题：出现假票后，体彩中心不是先向警方报案，倒通知“假票”持有者刘亮，这合乎情理吗？——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众多媒体的注意，但央视记者捕捉到了，且抓住不放。

杨永明说，24号中午是孙承贵给走在路上的刘家人打的电话，接电话的刘超却一口咬定，说那个电话就是杨永明本人打的，因为电话接通后，对方曾自报家门，说“我是体彩中心，我姓杨”。为什么会在这个细节上出现矛盾呢？

“假设我是作假的人，当你发现假的时候你没先想到先去报警而先想到是通知我这样一个作案人，这合乎情理吗？”记者问蔡全发。“这首先说明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一种很强的防假意识。”蔡全发答。“您刚才说了您当过军人，如果说您已经抓住敌人的尾巴，你会告诉敌人你跑吧，你会吗？”记者再问。“因为工作人员，我还是这样解释，他没有这种防假意识，特别是防大假的意识，出了问题之后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了。”蔡全发再答。

——这样的回答实在太牵强，但这位领导就这么回答了。

记者将同样的问题摊到干体彩已有好几个年头，也举办过即开式兑奖的西安体彩中心的樊宏主任面前：“如果你现在发现我来兑奖，持的是一张假票，你会怎么处理？”樊宏答：“那就肯定是问这张票的来源，交给现场的公安或者保安去处理。”

记者再问：“那为什么24号那天要打电话通知没有到现场的刘亮不要再来领奖了？如果他是犯罪嫌疑人的话你不怕打草惊蛇，让他跑掉吗？”

樊宏再答：“这要看事情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刘亮这个车从发现假票以后已经对外宣传，对外广播、现场广播，包括第二天的媒体，已经对外公布了，所以这个处理就不能是很简单的处理，处理不好可能影响要整个的销售活动、体育彩票的形象，因为我们正在销售。”

——回答得似乎有道理。但公安新城分局的姜永生队长不这样看，他认为在

彩票的发售过程中发行人员如果发现有一张假票，他应该及时报告，向当地公安机关立即报案，并把持彩票的人控制住。“因为这不是个小数字，不管咋样应该报案。”

樊宏认为，这是孙承贵的工作失误。记者问：“这个是工作失误能解释得了的吗？能吗？”樊宏答：“这个只能等案子查清楚以后才会水落石出。”又强调说：“总之，我们内部人员造假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接下来，蔡全发也讲了很硬气的话：“出现这种假彩票的话，现在大家都不太去想是不是刘亮在这儿作假，或者是刘亮及其他人作假。现在，至少从目前来讲，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不是我们体彩部门内部的人做的假，我们一致认为就是刘亮所持的这张假彩票。因为，如果说体彩中心造假，没有利益驱动。造假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把利益拿到手。我们体彩每发行一百元，其中 50% 的钱肯定要返还彩民——宝马轿车的钱就含在这 50% 的返还金里，此外还有 35% 的公益金和 15% 的发行费，这是省财政厅和国家体彩中心要严格审查的。”

——看来，蔡副局长没有料到有人会在 50% 的返还金里做文章。

“那么，”记者问，“这张票是假的，但谁能保证这张票就是刘亮最开始拿的那张票呢？”蔡全发答：“这个我们有人证。”“谁？”“孙承贵。”

——又是孙承贵。体彩的领导们太器重，也太相信这个孙承贵了。他们只想着把记者应付过去了事，没有想到这个叫孙承贵的“人证”不争气，不等记者采访，就脚板上抹油——溜了。

第五个问题：兑奖后，宝马车为何未能当日开走？

开彩前，陕西省体彩中心与宝马公司签订过一个协议。其第四条双方约定，抽奖活动期间，宝马公司，按照体彩中心的发车凭证向中将人发放奖品车，当日活动结束后，以发车凭证当日结算。这也就是说，每一辆已经抽出的宝马车都应该在当日被开走。

但是，就在央视记者 4 月 6 日采访西安金花宝马汽车销售公司销售部经理葛遼的时候，被摸中的四辆宝马车才被领走一辆，领车人还未开发票。

而且，调查发现：收款单据上付款方一栏签的是杨永明的名字，用的也不是体彩的账户，而是由杨永明用现金支付的。中将证明单上也显示的是杨永明和

验票人孙承贵的名字。而这个唯一领走宝马车的杨小兵，其电话号码经查是空号。另外三辆宝马的得主，刘亮、刘晓莉（领奖时称“刘小莉”）、王军。刘亮可以找到，刘晓莉和王军的电话也是一直无人接听。

就中奖人的身份证号码、联系地址、电话号码等问题，记者电话采访杨永明。于是有了以下对话：“这些人登记的身份证号或者联系住址，都是假的，你们允许吗？”“不会，这是凭身份证登记的。”“肯定身份证是真的？”“对。”“你们当时都验过他们的身份证？”“身份证是我们登记人验的。”“身份证号跟登记表上的号是不是一致的？”“那应该是一致的。”“那家庭住址这些呢？还有联系电话？”“家庭住址和登记表应该是一致的。”“登记表上是真实的了？”“对。”

——什么叫“睁着眼睛说瞎话”？杨永明的表演即是。

后来，也就是第二天，4月7日下午，记者在各地警方的大力支持下，了解到以下情况：杨小兵，第一位领走宝马车的人，身份号码属地为贵州六盘水，合江县没有东林镇，手机号码拨打为空号；刘晓莉，身份证号码与本人现在的号码不符，的确中奖，但她却没领到宝马；王军，河南宜阳白杨镇，身份证属地为河南郑州巩义，经查询为假号找不到人。

至此，宝马彩票案由初始的真假彩票之争跃入到揭露体彩黑幕的层面，杨永明等人的诈骗行为开始“浮出水面”。

## 第七波

### 拘留杨氏 涉案者落入法网

### 追加被告 刘家人有望胜诉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笔者是同一位朋友一块看的，看完后，朋友说：“我看这个杨永明快了。”他说的这个“快了”笔者当然理解，就是“快被抓进去了”的意思。朋友的判断没有错，200年4月底，人们便在媒体看到了《省市监察和公安部门调查彩票宝马车中奖纠纷案》的消息，称对涉案人员“将根据调查结果依纪依法作出公开、公正处理”。30日下午，杨永明、刘晓莉、岳斌（即杨小兵）被戴上手铐，关进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正式消息是5月6日公布的，称杨永明等三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进入侦查阶段。

有意思的是，这之前，杨永明还主动约《华商报》记者谢正罡“聊”了一次“天”。那是4月14日下午，穿着浅色西装，“思维敏捷、精神状态相当不错”的杨永明，坦然地坐在了谢记者的面前。他几分优雅地抽着“特醇三五”，还谦逊地让记者也抽他的烟。

当记者问到“四辆宝马车只提走两辆，及中奖者资料的疑点”问题时，杨永明说：杨小兵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就把车开走了，可能已经卖了，他是个打工的嘛，好像是四川来的。（笔者按：请注意这个“好像”——明明是自己雇的“托儿”，还要装成不熟悉的样子——你得佩服杨永明有当演员的“天才”。）从宝马公司提出来的两辆车有一辆就是给刘晓莉准备的，昨天她来西安兑奖了，她的身份证过期了，昨天又到公安局去证明了身份，现在刘晓莉的手续已经办好了，但车还在宝马公司。她想把车卖了，宝马公司表示不回收，她托我帮她卖，我是不敢再染（笔者按：请注意这个“染”字——好像很诚实，还带点清高。）这个车了。至于第四个中奖的王军我们现在也无法联系，他留的电话就是十二位的，我们也想给他兑奖……他中间给我们打过电话要兑奖，但现在还没有，可能是他觉得现在是非常时期，不想露面被媒体热炒，想过了这阵再说吧。至于中奖者资料，我们承认工作有些失误，以后再搞这种活动一定要加强这个的。

——是“有些失误”吗？还有“再搞这种活动”的“以后”吗？

谈到“李选利事件”，杨永明说：当时李选利的确是中了五万元的奖。二十万的公证书为什么能出来？是市、区两级体育部门想把那次活动中的十五万留下来做经费，不想给省上缴，才做出来的。那次的销售额是一千四百五十二万，返还50%应该是七百二十六万，但实际返给彩民的是七百零九万，有十七万要交到省上，所以，市、区两级就打了这个主意。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要是我的事情，我就不可能再弄这个事了。

——即就是市、区两级打的主意，也是通过你杨永明操办的，怎么能说和你没关系？

谈及王晓斑作为“知情人”站出来说话，杨永明话带贬损：“王晓斑当时是原省体彩某领导的司机，因为李选利的事情，市体委报到省体彩那里时，该领导说‘不是八个二十万吗，怎么现在是九个？’，就派王晓斑找到了李选利对质，结果发现了开假公证书的事情。事后，十五万市上和区里也没留下来，相关人也受到处理，二十万的公证书也作废了，但王晓斑留下了两份不一样的公证书复印件。后来该领导下台，王晓斑被省体彩解聘，可能是怀恨在心就把这件事给央视说了。”

——宝马彩票案从迷团重重到真相大白，王晓斑站出来说话是起了关键作用的。笔者注意到，央视记者在采访王晓斑时，采用了保护手段，模糊了王晓斑的形象。尽管如此，事后，据说王晓斑还是受到了威胁——接到了许多不怀好意的、恶狠狠的电话。这说明，在当下之中国，说真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且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好在毕竟还有人敢于站出来说真话。所以，人们应该说一句：王晓斑，好样的！还有，杨永明说“相关人也受到处理”，此言不真，对“相关人”的“处理”，是在宝马彩票案真相完全大白之后。

当回答“你现在和体彩中心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时，杨永明说：我从小跟着亲戚到西安生活，因为亲戚有体彩的社会关系，所以后来就介绍我到体彩帮忙，这些年的确在各个地方做过彩票发行工作，但没有赚上钱，销售额都不高。我和体彩中心是聘用关系，但央视说我是承包的。

——“聘用”和“承包”按说是两回事，但在杨永明身上是一回事：名义上是“聘用”，实际上是“承包”。

既然是“承包”，就有一个承包资质的问题。国家规定承包彩票即开销售发行的资质是：销售商必须在当地经营三年以上，注册资金五百万以上，且在经营活动中无不良记录。对这个问题，杨永明倒很诚实：“我的确没有承包资质，但很多人没有资质也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国外都是承包商来负责现场发行的，体育部门没有经费也没有经验来做这个事。”

——杨永明讲出了一个“社会现实”：国家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操作是另一回事。

那么，这个情况在卖彩票前向彩民说明了吗？有多少彩民知道他们买的彩票是承包商售出的？



图七 1 面对镜头的杨永明（资料图片）

对这个问题，杨永明语塞了。难怪杨永明默然不语——敢向彩民说明吗？说明了，一是违犯了财政部“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的规定——这个规定和对销售商承包资质的要求相矛盾：既然不允许承包，就谈不上资质问题；既然要求承包商要具备资质，那就意味着允许承包；二是彩民知道这是违规操作，还会那么踊跃地购买吗？不踊跃购买，钱从何处去捞？

交谈到最后，杨永明预测了事件的结果。“可能三个，一个是刘亮作假，另一个是工作人员作假，还有一个是查不出来。从现在来看，刘亮作假证据不足，工作人员作假证据也不足，所以可能是第三种结果。刘亮家现在起诉了，但如果打官司，我们肯定败诉。”

——笔者注意到，3月23日刘亮中奖以来，杨永明从未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刘亮作假。用肯定语气说刘亮作假的，是省市体彩中心的领导，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好听些是留有余地，说客观些是做贼心虚。现在杨永明开始说“刘亮作假证据不足”了，说“如果打官司，我们肯定败诉”了，但同时他又强调说“工作人员作假证据也不足”，他多么希望是“第三种结果”即“查不出来”呀！但他太天真了，太想侥幸了，或者说他小看了媒体和公安机关的能力了！

据说，在长达三小时的“聊天”中，杨永明“始终坚持他不会作假，也从不作假”，“没有任何作假作弊的行为”，声称“拿我的人格做担保”，但却称其“压力很大”。

——这就有点“此地无银”的味道了，既然“没有任何作假作弊的行为”，“不会作假，也从不作假”，又何来“压力很大”？而且，很有趣，他也来了个“拿人格担保”——杨氏的“拿人格担保”显然是受到了贾安庆的“拿头担保”的传染或影响，真是有什么样的“狼”，就有什么样的“狈”。个人的道德品质是“人格”的定义之一，杨永明在这里讲“人格”，就好像一只老鼠大言不惭地讲“猫格”，或一只狐狸煞有介事地讲“狗”格一样可笑。

据胡杰《西安警方侦破宝马彩票案》（《西安晚报》2004/06/28）提供的情况，西安市公安局的宝马彩票案专案组是2004年4月12日成立的，由市局副局长孟宗林出任专案组长，成员有四十多人，来自市局经侦支队和公安新城分局。专案组正式立案的日子是4月21日。

三天后，即4月24日下午，5点整，杨永明以报案方的一员，表情轻松地来到专案组所在地西安市西一路唐苑宾馆。他没有料到，他从此会像鸟儿入笼般失去自由。当晚，有人给公安新城分局经侦大队姜永生大队长发了一条手机短信，此前姜大队长一直和他有说有笑，待看了短信后，笑容就立马从姜大队

长的脸上消失了：“杨永明，你以为我们没掌握你吗？老实交待吧！”

是谁给姜大队长发的短信呢？事情得从此案的另一个要犯刘晓莉说起。

3月23日，到宝马公司办领车手续的刘晓莉，被发现持的是过期身份证，工作人员让她换了身份证再来领。3月24日晚发现假彩票，3月25日发生了刘亮爬广告牌事件。之后，警察找她谈了一次话，谈得她有点惶惶不安，不敢贸然去领车了。于是回到汉中家中。

4月12日，杨永明通知她到西安领奖，孙承贵也给她打电话，说宝马车领到手后，可以卖掉，她可以分得一半车钱。也许是这一半车钱——二十四万人民币让刘晓莉动了心，她当晚便上了火车。第二天，在杨永明的安排下，她将领奖手续办了，十二万元的奖金全部缴了个人所得税，但车还在宝马公司放着。

4月14日，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华商报》记者。——又是《华商报》，这个报的记者太厉害了，简直无孔不入嘛。和二十天前的情况不同，那时候，她是喜欢记者的，至少不讨厌。而现在，她已不愿见什么记者了。但是，人来了，总不能把人家撵出去吧？“有理不打上门客”嘛，应付一下算啦。

记者问她怎么没有将宝马车开回来，她说放在家里也没什么用，车一开动，再卖就会掉价，最好让宝马公司将车卖掉算了。记者又问她中奖的过程，她还是按预先想好的话答：陕北的娘家妈有病要动手术，她准备回去看看，途经西安住在亲戚家，出去转时，无意中摸了一百元钱的奖，没想到竟然中了宝马。接下来，因领奖事，挺麻烦的，就没回陕北。

“把车放在西安你放心？”记者问。“国家搞的彩票，又有公证书，有什么可害怕的！”她有点烦了。“有人说你认识杨永明，你认识吗？”“我不认识！”真是“那壶不开，偏提那壶”，她有点气愤了。之后，她闭眼抿嘴，再不想理这个记者了。

“纸里包不住火呀！”记者走后，刘晓莉的丈夫叹口气说，“我看这事，没啥好结果。”

专案组一行五人是4月23日连夜赶到汉中的。由于四位宝马车的得主，只有刘晓莉和刘亮的地址、电话是实确的，警方便先选择刘晓莉做突破口。

4月24日早上，刘晓莉的右眼皮莫名其妙地跳个不停。“人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莫不是真的要出事？”果不其然，当天下午，她就被传唤到汉中市

公安局。一开始，刘晓莉态度强硬，在叙述了中奖经过后，她反问警察：“凭什么不让我领奖？告诉你们，这奖我领定了！”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民警点出了孙承贵的名字，问她和孙是什么关系？啥时候认识的？“没啥关系呀，是这次兑奖时才认识的。”刘晓莉说。“不对吧，”民警说，“叫你来之前，我们已在电信局调出了你家的电话单，西安有一个固定电话，在彩票销售期间和孙承贵的手机联系频繁，而这个固定电话，也多次出现在你家的话单上，这你怎么解释？”

事实面前，刘晓莉的头低了下来，但还是沉默不语。民警们继续展开心理攻势，说：“你不过是受他们的指使和利用当托儿，人家牵走的是牛，给你的不过是个尾巴梢，你何必要为他们背这么大的黑锅呢？再说你也背不起呀！”这样的“思想工作”一直做到晚上。做得刘晓莉终于全线崩溃，放声大哭，将她当托儿领大奖的经过全部说出。

原来，这个固定电话是刘晓莉的表妹白莉家的，而白莉正是她和孙承贵之间的中介人。3月初，白莉给她打电话，说孙承贵在西安卖彩票，需要人去帮忙做一次宣传，给两千块钱，包来回车费，问她愿不愿意来，她当时就应承了。刘晓莉是3月20日到西安的，22日早上，孙承贵约她吃羊肉泡馍，饭间，孙将一张已刮出的草花K奖票交给她，让她当天上午到东新街体彩大卖场去兑奖。于是，在孙承贵的关照下，刘晓莉连过两关，来到孙承贵的跟前，接下来又按照孙的暗示，选了那张有宝马车的信封袋编号……

刘晓莉讲完后，民警立即给西安的姜大队长发了一条手机短信，这短信只有三个字：“拿下了。”于是，便有了前面讲到的姜大队长向杨永明翻脸的一幕。

4月26日，民警们将刘晓莉带上了返回西安的火车。

“五一”前夕，刘晓莉的丈夫按照民警留下的电话打过去询问妻子的下落，对方告诉他，刘晓莉已被拒留，警方的通知随后就会寄到。

应该说，杨永明等人被刑拘，最感宽慰的还是刘亮和他的家人。

宝马彩票案发生后，刘亮一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刘亮的性格原本是活泼率真、有点“野”性的，可一顶“彩票造假者”的帽子扣过来之后，刘亮竟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沉默了。他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在家里，饭不好好吃，睡

觉没有规律，脾气也变得烦躁不安，有时动不动就冲家里人，甚至亲朋好友发脾气。有一次，刘亮随父亲刘耀利进城办事，有人看见他就上来搭话，没想到刘亮竟然很不耐烦地冲对方吼：“我不是刘亮，别打扰我！”弄得刘耀利很难为情。

当记者问他为何不愿意见人时，刘亮说：“买彩票我没有错，出现假彩票，我也没有错，我之所以不露面，是怕淹死人的唾沫星子”。

现在，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已翘首可等了，刘亮那张娃娃脸上露出了多日不见的笑容，积压在刘家人心头的阴霾，也开始散去。

4月8日，央视二套详细报道了杨永明涉嫌造假的新闻，得知消息后，9日中午，刘亮专门到装有闭路电视的邻居家看了央视的重播。下午，刘家就安装了闭路电视。刘亮高兴地对到他家采访的记者说：“这下好了，好多台都能看到。庭审的时候奶奶肯定去不了，她可以坐在电视前，看孙子如何讨回清白。”

中国有句古话，叫“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用在刘亮身上也合适。且不说中的大奖本身就是财富，即就事件而言，对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媒体而言，刘亮也是一个可以多方采掘的“富矿”。

这些天来，刘亮家的电话成了热线，几乎是从早响到晚。“接完一个，屁股还没坐稳，另一个又来了。”也没少来人，有全国近百家媒体的记者，有律师，有警察，有村邻，送走一拨，又来一拨。平均每天不下五十人。为了应付来访者，把平时不用凳子都搬出来了。有的记者为了及时抓到新闻，干脆住在刘家。大伯、大妈、舅舅、舅妈、叔叔等一大帮亲戚，为了给刘家人“壮胆”，也轮流住在这里。

来人就要吃，要喝，好客的李家人做不过来，就常常到街面上买一堆包子——靠近刘家的包子铺一下子“发事”了，多卖了几百笼包子，还有油条、油饼、馒头什么的；或者闷一锅米饭，到街上饭馆里端回一盘盘荤素搭配的菜；或者买些压面条回来，下着吃。

事件爆发时，为了安全起见，一位亲戚将自家的一条大黄狗牵到了刘家。这只大黄狗威武凶猛，以前见了生人就狂叫着扑咬，需刘家人出来喊着禁了，客人才能进屋。后来就懒惰了，来了生人，勉强叫两声，也就罢了。为什么呢，生人太多，叫不过来了。

来人大多数都是关注宝马案、关心刘家人的好人，当然也有冒牌记者、冒牌律师，他们甚至劝刘家“私了”，说什么“你一个农民还能告得了人家大官？民告官，难上难，你打不过人家高官的”。说得刘家人心里发惶惶，七上八下的。有一次，刘家门口还来了两个形迹可疑的壮汉，一有人出门就跟着，直到亲戚牵来大黄狗，那两个人才没再闪面。

刘家的安全也引起了警方的重视。4月29日晚，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洪庆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带领几名民警来到刘家，对他们说：“不要有过激表现，要相信有关部门会作出公正处理。”同时表示，“如果安全方面有什么顾虑，尽管向警方提出。”“如果需要保护，他们可以二十四小时提供。”4月30日下午，公安灞桥分局也派出两名民警来到刘家，询问情况，表示关心。那几天晚上，村民们发现，有警察在刘家附近巡逻。——这些民警的到来，本义是保护刘亮和家人的安全，却也引起了误会，“刘亮被抓起来了”“刘亮被取保候审了”的消息不径而走。

忧愤、焦虑，加劳累，刘亮的母亲犯了高血压，父亲犯了肠胃系统紊乱的老毛病，有病就得去医院，现在去医院，动辄几千元。“家里就存了一万三千元钱，都用在医药费、来回跑的车费、请人吃饭上了，开支比平时增加了三十多倍！都说打官司会倾家荡产，我们家已经倾家，就差荡产卖东西了。”刘亮无奈地说。“真是花钱如流水呀，不知这样的日子啥时候能到头。”刘耀利叹着气说。

刘亮的奶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身体说不上好，有些唠叨，但脑子不糊涂。她常常坐在刘家大门口的水泥台上，不言不语地看着人们出来进去。如果有人向她问候，她就会感叹地说：“亮亮抓着了宝马，那不是抓奖，是抓罪哩！”还说，“咱娃没文化，人家有文化，咱拿没文化跟人家有文化碰，碰不过哩。”

不要以为就刘家老太持这种“抓罪论”，宝马事件出来后，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嘉宾许子东，就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人忽然得到一笔很大的财产，未必全是好事。这里面的哲理，现在还年轻的刘亮，大概得用自己的一生去验证和体会。

刘亮和父亲刘耀利是4月15日上午，从西安新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刘会利手中接过传票的，传票上写着：该案将于2004年5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二

楼大法庭开庭审理。月底前后，刘亮的几个代理律师经过商量，追加西安市体育局为被告，法院接到他们的诉状后，口头通知他们，为慎重起见，案件将推迟开庭，具体时间将在“五一”长假后决定。

刘亮的代理律师们告诉媒体：目前他们正在各处进行取证工作，相信有较大的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杨永明被刑拘与彩票兑奖纠纷是两个法律事件，杨被刑拘并不是彩票兑奖纠纷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因此并不影响民事诉讼的进行。但他们表示，此消息更加证明刘亮的无辜，使他们对胜诉有了更大的信心。

毛家兴律师说，此前，尽管有许多事实能证明刘亮没有造假，可是鉴于体彩方占据社会资源（刘亮获取的则是社会的同情，两方力量对比悬殊）这一优势，他们判断刘亮的胜诉率仅有60%左右，而且还必须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前提下。现在，刘亮的胜诉率已大幅提高，达80%以上。

——这两个数字在刘亮心目中，和律师的判断有区别：杨永明被刑拘前，刘亮对人说，他打赢官司的把握只有五成，也就是刘家的胜诉率是50%，杨永明被刑拘后，刘亮信心倍增，他认为自己的胜诉率可达90%。

因为该案备受全国媒体关注，因此“开庭审理是否公开”一事，便成了多家新闻单位及刘亮家人关心的话题。对此，毛律师告诉记者，因此案是合同纠纷案，不会涉及到个人隐私，依据相关规定，公开开庭审理是必然的。据悉，中央电视台、武汉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媒体已和受理此案的新城区人民法院取得了联系，获得了现场直播庭审的答复。另外，还有数十家报纸媒体的记者，届时也将参加庭审。而该案审判员刘会利则表示，将排除一切庭外干扰，客观公正地对此案进行审判。刘亮的父亲刘耀利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们相信法律，也相信政府！”

相信归相信，但一些事情也让刘家人感到困惑和烦恼。

一是据宝马公司销售部的代表李新路讲，4月中旬，四辆宝马车的发票已由西安市体彩中心全部开过，其中一张发票上填有刘亮的名字。这使刘家人感到困惑，因为自从3月26日“假票”被确认后，体彩方面就再没有和他们家联系过。现在体彩中心以刘亮的名义已开出宝马车的发票，那么，是不是说明一开始口口声声称刘亮持的是假票的体彩中心，如今也承认刘亮持的是真彩票

呢？

二是这期间，某家体育报纸无中生有地刊发了一条《刘亮被取保候审》的消息，这让人十分反感。刘亮从来就没有被拘留过，谈什么取保？谈什么候审？此前，刘家对媒体是欢迎、支持和感谢的，这个报道出来后，刘家人对媒体产生了戒备之心，尤其是体育类媒体。有一次，某体育记者出言不逊，刘耀利把他赶出了院子，说：“你走，你走，我就是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随便！”

刘亮的代理律师们也有困惑的地方，这便是一直拿不到相关证据。在刘亮向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代理律师即到新城区公证处依法调取刘亮中奖时由该处出具的公证书，对方称已经被有关部门提走。4月12日、4月15日、4月20日，律师又三次前往公证处提取公证书，也都没有达到目的。同时，刘亮的律师前往宝马公司依法提取体彩中心与宝马公司签订的合同时，对方称这涉及商业秘密而予以拒绝。

“制作、涂改假彩票，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能力，甚至还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律师的都没有见过这张假彩票，至于涂改的内情更无从说起。”刘亮的律师对《三秦都市报》（2004/05/08）记者说，“在最初取证的过程中，感觉是处处受阻。”“当律师取证的权利得不到维护的时候，维护法律公正的成本就被人为增加了。”“惟一的办法就是等审理开始后，申请由人民法院调取所需要的上述材料。”

另外，也有人给媒体（《华商报》2004/05/08）打电话，称自己是当时的“售彩者”，说刘亮所持的是假彩票。他讲刘亮当时是“背朝着”他刮出了“草花K”的。之后，还出去给卖彩票的人买了盒烟，让其帮着看看彩票上的中奖图案与现场公布的是否一致。他当时仔细地看了，发现刘亮的彩票上虽然有“草花K”图案，但图案一侧的字母却与主办方公布的并不一致。此外，央视播出“宝马假票案”相关报道后，他在报纸上整理的文章中发现，刘亮讲述事件的过程中有几处疑点，与事实情况根本不符。他告诉记者，他可以肯定地说刘亮领奖时所持是一张假彩票，虽然考虑到将真相公布于众可能对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但“体彩的违法者被查出来了，要是刘亮造了假，就绝不能让他跑了”，到必要的时候，他肯定会站出来。

这后一条，至少告诉我们：媒体是社会公器，什么人都可以利用，说真话者有之，说假话者也有之，公布实情者有之，“搅混水”者亦有之；万物莫不有对，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没有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不同声音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发表出来，应该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 第八波

调包出错 刘亮幸运从天降

杨氏上任 体彩黑幕由兹始

2004年5月11日,《西安宝马彩票案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四名涉嫌造假者浮出水面》的报道,醒目地出现在大小报纸的头版。

西安市公安局向媒体介绍说,这起宝马彩票案中目前已有四人涉嫌造假,他们分别是:此次彩票销售的委托发行人、浙江人杨永明,社会闲散人员、此次彩票的兑奖员和保管员孙承贵,假冒中奖的“托儿”刘晓莉(中奖名单为“刘小莉”)和岳斌(中奖名单为假名“杨小兵”)。

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04年3月下旬在西安市进行的体育彩票发售过程中,由于体彩管理部门用人失察,监管不力,给委托发行人杨永明造成可乘之机,杨永明利用被委托发行人身份,勾结社会闲散人员孙承贵,骗领了三辆宝马车。目前杨永明、刘晓莉和岳斌已被刑事拘留,另一犯罪嫌疑人孙承贵在立案前逃跑,警方正在组织抓捕之中。涉案的宝马车也已被查封。

据杨永明供认,这次彩票销售的四个宝马彩票大奖得主中的三个得主都是他请的“托儿”,他所聘请的孙承贵也是其作案同伙,负责中奖彩票的兑奖和保管工作。在每次“二次抽奖”前,他都会把装有宝马车大奖的信封拿出来,只有他的同伙才能抽到宝马车。但在刘亮抽奖的那次,杨永明调包过程中拿错了信封,才使刘亮幸运地摸得宝马车,最终使彩票造假事件浮出水面。

那么,人们要问了,这个杨永明,和体彩中心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彩票既然是国家发行,为什么还会出现杨永明这样的个体承包商?一个四年前就造过假的人,为什么还能继续承包彩票?这中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利益关系?

原来,陕西省体彩中心和杨永明曾签有两份中国体育彩票即开型规模销售承销合同。合同规定:杨永明必须在2003年1月10日起至2005年1月9日止,完成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规模销售三千三百万元。销售地点为西安、渭南、延安

等城市。

合同还规定：杨永明负责彩票销售现场棚架、人员安全等问题，并承担一切经济风险和各项支出以及相关法律责任；在彩票销售过程中如有彩票丢失、亏款、超兑奖金、假币、票据短缺等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将由杨永明赔偿和承担。而杨永明得到的好处是：从彩票销售资金中分得 11%的发行费。

代表体彩中心在合同上签字的是陕西省体彩中心副主任张永民，他认为体彩中心和杨永明是“合作伙伴。”

然而，这种合作方式并不符合国家出台的有关规定。2003 年，财政部关于印发《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既然不允许彩票对外承包，为什么陕西省体彩中心还要与杨永明签订这样的合同呢？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彩票募集资金的分配比例为：返奖比例不得低于销售额的 50%，彩票公益金比例不得低于 35%，发行费用比例不得高于 15%，而且在发行费中还要向彩票印制单位支付 3%的彩票成本。对于彩票发行机构来说，这意味着前期投入和后期收益都只能来自于 12%的发行费。

如果以发行一千万元的即开型彩票为例，发行机构获取的发行费最高只有一百二十万元。如果发行机构在前期的投入，比如广告、场地租金、销售人员工资等方面支出了一百万元，那么在完成一千万元的销售之后，可以净赚二十万元。当然，这只是理想的结果，实际上许多彩票的发行都无法做到完全销售，比如广告宣传效果不好，或者碰上下雨天购买彩票的人少，还有其他原因等等，如果最后彩票只销售了六百万元，那么发行机构所能得到的发行费只有六百万元的 12%，也就是七十二万元，这笔收入和前期的一百万元投入相比，亏损额为二十八万元。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许多彩票发行机构往往选择和承包商进行合作。

陕西省体彩中心和杨永明约定利润分割是这样的：11%的发行费归杨永明，但杨永明要承担一切经济风险和各项费用的支出，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1%的发行费归陕西省体彩中心，尽管只有 1%，但无需承担任何经济风险。可是承包商们为什么又甘于冒风险呢？原因是在这种通常做法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对此，多年来一直在同彩票承包商打交道的郭如昌先生说：“承包商的风险

很大，他除非有猫腻才没有风险。他要有承担风险的勇气的话，他必须有应对风险的办法，应对风险的办法，其中很大程度就是要做假。用我们博彩这行的话说，叫出老千。”

原陕西省体彩中心工作人员王晓斑也告诉媒体：“发行商为了啥？发行商他是为了利益，它不是说为了公益事业。他的出发点，第一肯定是他要获利。他不获利它不会做这件事情。”如何获利呢？有两个，一是减少支出，节约成本；第二就是操纵大奖，将其据为己有。杨永明正是这样干的。

记者经过调查后指出，承包商杨永明的做假行径，在业内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但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因此被清退，陕西省体彩中心反而继续扩大杨永明的承包金额，从2003年的一千五百万元，上涨到2004年的一千八百万元。是年，杨永明甚至还被陕西省体彩中心封为即开规模彩票的销售主管。有了这样宽松的环境，杨永明造起假来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杨永明后来向警方供认，这次西安售彩中的四个宝马彩票大奖，除了刘亮是靠运气摸到的之外，其余三个大奖都是假的。杨永明原本打算把这四辆宝马车都据为己有，可没想到，刘亮会爬上广告牌，媒体介入了，事情闹大了。于是，第一个中奖者岳斌提走了车却不敢开发票——没有发票，就没有办法上户、挂牌照、办保险。而要开发票，就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件；第二个中奖者刘晓莉、第四个中奖者王军，都迟迟不敢去提车。

岳斌领奖时给西安市体彩中心留了一个身份证号，但这个号码是假的，只有五位数；而我国所有的合法身份证，其行政区代码都是六位数。还有地址：“合江县东林镇杨家五组”，经查，合江县有，但没有东林镇。还有电话，是一个空号。

刘晓莉是唯一留下真名和真实地址的作弊者。根据中奖者资料，刘晓莉住在陕西省汉中市建国十二组。负责建国十二组的户籍民警在核对刘晓莉的户籍档案后发现，刘晓莉的身份证号码是假号。刘晓莉就是用这个假身份证领的奖。

王军在中奖后的第二天，即发生刘亮爬广告牌事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和岳斌一样，王军给西安市体彩中心留下的联系电话也是一个空号。

除了手机号码之外，王军所留的地址是河南省宜阳县白杨镇。白杨镇派出所

的户籍查询系统显示，全镇共有三个王军，但这三个王军的身份证号码都与体彩中心所登记的王军的身份证号码不符，显然，王军所留的身份证号码是一个假的号码。随后记者逐一走访三户王军的家庭。调查的结果是，他们最近都没有去过西安，也没有摸过彩票，更谈不上中了辆宝马车。

那么，浙江人杨永明怎么就成了陕西体彩的“合作伙伴”了呢？

1998年的一天，时任陕西省体彩中心主任高直，把一位年轻小伙子介绍给大家。“这是小杨，南方人，今年二十八岁，别看年龄轻，但本事大，对彩票很有专长，现在请他来协助我们搞彩票发行，希望大家配合工作。”于是胖乎乎、笑眯眯的杨永明便在一片掌声中，成了体彩中心的“发行技术指导”。

当杨永明按相关规定交了四十余万保证金后，陕西的体彩发售就成了他的“摇钱树”。从1998年到2000年，两年时间杨永明参与过的体彩发售不下十次。据知情人栾文棠先生揭露，前几年即开型体彩的奖项没有现金，都是以实物兑奖。杨永明便在操作中，把大部分劣质产品低价购进，然后设成高价的奖品，从中赚取大批量的差价。期间，他还从其岳父的小工厂里拿来小产品充奖品。后来，体彩即开型有了现金奖项后，他便想出了“二次抽奖”这样的招数，用造假的方式，欺骗彩民，从中获利。2000年，体彩在西安市五路口发行即开型彩票时，就曾出现过公证奖额二十万元，实际兑奖额为五万元的“差错”，当时杨永明就是该次彩票发行的销售承包商。

关于“二次抽奖”，栾文棠认为是杨永明“想”出来的，其实仅靠杨永明一副脑子未必会奏效。国家财政部彩票顾问程阳先生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露了一下“隐情”：“杨永明一伙人的黑手，是在国家财政部妥协之后才戴上白手套的。”“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全国各地市民政局、体育局经营‘大奖组’十有八九是亏的。”程阳先生说。为什么会亏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是“即开型”，那么就很有可能一开始就有人摸走了大奖，人们本是冲着大奖来的，大奖一摸走，后边人的摸彩积极性就大打了折扣：人都不去摸了，你这个“大奖组”不亏倒成了怪事了。“这是即开型彩票的从娘胎里就带来的一个病，”程阳先生说，“当初的设计工程师也许没有想到这一点，才让杨永明一伙有了和国家财政部讨价还价的口实，各级政府部门赔不起，所以要交给承销商去担风险。”

“二次抽奖”为承包商做假提供了可能，他们可采用种种不法手段，在那个装有中奖证明单的信封上做文章，并暗中操纵抽奖，彩民则被蒙在鼓里。“这一点，正是这次丑闻的七寸要害。”程阳先生说，“刘亮在此前的购票、刮奖，都是黑手不可能操作的一个空间。进入二次抽奖，‘黑洞’就出现了。”

据知情者介绍，当时兼任陕西省体委主任的一位负责人虽不知杨永明这个具体的承包商，但得知有私人承包商参与其中后，十分恼火，严令私人承包商不许在陕西境内卖彩票。即便如此，“不知杨永明有什么门路，仍在延安等城市卖彩票”，每年一至两次。另外，据知情人回忆，杨永明自己对外宣称同时还在福建、广东一带做福利彩票的发行商。没多久，原体委主任调回政府工作，对杨永明私人承包商的“禁令”也就无人提及。于是杨永明又堂而皇之地杀回西安，并迅速与新一届省体彩中心某位负责人建立起密切关系。

2000年9月，杨永明在西安市发行总面额为三千万元的体育彩票。这次也是二次开奖，最高奖项是一百万元，中奖证明书放在被从中间剖开的皮球中，再用胶带封上。“第一组彩票快售完、马上发行第二组的时候，奖球已摸完了，要放进另外一组奖球。我突然看见杨永明用纸袋子提着球从宾馆里走出来，自己往箱子里放球，我想“这不对啊，应该是公证员和彩票中心的人当场装好、放进去的，他承包商哪能这样做呢？”当时在现场的一位知情者回忆。事后，他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一下，“但也没人去现场管”。

与陕西省体彩中心关系的密切使杨永明在西安彩票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一位知情者推测，杨永明在陕西境内其他一些城市发行的彩票份额超过90%。杨永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发行人马，“会计还是重庆大学毕业的呢。”栾文堂先生说。

栾先生曾在陕西省体彩中心工作过，对杨永明的行径早有觉察。假票事件曝光后，出于义愤，他连夜赶写了一篇《体彩违规何时休》的文稿，内容包括“东新街彩票市场有假”“杨永明‘省’了5%的营业税”“老案该揭了”等几个方面，于4月26日送到西安一家报社，未被采用。于是他又专程赶到刘亮家，将此稿作为证据，提供给刘家，支持刘家人依法维权。

栾先生指出，“3·20”即开体彩的奖项设置明显存在问题：首先，二次入围抽奖改变了即开型彩票发行“即买即开”“中奖即兑，逾期作废”的性质，给了承包商控制大奖并做手脚的机会；其次，最高奖额六十万元的（四十八万的

车加十二万现金)设置,违反了国家体彩中心和财政部作出的即开型的最高奖额不得超过五十万元的规定。另外,本次抽奖的中奖率也特别低,只有9%,而且一元钱的末等奖项设置,在彩票发行史上尚属首次(一般最低都是二元),中奖率为8%,除此之外,其他奖的中奖率也仅剩1%。

设一元钱的奖项,杨永明等人可能是抓住了人们习惯性的消费心理——排长队兑一块钱的奖不值,便选择放弃。因为它不比二元钱的奖项,中了最起码还可以再换一张奖票,获得再摸再中奖的机会。废掉一元钱的奖品,对彩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杨永明来说却是一个大数字,最后这些钱自然都落进了杨永明的腰包。

二次抽奖为杨永明掌控大奖提供了可能。这也就是说,杨氏所顾的托儿们必须在第一次摸奖时就刮中“草花K”,或者想办法弄到一张“草花K”,然后才有机会再抽宝马。这里面的“猫腻”又是如何玩的呢?

据媒体报道,3月23日,家住西安市新城区的李松(化名,35岁),和刘亮一样,也摸中一张“草花K”,不同的是,二次抽奖时,排在他前面的刘亮抽的是9号信封,结果中得宝马,他抽的是10号信封,结果中了个“奇瑞QQ”。

“当时,我也想中个宝马的,但能中奇瑞QQ也不错,就在现场办完各种手续,高兴地将车开回了家。”李松说,“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3月24号早上,杨永明却拨打了我家的电话。说昨天,有人用一张假的草花K把奇瑞QQ车提走了,我看你是个老实人,不可能干造假这件事。但我们还是希望造假者能主动承认,坦白从宽。你必须到我这里留个指纹以备查证。……我当时虽然知道自己摸到的是真票,但经他这么一说,心里也忐忑不安,结果就去留了指纹。后来,才从媒体上看到,杨永明指称刘亮的彩票是假票。”

李松认为杨永明在这儿玩了个障眼法。他想让中奖的人都知道,的确出了一张假的“草花K”,然后,他再指出哪张是假票,这就顺理成章了。

杨永明玩调包的手段披露后,李松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的命再好,也是抽不到宝马车的。因为在进行二次抽奖的时候,抽的只是号码,然后他才拿出那个号码所对应的信封,这其中杨永明在信封中放什么都行。这也就是说,当杨永明雇的托儿上台抽奖时,他就会把宝马车放到那个托儿所抽的信封中。而刘亮能抽

中那辆宝马车，是杨永明失手放错了。

关于那些托儿们如何拿到“草花 K”过第一关的问题，李松说，“……每张彩票上都有编号，这个编号是在外面的，你不刮开奖项区也能看到。这就说明，一共十二张草花 K，十二个大家都能看到的编号。如果事先有人知道了这十二张草花 K 的编号，那随便拿出几张给托儿们，让他们去刮，刮开了肯定是草花 K。”

问题是这些彩票中哪张是“草花 K”，事先并没有人知道，这些都是绝密的，杨永明又怎么会知道？李松说：“彩票也是人印刷的，杨永明显然知道什么样的彩票对应什么样的编号，这也就是说，杨永明的黑手有可能已摸到彩票印制领域了。”

这样看来，摸中“草花 K”的人，大部分都应该是杨永明雇的托儿，只有个别彩民，如刘亮、李松者，才有“天上掉馅饼”式的极偶然的幸运。这个推测在李松的眼中得到了证实，李松说：“大约是中奖后的十天左右，我去体彩中心指定车行开中奖车发票，当时他们也在开发票。我看到这些人中只有三个是西安本地人。其他的人看起来像外来打工者，他们脸上没有中奖后的高兴样。这些人虽然也中了奇瑞 QQ 车，但我怀疑他们是托儿，因为卖彩票的太黑了，不知道拿出多少张草花 K 给托儿呢。”

当然，推测毕竟只是推测，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得在全面、扎实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得出。

## 第九波

### 舆论质疑 块垒积聚待疏解

### 上级查处 官员落马丢乌纱

杨永明被刑事拘留后，不光刘亮一家人长出一口气，许多关注此事件的人也长出一口气。然而，一连串的问题又来了：杨永明一伙为何如此胆大妄为，谁是他们的支持者、包庇者？体彩监管者跑到哪里去了？在事件中，有关官员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对这些问题，《南方都市报》(2004/05/10)发表了《宝马案大白后要重“补”与“救”》的社论，指出——

“西安彩票宝马案终于真相大白，虽然此前早有有关彩票承销商一手遮天黑箱操作的揣度，但一经坐实，并且细节层层剥露之后，尽显承销商四方结网有恃无恐的‘能耐’；虽然相关人等已经被拘等待法办，但民众的积郁之气与质疑方向所指，筑成社会的块垒，已非此案目前的处理机制所能疏解。”

——“社会的块垒”这个词组用得好，我们的社会，确实有许多“块垒”，常常是旧的“块垒”未得到有效疏解，新的“块垒”又形成了。

“承销商杨永明身具作假前科而偏为相关彩票发行管理机构‘宠爱信任’，已经表明在这一番透支国家信用、取夺彩民利益的设计中，并不单单是杨永明等人的‘利欲熏心，胆大包天’作祟，更大的利益集团无疑是这一个案的坚实背景。这一次西安彩票宝马案穿帮，表面上是刘亮爬上广告牌不依不饶的功劳，实质上却是操作者掉包失误‘痛失好局’。这是一个可以令人惊出一身冷汗的真相：只要设计得当、只要操作到位，承销商及其同伙占有大奖自然百发百中，而且真彩民们也只能自叹手气有限，一次卑鄙齷齪的彩票销售便能体面地收场。如此，便不得让人生出这样的疑虑来——有些并未爆出丑闻的彩票销售，是不是一样可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

——“更大的利益集团无疑是这一个案的坚实背景”，此言入木三分！

“面对承销商的各种把戏，彩民基本上是‘瞎子’；相似彩票丑闻的例子还

证明，对彩票销售兑奖负有管理监督之职责的相关机构——其实必然要落实到相关人员，也完全可能被收买，于是彩民们便完全变成‘瞎子’。即开型彩票销售，也因此不具备一般消费领域的最有力监督，即消费者自己的监督。宝马案无疑充分地暴露出了这一行业制度上的大漏洞，但它目前的个案解决，却并不能化解因此导致的整个行业失信的危机。”

——最明显、最直接的反应是彩票售买一下子萧条了，各体彩销售点，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据媒体报道，约有六成的西安彩民“金盆洗手”，不再买任何彩票。另有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大约有四成的彩民表示不再买彩票了，“这么大的奖都有假，让人心寒”。有的彩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把杨永明一伙以及幕后人一网打尽，决不购彩”。走在西安街头，记者所看到的是“悬挂销售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招牌的销售点或门店，有的关门闭户，有的虽然开门，销售人员则或无精打采揽客或干脆伏在柜台上打瞌睡”。

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北京媒体的记者曾采访首都的一些体彩销售点，这些销售点的经营者感叹地说，自从西安宝马彩票案爆发以来，他们的销售量下降了一半，最严重时有多天没有人购买。“五一”期间，河北省福彩中心在石家庄、邢台、邯郸、廊坊、秦皇岛五市同时发售即开型福利彩票。据该省福彩中心的有关人士透露，销售情况很不理想，石家庄市连五百万也没有卖出。5月6日，石家庄市桥西区民政局在石家庄火车站广场举行的即开型福利彩票活动草草收场。“除了5月1日首发卖的可以外，其余几天则是每况愈下。”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沮丧地说，“这样的结局有些出乎意料”。“我们在筹备此次彩票销售活动时就特别关注西安假彩票案的进展，当时就担心这一事件对我们销售的负面影响，果不其然。”

有关人士分析说，宝马彩票案使2004年国家财政部给体彩下达的二百亿的销售任务，转眼成了“镜花水月”。全国知名彩票专家程阳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个案子若处理不好，“不仅会使体育彩票受到重创，而且对全国彩票业是一场灾难！”

一个名为“因酷而入狱”的网民，则将茅头直指陕西体彩中心那位“拿脑袋担保”的主任贾安庆——

“为什么不能忘了这个贾主任？不是因为他的姓同‘假’谐音，而是他的表现太有让人不放心之处。首先，我还是带领大家重温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贾某人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却要跳出来力挺造假的杨永明，甚至是拿自己的脑袋来为一个骗子打包票，这种对杨永明的爱安能无缘无故？同样这位贾主任根本不可能举证刘亮的彩票未经调包，却要甘冒身败名裂之风险跳出来威胁和攻击刘亮的律师和刘亮本人，这种恨也安能是无缘无故的？他对杨永明的爱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上海《文汇报》发自西安的消息称，据原陕西省体彩中心工作人员透露，承包商杨永明的做假行径，在业内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但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因此被清退，陕西省体彩中心反而继续扩大杨永明的承包金额，从2003年的一千五百万元，上升到2004年的一千八百万元。这位贾主任如此偏爱以造假显名的杨永明难道又是无缘无故的？”

“所以，我恳求方方面面不要忘了这位贾主任的首要原因就是要搞清楚：贾主任爱杨永明、恨刘亮及其律师的缘故何在？按照毛氏定律，这应该是有缘有故的；按人之常情，按合理推论，这也应该是有缘有故。搞清楚这个缘故意义非同小可：搞清楚了就能知道陕西造假是官办性质还是民办性质，是官商勾结还是监管不严，是把杨永明等四人关进去就完事大吉还是应该关进去更多一些人甚至包括某位主任。推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真相只有一种。比如说，我可能推论出贾主任对杨永明的爱就是看杨比别人顺眼，所以要挺他，他恨刘亮及其律师就是因为看他们不顺眼，所以要扁他们，完全没有别的猫儿腻，完全不是他与杨永明结成了什么利益共同体；我还可以推论出贾对杨的偏爱是因为他与杨是同事关系，而与刘及其律师不是这个关系；当然更多的人可以推论出贾就是与杨在合谋骗奖，贾就是官仓中的老鼠，与杨内外勾结，所以他保杨就是保自己，杨出了事自己也逃不掉，所以要拿脑袋来保杨，他恨刘亮及其律师就是害怕他们坏了自己这个团伙的好事。现在我请求司法大员纪检监察省长市长部长总理主席们明鉴，不要让我们瞎猜瞎想，拿出权威的结论：贾主任对杨的爱对刘的恨究竟是何缘故？”

“我请求大家不要忘了这个贾主任也是因为这个公仆在办理公共事务中过于蛮横无理，这个公仆对公众智商过分藐视，这个公仆对自己一手遮天的能耐过于自信。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却敢打包票，却无理辩十分，要敢于向他这个体彩中心

讨公道的律师身败名裂，要被诬陷的无辜准备卷铺盖去坐牢，这还不蛮横？一般人要断个是非曲直，总得进行有点逻辑有点事实的推理，这个贾主任却以为拿出个脑袋（当然他可能不是真的要向公众交出他的这个吃饭的玩意，这现在已可证伪了）就可以代替逻辑和事实了，这不是藐视公众的智商是什么？这个贾主任在以前把话说得那么满，那么装腔作势，这不是对自己一手遮天的能耐的自信是什么？

“贾主任撂下了句拿脑袋担保的狠话就好像人间蒸发了，陕西、西安体育部门好像也不再对公众交待什么了。我当然不指望贾主任来兑现他的发誓赌咒，事实上他正是明知公众没法要求他兑现这个发誓赌咒才发誓赌咒的，对这样的公仆他的诚信我不抱有任何幻想。但是不拿脑袋可以，拿出真相总是应该的。当贾主任不愿自己出场的时候，当老百姓千呼万唤贾主任也不理睬的时候，我看司法大员们、高官显贵们得亲自去请请高贵的贾主任了!!!”（“海阔天空”2004/05/13）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言不谬！

另一位名叫“红衣”的网民则认为，“宝马彩票案”只是陕西体育黑幕的冰山一角——

“……其间的逻辑太简单了，杨永明一个跑单帮的个体户，难道仅仅凭他运气好就可以进入根本不允许私人介入的以国家信誉担保的彩票事业？如果没有暗箱操作和交易，杨永明就算吃个豹子胆，也断没有黑吃宝马车的气魄。‘宝马彩票案’的浮出水面，实在是杨永明、贾安庆们的运气太坏、胆子太大，碰上了一个软硬不吃的陕西楞娃刘亮，想黑的是涉及面太宽的广大彩民。事实上陕西体育界至少有三层黑幕，层层都与“宝马彩票案”有关。用小平他老人家的语气说是，陕西体育界的‘宝马彩票案’迟早都会暴露，这是陕西体育界的大气候和陕西体育局的小气候所决定的。这只是迟早问题，早暴露比晚暴露好。

“陕西体育界的第一层黑幕，就是贾安庆出任彩票中心主任。几年前，贾安庆以五十大几的年龄，以资深办公室主任之尊，由当时的局长先生钦点，破例屈就彩票中心主任，似乎就为今天的“宝马彩票案”埋下了第一笔伏笔。当时有许多人甚为不解，随着‘宝马彩票案’的浮出水面，一下子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那位局长一千人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仿佛下棋的高手，布下一粒棋子，看的

是二十步以外的事。”……（“青年论坛”2004/05/27）

那位论者说“贾主任撂下了句拿脑袋担保的狠话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不能说没有“人间蒸发”的先例，但这位贾主任事实上是没有“蒸发”。

2004年5月11日，“央视国际”在“整点新闻”中就播出了一条消息：陕西省体育局今天对陕西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作出撤职（笔者按：应为“责令辞职”，同时被“责令辞职”的还有西安市体彩管理中心主任樊宏，负有直接分管责任的省体彩中心副主任张永民被责令“停职检查”）的决定，原因是3月23日在西安市即开型体育彩票发售过程中，由于体彩管理部门用人失察、监管不力、违规操作、加之相关法律不够健全，出现了假彩票事件，损害了广大彩民的权益，更损害了政府的信誉，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陕西省和西安市的主管领导，对此事件也是重视的。他们分别作出指示，要求公安机关立即立案侦查，有关部门通力协作，主动配合，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确保案件尽快侦破。之后，又多次召开协调会，通报情况、分析案情、组织力量，为案件侦破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当杨永明等三名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后，他们又就案件的侦破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抓紧侦破案件，给社会舆论和广大彩民一个好的交待。

而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在9日下午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这起事件的处理意见。11日，在回答《中国体育报》记者提问时，总局体彩中心有关人士（笔者按：应为权威人士）分析了案情发生的两个原因——

一、陕西省体育彩票中心严重违反了财政部和总局体彩中心的有关规定，规定都明确要求：“彩票发行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销售业务”，“对彩票的发放和兑奖等重要环节不得对外委托”，但陕西省体育彩票中心以承销的方式将销售的全过程委托给西安金筷子餐饮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的杨永明，并聘其为即开型彩票规模销售主管，在实际组织销售过程中，陕西省体育彩票中心又未对杨永明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和检查，使其猖狂作弊。

二、西安市体育彩票中心在具体承办销售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财政部和总局体彩中心的有关规定，将销售现场的彩票发放、中奖彩票验收、兑奖、登记以及中奖彩票的保管等应由彩票销售机构直接操作的重要环节交给杨永明等人

操作，西安市彩票中心没有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致使彩票销售的关键环节失控，给作案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从发生的这起案件看，此次销售的组织、监管等工作落实不到位。

这位人士还告诉记者，此案发生后，国务院有关领导、财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高度重视。作为负责即开型体育彩票印制和发行工作的总局体彩中心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局领导责成总局体彩中心全力配合有关部门严肃查处，总局主管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总局按照彩票管理的程序，立即下发了《关于做好西安市“3·25 体育彩票假票事件”调查处理工作的意见》，要求陕西省体育局充分依靠当地政府，组织力量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尽快破案。同时下发了《关于加强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体育部门切实加强对体育彩票工作的领导，从此案中吸取教训。

同时，总局体彩中心立即派人到西安调查了解情况，督促当地体育彩票机构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对此案的调查工作。向陕西省体育彩票中心下发了《关于严肃查处西安“伪造中奖彩票事件”的通知》，暂停了陕西省即开型体育彩票的销售。同时给各地体育彩票机构也下发了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管理工作。

这位人士表示，鉴于此案已进入司法程序，纪检监察部门也已介入，总局中心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无论此案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媒体监督在此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社会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是做好体育彩票工作的重要保证之一。我们欢迎舆论监督、配合舆论监督。在查明此案真相后，我们将责成陕西省体育彩票中心，认真做好后续处理工作，坚决维护彩民利益。我们将对体育彩票销售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举一反三，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以实际行动消除此案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贾安庆被“责令辞职”后，央视记者曾通过电话采访他。记者问他现在想对彩民说些什么？贾安庆说：“这个事情对全国确实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我道歉。”记者提及他说过的“拿人头担保”的话，贾安庆说：“这个是说我非常热爱彩票事业。我相信确实中国体育彩票它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这一点我一直坚

信，我还是要用我的生命担保。我把体彩看成和我生命一样重要。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确实不是我能想象到的，所以我对此现在也是感到自责、感到内疚。但是我原来讲用人头担保不是说担保哪一个人不去作假，而是说我们中国体育彩票不会作假。我们作为国家的发行机构，我们自己绝对不会作假。发行商作假不是我们作假。下面具体的操作中谁作假谁接受法律的制裁。”

贾的回答不过是自欺欺人式的狡辩，而这样的狡辩是不值得一驳的：发行商在发行体育彩票的时候，并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省市体彩中心，即国家的发行机构，卖的也是中国体育彩票——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且不说陕西省体彩中心和杨永明是什么关系，只要杨永明是经该中心授权销售体育彩票，杨永明的行为就应当视为代理行为，那么，事实已证明彩票有了假，彩票销售过程有了假，还能说“作为国家的发行机构，我们自己绝对不会作假”“中国体育彩票不会作假”，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吗？

值得提及的是，在被“责令辞职”前的5月7日，贾安庆已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当初冤枉了刘亮？”并对“我拿人头担保”的话在媒体上出现而感到很尴尬。他对上门采访的记者说，“我的本意并不是那样，说出那样的话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场合和环境。我本身并不是个武断的人，比较理性和客观。”当记者问及为何不向彩民讲明杨永明的身份问题时，贾安庆说：“杨永明的身份当时不方便对彩民直接讲出，因为彩民对某些政策不是很了解，怕说出来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贾安庆患有高血压症，以前听医生的忠告，不喝酒，但4月11日央视节目播出后，他却在朋友掏钱的饭桌上，一杯一杯地喝了半斤白酒，而且自言“感觉很舒服”。酒后，他对一位记者说，他的彩票生涯会因为此次事件而画上句号。

这位前主任还算有自知之明，不过怕不仅仅是彩票生涯“画上句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仕途走到尽头的问题。

在贾氏破戒喝酒的第二天，5月12日下午，陕西省体育局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大会，省体育局党组宣布了对省体彩中心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处理的决定，并派出由省体育局党组书记为组长的五人工作组，立即进驻省体彩中心，且成立由陕西省体育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任组长的调查组，在原有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有关人员违规违纪的问题，对省体彩中心的会议记录予以封存，财务

档案进行冻结，接受审计。

陕西省副省长潘连生还专门到会讲话，指出，“宝马假彩票”事件，引起了全国关注，负面影响很大，不仅损害了广大彩民的利益，给政府的公信力也造成了不良影响。……贾安庆同志作为省体彩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严重失职，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领导责任。贾安庆同志要深刻认识彩票事件的严重性，要深刻检查错误，分析根源。省体彩中心要组织工作人员，认真检查在彩票发行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正确态度对各个环节进行全面认真的整改，要使今后的体彩发行真正做到公开透明，规范操作，重塑体育彩票的良好形象。这次事件教训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向领导干部和每一个国家公务人员敲响了警钟，核心是如何用权，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对权力不能滥用，对群众不可失信。

——潘副省长在讲话中还依然称贾安庆为“同志”，这也属“中国特色”：只要没有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就还是“我们”的“同志”。

陕西省体育局局长李明华在会上也表了态，称省体育局党组坚决拥护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并认真贯彻落实，一定要从中认真总结并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对体育彩票和彩票管理部门的监管和领导。李明华要求陕西体育管理部门和体彩中心干部努力做好五个方面工作：首先，这起案件给中国体育彩票和陕西体育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体育部门要深刻总结教训，努力改进工作，省体彩中心要从党性原则、政治责任心及制度建设、用人等方面进一步深刻反省和检查。其次，此案目前还在侦破中，省体育局要全力配合，主动向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提供情况。第三，省体彩中心要稳定队伍，稳定情绪，坚守工作岗位，确保电脑体育彩票的正常运行。第四，要进一步搞好建章立制工作，从这起案件中吸取教训，查找漏洞，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尤其对彩票工作中兑奖等关键环节更要细化职责，一丝不苟。第五，对杨永明与省体彩中心来往中的所有过程、细节要核实调查清楚，如有违规违纪行为，不论涉及到任何人，决不姑息迁就，一定要严肃查处。

贾安庆等人丢官后，刘亮一方也相应地有了新的动作。5月13日下午，刘亮的代理律师毛家兴向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追加被告申请书，追加西安市体育开发中心和陕西省体育彩票中心两被告。如果法院同意此申请，那么加上

原有的西安市体育彩票中心，宝马彩票案民事诉讼的被告将由一名变成三名。

为什么要追加这两个单位为被告呢？原来，此案立案后，西安市体彩中心称其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仅仅是西安市体育开发中心的分支机构，因此才将西安市体彩中心的上级部门——西安市体育开发中心追加为被告。而根据《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陕西省体彩中心为陕西体育彩票销售的承办机构，应对陕西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体育彩票销售负责，故其也应负有奖品兑现义务，因此也被追加为被告。

同一天，新上任的西安体彩中心主任张炜向彩民致歉，说：“在此次假彩事件中由于我们违规操作、监管不严而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对此我代表市体彩中心向一贯支持体育彩票发行工作的广大彩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他表示，作为新任西安体彩中心主任，他将带领全体员工深刻汲取这次即开型体彩假票事件的教训，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的法规制度办事，凡是规定内的事情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凡是违反规定的事一点都不能做。从管理制度、操作程序、财务运转等方面认真查找漏洞，切实改进工作，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文明的工作作风，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投入到每一天的工作中，以严格规范的操作取信于民。切实落实“全心全意为彩民服务”的工作宗旨，以实际行动维护体育彩票的社会信誉，重塑体育彩票良好的社会形象，“为我市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做贡献”。

## 第十波

### 董萍懵懂 不知其懂些什么 公证不公 何以公信于天下

随着宝马彩票案作假内幕的逐渐揭开，公证机关在这次事件中法定职责的履行问题也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我们先看看什么是公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的解释，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公证的职能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2) 通过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从而维护经济流转秩序和各种民事活动的顺利进行；(3) 通过办理公证，教育公民遵守法律，维护社会主义法制；(4) 预防各种经济和民事活动中的纠纷，减少诉讼，促进社会稳定；(5) 促进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而保障对外开放的顺利实施。

按有关规定，公证员出去公证时，应该是两个人一组，这样既可以相互监督，也可保证公证过程更具公正性。3月23日刘亮二次抽奖时，现场公证员是来自西安市新城区公证处的董萍，和她一组的贺永红不知何故没有出场。

董萍这样描述当时刘亮抽奖的过程：体彩工作人员首先对刘亮的草花 K 进行登记；接下来她拿出四个纸袋，上面分别写着 1、2、9、10 的字样，刘亮从她手上抽取了 9 号袋，她撕开纸袋后，现场大声宣读了结果——“宝马车+12 万元现金”。

公证申请表也填了，第二次抽奖也结束了，当众也宣布了，为何不给刘亮出具公证书呢？公证人员又是什么时候知道刘亮的中奖彩票有假票嫌疑呢？

就这几个问题，有记者连续问了三遍，董萍都抿嘴不答。

随后，新城区司法局副局长陈文社解释说：没有出具公证书有许多因素，外面传说是没有及时交公证费，没有交公证费只是一个因素，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至于还有什么因素，陈文社沉思一阵，选择了不回答。

二次抽奖时，装有“宝马”的信封实际上都在杨永明的控制之中，只是杨在调包中拿错了信封，才让刘亮幸运地抽走“宝马”。显然，装有奖品的信封是公证监督的关键，公证人员又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呢？

对此，陈文社的说法是：信封的密封工作是公证员密封的，没问题，是严格按照规定做的。还强调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没有证据表明公证人员有违法犯罪行为。公证人员没有和体彩中心的造假者有串通行为。

那么，密封之后交给谁了呢？

新城区公证处主任郭岚回答说：公证条例里对此没有明确规定，都是大家工作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我们当时将密封的信封交给体彩方保管过夜，这是体彩中心提出的。他们提出彩具、包括装有大奖的信封由他们保管，并出具了财政部对此的有关规定，公证员也就同意了。

财政部对此有什么样的规定？还有，为什么公证处给杨永明的三个托儿都出具了公证书，而不给刘亮出具呢？本次体彩抽奖活动公证处有无程序漏洞？到底是几名公证员参与公证了？公证员在该事件中又充当了什么角色？此次公证到底是全程公证还是局部公证？三个托儿的公证费又是怎么收的呢？此次事件的发生是相关法规的不健全还是人为的疏忽？

对这些问题，郭岚都以“现在公安机关正在调查该案，法院正在审理”为由，不作回答。

公证员董萍第一次面对记者时，还侃侃而谈，显得颇为自信。但随后体彩中心公布了中奖者的资料，假身份证之事浮出水面，记者再次要求采访董萍，但她始终没有露面。郭岚解释说董萍因为身体不舒服请假了。

据说，从4月27日到5月16日，西安市新城区公证处“开始集体教育整改”。有记者就此事问郭岚，是总结经验还是总结教训？郭岚回答：是总结工作。

和公证机关向媒体的解释不同，5月13日，“3·20体彩”最后一位获得大

奖的彩民王先生开着他摸中的奇瑞 QQ 到华商报社，向记者崔永利讲述了自己中奖兑奖的经过，认为现场公证人员的一些行为令人不解，最后导致他与宝马无缘。

“3月25日下午4时许，我乘车路过体彩抽奖现场，”王先生说，“由于堵车，我下车后买了十张彩票。大约下午4时20分，我刮第一张彩票时，上面显示是草花K，我高兴得没再刮其他奖票，立即上到领奖台上兑奖。在保安的保护下，领奖台上一位很像杨永明的南方人接待了我，他在验完我的票后说肯定有车，收了奖票后装进随身背的黑皮包内，要我在兑奖前给他买香烟。我说我一个人过来兑奖，如果我下去买烟回来你不承认我中奖，我该怎么办？对方就再没提买烟的事。”

“在领奖台上，两位公证员和上面提到的那名南方人都对我说，这是第五组彩票，目前已经抽出了八辆奇瑞 QQ，还有两辆车没出来，一辆是奇瑞东方之子（价值仅次于宝马），一辆是宝马，所以我最低都能摸到奇瑞东方之子。我有些喜出望外了，立即在领奖台上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说我将要摸到宝马车了。”

“下午4时半，一位高个女公证员让我从仅剩的两个装有大奖的信封中选一个出来，一个是2号信封，一个是10号信封，由于我平时对2偏爱，就毫不犹豫地选了2号信封。公证员立即将2号信封拿出来，却没有当场开奖。而是拿着2号信封从领奖台消失了，这一走就是近两个小时。其间我多次催促低个公证员赶快兑奖，低个公证员说拿信封的公证员出去办事去了，等其他彩民兑完奖后再说。”

“好不容易等到下午6时15分左右，高个公证员拿着2号信封从外边回来了，信封打开后里面是一辆奇瑞 QQ，当时我很失望，就没领奖。但还是给公证员交了五百元的公证费，收款人签字一位姓董，一位姓陈。随后公证员给他出具了公证书。”

“3月26日，体彩抽奖活动结束。我从报纸上看到刘亮抽奖的经历，就抱着等等看的想法，一直没领奖，等待事情发生转变。最后看着事件越来越大，我担心再不领车连到手的车都开不走，于是4月1日，我开走了奇瑞 QQ。”

王先生提供的情况很值得做一番调查，按道理应该及时开奖当场兑奖，可公证员拿着王先生选中的信封突然离开，时间长达近两个小时，这段时间公证员干什么去了？

从刮中草花K到抽取大奖前，彩民必须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持本人身份证进行中奖登记；第二步是进行公证登记。按照公证工作的程序，这两个步骤都是对参加二次抽奖彩民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查，从而保证大奖的真实性。因此，在这两个步骤中，公证员都必须全程实施监督，并对相关的证明材料进行证据保全。

那么，董萍等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将中奖登记这一重要环节，大撒手地交给了杨永明雇用的搭档孙承贵，自己则呆在一边，既没有检验中奖彩票，也没有审查身份证。对这样的明显的失职行为，董萍将责任推给了体彩中心，说“按照方案的规定，由市体彩中心进行中奖登记，然后再进行公证的登记”。

接下来的公证登记，按说应该特别仔细地审查了吧，可事实是，董萍等人仅仅核对了一下登记表上的身份证号，跟实际身份证上的号码相符的情况，就大笔一挥，开具了至关重要的公证书，而对中奖者所持的身份证的真伪就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查，以至于杨永明的三个托儿都以假身份证顺利地通过了公证关。

对此，董萍的解释是：“现在身份证造假太厉害了，而且造得相当真。在目前的情况下，身份证造假的条件下，肉眼是无法辨别的。”又说：“从我们所看的，反正没有看出来。只能看出真的，造得像真的。杨小兵的身份证，还是防伪的。”

面对媒体的追问，董萍有些难以招架。她大概没有意识到，不提这个杨小兵还好些，提到这个杨小兵，更使她的脸没处搁：杨小兵的身份证假得太明显了，其行政区代码只有五位数，而有效身份证的行政区代码都是六位数，身穿国家公证员制服的董萍女士，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董萍说杨小兵的身份证是防伪的，央视记者就提出要求，看看杨小兵的身份证复印件，董萍拿不出来，回答说“没有保留”。记者问：“按照规定应该留吗？”董萍答：“应该的。”记者再问：“为什么没有留？”董萍答：“因为一个，当时是即开型的，现场也不具备这个条件，再一个就是当时我们也看了他按照这个登记，按照身份证进行登记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按规定办事。”

——什么叫“现场也不具备这个条件”——留一下身份证复印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叫“可能没有按规定办事”？“没有按规定办事”的原因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公证处对不真

实、不合法的事实与文书应拒绝公证。”杨小兵的身份证明明显是假的，你董萍拒绝了吗？为什么不拒绝呢？

人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董萍同杨永明的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西安市新城区举办的、由杨永明承包的几次即开式彩票销售中，董萍都是现场的公证员。而对这几次销售中的中大奖者的身份证复印件，董萍都没有保留。

不留身份证复印件，对于一个公证员来说，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董萍为什么屡屡犯这样的错误而没有得到纠正？当央视记者将这样的问题提到新城区公证处的负责人郭岚面前时，郭岚说这是董萍工作的失职。记者问：“这个失职严重吗？”答：“比较严重。”记者再问：“你批评过她吗？”郭岚沉默不语。

按照公证工作的要求，中奖证明单在封存之后，应该始终处在公证员的有效监督掌控之下，而事实是从封存到二次抽奖之前的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些证明单一直由杨永明和他的搭档孙承贵保管。在这完全失去监控的十几个小时里，杨孙二人如果要对证明单做手脚，那可是太容易了。

对这个问题，董萍回答是：“放在谁那儿进行保管，目前还没有明文规定。就等于是那种承办方保管，那他也是申请方。”

面对央视记者的质询，董萍的回答支支吾吾，给人的感觉是想回避又不能回避，想搪塞又无法搪塞，尤其是那句“就等于是那种承办方保管，那他也是申请方”，用一句陕西话来说，就是“胡黏”。央视的“焦点访谈”看的人很多，过后谈及董萍镜头前的表现，有人评以“丢人丧德”四个字。这位公证员大概还没有意识到，她不仅丢了自己的人，丢了陕西的人，也丢了公证的人，丢了国家的人。

2004年5月13日，“央视论坛”做了一期关于西安宝马彩票案的节目，内容涉及公证问题。“宝马彩票案子里面，公证机关的作为让我大失所望，也就是说与彩民依托的如果有两道墙：第一道墙是彩票中心本身管理的规范，如果这道墙倒了，现在应该还有公证机关撑着。现在看来这堵墙也是倒的，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彩民通过这个事件，对西安体彩包括公证机关的信任，是深度的不信任、双重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公证机关和体彩中心自己造成的，如果体彩中心在里面有猫腻，我们怀疑的仅仅只是彩票、彩市，如果与公证也出现问题，我们怀疑的就不仅仅是局限于彩票了，我们也许就会想到很多以前他们公证的是

不是真正做到公平和平等了呢？……这件事情往小处说，彩民受到损失是金钱上的损失，但如果往大处说，一旦信心受到伤害的话，彩票市场受到的伤害，恐怕就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出来的。”主持人如此说。

对此，彩票业、公证业人士的看法不一。

《北京青年报》报道（2004/05/10）说，由于中国目前《彩票法》缺失，彩票的公证工作基本上都是依据相关管理条例来执行，以北京市公证处为例，全年受理各种公证超过三十万件，而彩票公证一年只有几百次，比重很小，而覆盖面很广的相关公证管理条例不可能对彩票公证进行面面俱到的特殊约束。正是因为相关法律建制的不足，使得很多具体情况的处理找不到法律依据，甚至在“公证应监督的是摇奖结果还是摇奖过程”这一重要问题上也存在意见分歧。

北京市公证处吴凤友副主任表示，“有一条原则非常重要，那就是在彩票公证中，公证方维护的应是彩民利益，这是公证职业道德的要求。”吴凤友表示，彩票开奖这样的社会活动因为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通常没有公众的参与，公证员的作用既是“执法者”、监督者，又是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保护者。“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一个彩民在中奖几率面前的平等。”

彩票公证究竟监督的是哪些方面？北京市公证处公证员王建认为，彩票现场公证就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中立的、不偏不倚地监督活动的主办者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活动的批准文件、活动的预定规则举办活动。”但是，王建也强调，“公证不是万能的，公证员不是现场总策划，总导演。就一项具体活动而言，如果主办单位申请公证，而公证不能有效地实施监督，申请的项目没有可操作性，或按其申请的环节公证对公共利益缺乏保障，公证处可以拒绝公证。”

更多的舆论则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公证危机。

《阳光报》推出一期“公证危机”的专刊，指出，在宝马彩票案等事件中，代表国家的公证所暴露出的问题使公证的公信力急剧下降。古代中国民间社会里，所谓的“中人”，就相当于现在的公证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中人的公证，完全依靠传统社会的道德、文化约束，并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如果弄虚作假，损失的将是中人自己终生的信誉，这样的损失没有人愿意背负。现在的公证，是国家行为。人们不在乎公证员黑白俊丑，他们所看重的是公证员所代表的国家。公证员不是用自己的信用，而是在用国家信用作担保。

无独有偶。在三年前的湖北体彩中心“4·20体彩案”中，公证人员给人留下的也不是什么值得信任的形象。他们“之前公证开奖有效，之后证明彩球有假”，首鼠两端，令人生疑。那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呢？

据《南方周末》报道，2001年4月20日晚7时30分左右，湖北武汉洪山体育馆开奖现场坐满了人，其中有两个女公证员，三个搞直播的电视台工作人员，一个体彩中心的礼仪小姐，一个报奖员，其余是分别来自黄石、宜昌及武汉本地的彩民代表，现场共有五十多人。大部分彩民是第一次到现场观看开奖，都显得颇为兴奋，摇奖大厅气氛很热烈。8时整，省公证处两位女公证员宣布本次开奖的摇奖器具完整。

一位黄石市彩民被邀请上台做开奖嘉宾，他按下了摇奖机按钮，七十个乒乓球一下子都掉进了搅拌器里。随着三个搅拌杆的转动，七十个乒乓球在容器里翻滚、跳动，其中一个乒乓球很快落进了容器的出奖通道。紧接着，第二个奖号也出来了，第三个乒乓球也出来了，落进了出奖通道，这是一个7号球。但是，这个球被卡在了通道的出口处，掉不下来。后面紧接着又下来了第四、第五两个球。

一位体彩中心工作人员用手将被卡住的7号球拨了下来。彩民们的议论声顿时高涨。工作人员把被卡住的第三个球拨下来后，第四、五、六、七个球也跟着下来了。

中奖号是9071731。公证员宣布这个中奖号真实有效。

一个黄石市的彩民站起来抗议，他说第三个球是工作人员用手拨下来的，不能算数，并要求当场检查全部奖球。

经同意，两位彩民走近摇奖机，戴上白手套，开始验球。“啊！”他们同时发出了惊呼。其中一个人高高举起手，托着一个乒乓球，现场的全体人员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看见的这个乒乓球变形了，表面坑坑洼洼，像是用手捏瘪的，在乒乓球的接缝附近还有一道约3厘米长的裂口，边缘很整齐，像是被利器割开的，而且，在两个半球的接缝处还有明显的类似于凝固后的胶水的痕迹，对着灯光，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异物的模糊黑影。这是一粒7号球。大厅里顿时炸了锅。

那两个彩民继续验球。他们又整整找出了另外五个类似的问题球。

这样，在用以开奖的七十个乒乓球中有六个被人为做了手脚，其中包括一个

9 号球，两个 7 号球，三个 1 号球。

两个公证员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迅速地和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躲进了电视台的直播工作间。

湖北省体彩中心的主任走过来对大家说要把第一次的开奖结果作废，再进行第二次开奖。他的话被大家愤怒的指责淹没了，大家提出要体彩中心给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二次开奖必须在媒体、公安部门、公证部门、省体育局和彩民五方代表都到齐的情况下才可进行。

快 10 点的时候，终于来了几个记者。六位身穿制服的警察走进了大厅，被介绍说是水果湖派出所的民警，其中那位年纪较大的是余所长。

彩民要求现场剖开一个球。有人建议：“让公证员来。”两个女公证员立即推卸：“这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要割你们割，我们在旁边看就可以了。”又有人建议：“让警察来吧。”

那位所长走到了摇奖机前的一个台子前。一个 1 号球被放在台子上。由于里面放了东西，它竟然连滚都不滚动一下。派出所所长拿起美工刀说：“那我就把它剖开看看。”小小的乒乓球很快就被一分为二，在其中一半的底部，一枚约有小拇指指甲盖般大小的六角形螺帽被透明胶带固定在球壳上。

现场一片哗然。那位所长宣布：“很明显，这是人为的、有预谋的破坏，我们宣布对此正式立案。”几个彩民围住了公证员要她们写一份公证书并签名画押。经请示领导，她们在一份公证书上面签了名并按了手印。

这份公证书全文如下：经现场监督，我们证明 2001 年 4 月 20 日 20 时 40 分，在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开奖现场，水果湖派出所余所长现场剖开的 1 号球内有一枚螺帽。

5 月 13 日，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政府、西安市司法局宣布吊销董萍的公证员执业证，并责令新城区公证处主任郭岚停职检查、新城区司法局局长赵小丽作出深刻检查。

## 第十一波

**威海就擒 孙承贵写书悔过**

**陕北作秀 杨永明建校买名**

现年三十一岁的孙承贵是杨永明的一号搭档，杨永明将现场兑奖和保管大奖彩票的“重任”交给了他。

宝马彩票案曝光后，公安民警曾两次找孙承贵谈话，了解情况。孙承贵做贼心虚，预感到情况不妙，就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是4月9日关掉手机畏罪潜逃的，此后一个多月没有音讯，真有点“人间蒸发”的味道。

孙承贵祖籍山东省威海市，生于1973年。1994年，二十一岁的他曾开着车跟朋友一起偷盗过单位的物资，不久朋友被抓，他侥幸逃脱。后辗转流亡到陕西汉中，娶了妻子，生了儿子。此案发后，有记者在汉中市民主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孙承贵的租住处，孙的靠织毛衣为生的妻子在，读小学的儿子在，孙承贵却无踪影。谈及彩票案，孙妻泣不成声，说自己的丈夫无权无势，只知道打工挣钱。

“3·20宝马彩票案专案组”成立后，把抓捕孙承贵作为一个工作重点，因为孙在此案中举足轻重，如果抓不到孙，即使杨永明交待得再多，也因缺乏佐证而功德不全。于是，曾兵分多路，赶赴陕北、山东、浙江、贵州等地追捕孙承贵。后来，警方将目标圈定在孙的现住地汉中，和其老家威海。

4月28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向威海市公安局发出协查通报，要求协助抓捕陕西“宝马彩票案”重要嫌疑人之一的孙承贵。随后，威海市公安局又接到公安部下发的关于抓捕孙承贵的通缉令。因孙承贵是荣成市埠柳镇人，他的很多亲属和朋友都住在威海，因此警方分析，孙承贵潜逃至威海的可能性较大。

威海市公安局马上成立了专案组，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警力及社会资源，在汽车站、火车站、码头及一些出入威海的路口卡点设卡，二十四小时值班检查。同时，在厂矿企事业单位加大宣传力度，向市民们发放警方悬赏两万元捉拿孙承贵的通报，对接触犯罪嫌疑人几率较高的出租车司机做到人手一份，并在孙承贵

较有可能躲藏的市区寨子、戚家庄及荣成埠柳、石岛等地进行了重点布控。

5月14日下午，办案民警在排查时了解到，在威海市市区戚家庄一菜市场附近，有人发现一男子与孙承贵的体貌特征极其相似。随后，警方对周围1.5公里内的地形进行勘察，精心绘制了地形图，并拟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

当晚6时25分，一行动小组了解到，孙承贵很可能藏身于即墨路1号住宅楼。该小组马上将这栋居民楼包围。两名民警敲开一楼一间“草厦子”（当地土话，指用于堆放杂物的房间）的门，发现屋内有一名男子，随即进行了盘问。民警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男子答道：“孙承贵。”“知道我们找你干什么吗？”“知道，关于西安体育彩票案的。”随后，警方将孙承贵带走。据警方透露，孙承贵被捕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嘴中说道：“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东躲西藏得很难受，不仅身体吃不消，心理压力也很大，一直想自首。”

当晚7时许，孙承贵被押至威海市公安局，民警随即向陕西警方通报了孙承贵已被抓获的消息。陕西警方办案人员从所住宾馆一路飞奔1公里多赶到市公安局，确认该男子正是警方追缉的“宝马彩票案”涉案人员孙承贵。

据报道，5月15日上午，《威海晚报》和《齐鲁晚报》的记者曾随威海警方来到位于威海市区南部的戚家庄小区，这个小区比较偏远，住户不多。孙承贵租住的是即墨路1号楼东单元的草厦子。这是一个僻静的住处，仅有六七平方米，光线很暗，即使在白天也要开着灯。靠墙处摆放着一张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小床，床上凌乱地堆放着一床棉被，肮脏而潮湿。地上放着两个空的啤酒瓶和几个空烟盒。床头熨衣架上放着一台旧彩电和一张全国地图，床边地面上一个小木板上摆着一些简单的炊具，一碗吃了一半的虾酱里还放着一个干巴巴的小馒头。屋内空间狭窄，一张写字桌上胡乱地堆放着一些报纸。记者翻看后发现，《威海晚报》《齐鲁晚报》《民主与法制》等媒体关于陕西“宝马案”的报道都被单独抽出来放在一边。显然，在逃亡时，孙承贵对他参与的这起“宝马彩票案”仍然十分关注，通过各媒体的报道来了解案件的进程。

在写字桌的抽屉里，办案民警发现了一份类似悔过书的书面材料，在这份材料中，孙承贵以陕西警方一名“马队长”为叙述对象，披露了自己如何协助杨永明在销售彩票过程中作弊的行为。他写道——

“尊敬的马队长，我是孙承贵，我于1994年伙同朋友在当地库房里偷了一

些物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同伙一一落网，我当时不在家逃脱，从此走上了逃亡之路。好人坏人只一念之差，事后我后悔不已。天有不测风云，出来后没多久我患上了严重的乙肝，多次想投案自首，但联想到监狱的生活，考虑自己的身体，怕有去无归，所以一次次退缩了。在这十年里，我孤身一人在他乡忍受着恐惧、思乡、病痛、生活、经济的各种压力，去年我父亲病了，我做儿子的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回家看看。”

“……这十年里，我先后摆过地摊，卖过水果，后来买了一辆小货车。2002年，杨永明到汉中发彩票租车的时候找到了我，二人开始相识，并开始合作。其实我跟杨永明也就是一年，一般就是开车、布置、送奖……挣不了多少钱，只是觉得好玩儿，租车每天一百元，再发点补助费，一个市场不到一个月，能发三四千块钱，除掉人和车的费用，也就剩下一千多块，而且不是长期干活。他一向我行我素，很少跟我们讲业务上的事。这次事发后，我觉得自己只是个打工仔，其他都是杨永明指使干的，实在划不来为他顶这些，所以，情急之下我走了。据我观察，在2003年中，杨永明开发的市场都不太成功，去年西安亏损了，宝鸡亏损了。”

孙承贵给自己准备了两条路：一是向公安机关自首，坦白以前的罪行；二是“走完该走的地方以后，选择死路”。关于第一条路，他写道：“我知道自己错了，再也不想东躲西藏了，由于最近此事闹的，我病情恶化，已经早期肝硬化了，现在正治疗，这个疗程一完，我将马上投案。”

2004年3月18日，也就是本次体彩销售开奖的两天前，杨永明找到他，让他找两个人冒领大奖。于是，孙承贵找到了两个人，并分别付给他们两千元钱。3月20日开奖第一天，杨永明没用他找的人，而是用了一个自己找的叫岳斌的人，化名杨小兵。杨永明从孙承贵那里拿了一张别人中过奖的奖票，让杨小兵上台进行二次摸奖。

孙承贵说，具体哪个信封里装的是大奖，他并不清楚，“每次这组快完了，杨永明便告诉我下组几号是大奖。”为了不让别人把号（可中得宝马轿车大奖的二次抽奖号码）选走，杨永明让孙承贵打印了一份出奖表，上面一组十二个号，选中了就打对号勾掉。所以，大奖一般被勾掉了，但自己人上来选时，就换一张大奖没被勾掉的表。3月20日、22日、24日，杨小兵、刘晓莉、王军三个大奖

都是这样安排的。“但3月23日刘亮那个，杨永明本来就让我正常出，所以我没勾，没想到刘亮上来后也恰好选中9号抽出宝马。”

——在孙承贵藏身的“草厦子”里，办案民警方找到了几张《2004年西安市6000万元即开型体彩销售特等奖中奖登记表》，在标注为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中奖登记表中，发现了两位大奖得主杨小兵、刘晓莉的名字，中奖栏中都注明了“宝马”，而另一张标注为第三组第九号的刘亮的中奖栏中，不仅奖品为空白，而且整个栏目也被钢笔划掉了。

5月16日夜间，专案组成员押解孙承贵乘机飞回西安。



图十一 1 孙承贵被抓捕归案（资料图片）

孙承贵的归案，意味着宝马彩票案距真相大白更近了一步。

刘亮的律师毛家兴告诉《三秦都市报》记者，杨永明等人利用即开型彩票进行诈骗是刑事案件，而刘亮以合同纠纷起诉西安市体彩中心等单位，是民事案件。因此，孙承贵的落网对杨永明等人的诈骗案会取得更多的证据，当然对刘亮

的民事案件也有一定的帮助。

刘亮的父亲告诉记者，孙承贵落网是让人高兴的事，对还刘亮一个清白、还体彩一个公正很有利，对恢复国家部门的公信力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现在的身体健康也有所恢复，压力比以前小多了。”刘耀利说。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暴露了杨永明造假劣迹的“渭南体彩风波”。

那是2002年12月1日，渭南市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活动的第二天。午后，一个叫吴莉的彩民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台前，她玩似地掏出四块钱买了两张彩票，没想到其中一张就刮中了“铅笔图案”——本次体彩的大奖符号。大奖分三个等级：二十五万元、五万元和一千元。能中其中的哪一级，得靠二次抽奖来决定。二次抽奖的第一步是手伸到一个箱子里，摸里面放的乒乓球。吴莉手气好，一下子便摸到了26号球，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接过球，当即宣布：“26号球。”接下来的第二步是对袋子上的号，并将袋子里的档案袋取出来当众宣布。当时26号袋子里的档案袋还在。此时一个负责人模样的男子突然大声质问：“是不是26号？”聪明的吴莉看那人脸色有些异样，就抓住工作人员的手，将乒乓球展示给那男子看：“就是26号，你自己看！”“不可能，不可能，26号球昨天已被人摸走了！”男子恼恼地说。吴莉很生气，就同那男子争执起来，这期间她眼角一扫，发现26号袋子里的档案袋已经不见了！

这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纷纷凑过来，反复劝说“再摸一次吧，再摸一次吧”。吴莉见状，心想再摸一次就再摸一次，看你们还能玩什么花招。这次摸出了个22号球，工作人员将22号档案袋取出，抽出袋子中的纸，宣布她中了一千元现金。吴莉意识到她可能被人耍了，就坚持要求那男子将26号档案袋拿来。男子只好叫手下人将袋子拿来，但里面已经空空的，没有标明中奖金额的纸条了。“我说26号已被人摸走了，你还不信，这下相信了吧？”男子说。这时候吴莉忽然发现，档案袋的背面有“25万……”的钢笔字样。“莫不是我中的的是二十五万元的头奖，他们不想给我？”

吴莉越想越不对劲，就同丈夫一起去找渭南市体育局反映，接着，吴莉的丈夫还把一位在政府里当主任的朋友也叫了来。三个人一齐向那位负责人模样的

男子讨说法。男子说不过去，扛到晚上 12 点，提出了赔偿三万五千元以了结此事的建议，还写下一张欠条：“今欠现金叁万伍千元整，12 月 3 日中午 11 点归还。”落款是“杨永明”。第二天上午，吴莉从杨永明手中拿到了三万五千元现金。宝马假彩票案发生后，吴莉看报道，猛然想起来，这个杨永明，不就是两年前在渭南卖彩票的那个“杨永明”吗？

“渭南体彩风波”发生后，渭南市体育彩票管理站站长庞清峰曾赶到现场。他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杨永明解释说，第一天销售活动结束后，他忘了销毁已被人摸出的彩球，而是随手扔在了车里。时任省体彩中心副主任、并担任该场彩票销售监督的张长安借用了他的车去了趟大荔。将车还回后，杨永明已经忘了这个球是被摸出过的，于是又扔回到存放剩余彩球的箱子，导致了第二天的“意外”。

——杨永明说起假话来，往往让人觉得跟真的一样。其实，26 号是这次体彩中的唯一一个大奖，他当然是知道的，于是就事先取出来，藏在了自己的汽车里。没想到忙中眼花，把球给藏错了。

“渭南体彩风波”后，杨永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在 2003 年底，经过省体彩中心批准，再次带着他的一干子人马，到渭南发售全省联网的即开型体彩，此次规模比 2002 年大得多，范围不仅在渭南市区，还扩展到了大荔、蒲城和韩城。

有意思的是，杨永明在 2000 年的时候，还给陕北子洲县山区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

据《华商报》等媒体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9 年春季，延安体彩管理站主任李智文到西安开会，会间与杨永明闲聊，杨永明听说子洲县李孝河乡跃进梁村非常贫困，学校在一个沟底，一百二十多名学生挤在九个小烂窑洞内，崩塌的土方多次将这些窑洞淹没的情况，就承诺联系深圳一个朋友捐资给该村兴建一所学校。到了 2000 年，杨永明还没有联系好此事。随后，杨永明便答应由自己来捐建。如此，李智文便联系了子洲县政府有关方面，并同子洲县政府有关方面人员来到西安，在省体育宾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杨永明当场捐赠了十万元现金。此后，在建设过程中，杨永明又多次捐赠钱财、电视机、图书等物品，总价值约二十三万元。

“永明希望小学”坐落在跃进梁村中间的山顶上。共十八间平房，其中的十二间做了六个教室。学校中心，有 2001 年 8 月 30 日村委会立的一个纪念碑，其正面刻着：“中华复兴，科教为本，捐资兴教，垂范百世。杨永明先生，浙江湖州漾西镇人。2000 年 10 月捐资二十万元修建该校。为了弘扬这种精神，以示后人，特立此碑。”

至于杨永明捐建学校的钱从何而来，李智文说他不知道，跃进梁村大多数村民当然也不知道这些钱财和体育彩票之间的关系。熟知其个中内幕的是曾在省体彩中心做过“财务指导”的栾文棠先生。栾先生称杨永明的捐资建校之举不过是一场“洗钱”的表演。

据栾先生反映，2000 年 9 月，财政部门刚刚接管彩票之时，当时实物返奖活动因为“问题”太多已经被叫停，只允许“现金返奖”。财政部文件规定即开型彩票头等奖最高不能超过五十万元。但当年在西安和延安两地搞的两次即开型体育彩票头等奖却为一百万元，严重违反财政部文件规定。而且，那次给承包商的发行费高出了体育总局规定的三个百分点为 12%，仅西安市五路口一个市场，承包商就多得发行费至少一百八十万元。

这样的违规行为当时就被人质疑，头奖设成一百万，承包商究竟居心何在？很明显，一个是诱惑彩民买彩，一个是作假后“收获”巨大！而承包商这次多得的那三个百分点的发行费，违反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1996 年 77 号《通知》而逃漏了营业税。这些情况当时已经引起了很多知情人的愤慨，在有关部门准备介入调查时，杨永明害怕了，便想进行“洗钱”，于是就选择了在延安捐资建希望小学这种“镀金”方式，后来竟然被其逃脱了一场审查风险。

栾先生说：“拿着该属于国家的钱作秀，还冒充希望工程这个品牌，简直是欲盖弥彰！”

有关资料证明，杨永明捐资建校，陕西省体彩中心是完全知情的。

对杨永明的“善举”，四川的朱胜国先生指出，“或许我们应该承认，‘永明希望小学’确实为改善山区的办学条件做了贡献，但违法赚取黑心钱并借以逃脱惩罚的杨永明，却因此被淳朴的村民们奉以‘垂范百世’的敬意，却不能不说是大讽刺。这个现象提醒人们思考，捐资助学固然是做善事，但前提必须是搞清

捐赠者资金的来源和行为的动机。要不，别有用心的捐赠不仅会对人类良心造成伤害，还会成为违法谋利者胡作非为的一块挡箭牌。”

朱先生认为，栾先生的指责实际上代表了公众的心理，但杨永明仅仅因为“拿着该属于国家的钱”做了人情，就因此在“事业”上更加变本加厉。对此，负有指导和监督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对此没能及时察觉，也应该深刻反思。试想，如果杨永明在四年前就受到了查处，彩票市场会出现如此震荡、彩民利益会遭到如此严重损害的舞弊案吗？

扶贫济困是一种美德。对于富人来说，捐资兴建公益事业，既可以让社会通过“第三次分配”进一步体现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也昭显了富人值得称道的一种品格。但是，这一切应该建立在捐建者资金来源的光明磊落和不求回报的纯正动机上。一个想通过捐赠行为来“洗钱”和沽名钓誉的富人，其心怀叵测的虚假捐赠无疑是对人类美德的亵渎。当然，对于受捐者来说，要求他们了解捐赠者的资金来源和捐赠动机是过于苛刻的，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应该切实负起这个责任。（《三秦都市报》2004/05/19）

应当指出，用不正当的手段堆山揽海地捞钱，然后伸出一个小拇指头，下点毛毛雨，做点捐赠，建校助学啦，修桥补路啦，扶危济贫啦，等等，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杨永明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对杨永明之类的捐赠者来说，这种行为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逃税躲审，二是沽名买誉。他花的是一根牛橛的钱，得的却是整头整头的牛；而名誉这玩意，又和尊严、地位、价值实现，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利益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又为其进一步地用不正当的手段堆山揽海地捞钱做了掩饰和铺垫。

## 第十二波

### 角色分析 看杨氏何许人也 关系排列 知官员权倾谁家

杨永明是西安宝马彩票案中的“男一号”，有关此人的身份，人们看到过多种：“浙江人”“奖品供货商”“发行技术指导”“业务主管”“工作人员”“合作伙伴”“销售主管”“发行代销商”“彩票承包商”“造假者”“诈骗犯”等等。

对此人的印象也说法种种，有的说，“看起来很忠厚，整天都是笑眯眯的，好像从来不会发火。”有的说，“精明、不张扬，努力均衡各方面利益。”“总是想把事情弄得很圆满，不愿得罪人，小心翼翼地谋求自己的利益。”“面相非常诚恳，脑子极其聪明，说话滴水不漏。”有的说，“算盘很精，为铺垫关系不惜投入时间和金钱。”有的说，“在普通老百姓完全不能想象的体彩世界里，此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所有黑幕的一个‘活扣儿’。”“一个笑口常开的狡诈之徒，一个贪心的不法商人，一个胆子很大且善于伪装的骗子”。

杨永明的出生年月是1971年3月，到宝马彩票案暴发时的实足年龄是三十三岁，不过看上去年龄要大一些。他长着一米七五的个头，头大脸圆，有点发福。

杨永明的老家在“浙江省湖州市漾西镇××村”。为了摸清杨永明的底细，《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李菁从当地查号台查到这个村登记的办公电话，拨过去一直无人接听。李菁换了个尾数随意拨打另一个电话，接电话的听起来像位中年妇女，她告之自己正是漾西镇居民。未等李菁说明来意，对方听到“杨永明”这个名字，便传来轻轻的笑声：“杨永明，当然认识了！不过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上次在电视里看到他，我还说，咦，杨永明怎么上了电视台了？”

据这位妇女介绍，他们所在的村大都多做服装和小商品生意，她本人也是做生意的，“和他们家很熟”。杨永明“在镇里很有名”，她澄清，这个名声并不是由现在全国尽知的宝马案而来，而是因为杨“很早以前就有钱”“做生意的人都认识他”。在她的印象中，杨永明很早做服装生意赚了钱，但在湖州当地做其他

生意又亏了本，后“又到外面赚钱”，还清了债务，“听说他闯荡得还可以”。杨永明并未给家乡人留下什么坏印象，“就是正常的生意人”。问他是否读过大学，对方很惊诧：“他哪里会上大学呢？很早就出来做生意了。”

这位妇女告诉李菁，杨永明的父母还在老家，与一般人想象得不一样，在这位妇女的印象中，杨永明家的经济条件竟是“落后一点”，“我们这里其他人家都住的别墅，他们家还是十年前盖的二层小楼”。

杨永明妻子吴某是邻村居民。李菁按照查号台提供的号码打过去，有人接了电话。接电话者告诉李菁，吴某家所在的村以制作床上用品为主，“吴某的父親以前是做包装床上用品的包装袋生意的”，杨永明帮助岳父做生意。村民以前还在这里见过杨永明，印象中与吴某结婚后，两人一起去了西安。吴某的父母后来在湖州市下面一个更大的镇上买了房子。

杨永明到西安的时间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在贵阳做床上用品生意时，曾经给一个做体彩生意的“大哥”提供过奖品。这位“大哥”据说是贵州“贪官书记”刘方仁的亲戚。后来，“大哥”的体彩做到甘肃、陕西，杨永明也携床套、被套追到这边。开始是帮助其岳父，将家庭手工厂生产的产品作为彩票活动的奖品运到西安，这时杨的身份是“奖品供货商”，慢慢地杨熟悉了彩票市场运作方式，和陕西省体彩中心头头脑脑也混了个脸儿熟，于是，1997 年底，杨永明介入体彩发售业。开始是在陕北一些小县城里做即开即奖型彩票的承包商，“当时的市场比较好做，因为老百姓不知道是承销商搞的，南方人做的被套、床套很鲜亮，在乡村也很有吸引力。”一位知情者说。后来，“因为亲戚有体彩的社会关系”，杨永明被“介绍”到体彩中心。从此，杨氏开始成为陕西体彩业的风云人物，直到此次案发。

在西安采访时，细心的李菁还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细节：杨永明在工商局备份的“股东身份证明”一档中，“现住址”一项填的是“柏树林某楼 E 座”。在西安市中心相对拥挤的柏树林街，李菁看到了这座有十几层高的楼，外表已有些褪色，算不上高级住宅。李菁在楼下盘旋几遍，却始终找不到文件所写的“E 座”。进楼问保安，回答是“只有 A、B 两座”，从来就没有“E 座”，而且这楼盘也没有再开发过。保安说楼上的住户比较杂，有的将之作为办公地点，有的是私人住宅。保安说他天天在报上看彩票案的情况，但从来没有在楼里看到过报上登的那

个人。

据说杨永明是在西安的另外一个地方买的房子，有一个“喜欢和父亲下棋”的儿子。

杨永明的承包商身份被中央电视台披露后，据说曾通过中间人提出请央视记者吃饭，但始终没有兑现。

2001年，杨永明还与妻子吴某共同出资五十二万元，在西安注册了一家名为“金筷子”的餐饮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杨为法人代表。这个公司其实是个“空壳”公司，没有什么经营活动，只是为了签订合同时方便，因为只有具有民事责任的法人才有资格与体彩中心签订委托合同——杨永明的“筷子”早伸到具有丰富的含“金”量的体彩领域了，哪有精力去搞什么既劳神又费力的餐饮？

杨永明到底有多少资产？有“身家千万，拥有十几家彩票投注站”之说。李菁在做了一番调查后写道：“据与杨永明相熟的一位人士回忆，1999年左右，杨永明开着一辆‘神龙富康988’，在2002年左右换了一辆‘尼桑风度’。一位知情者对外界盛传杨‘有上千万家产’的说法不以为然，杨永明似乎也不像外边想象得那么有钱。在2000年杨永明获得三千万元彩票销售权时，因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杨永明选择了与他人合作的方式承包，大头由对方出。据其回忆，原省体彩中心一位负责人经常对底下人说，小杨年纪轻轻就有四五百万的家产，这种说法不知多大程度地接近真实。”

西安的这次即开型体彩销售，大奖是四辆宝马车，尽管刘亮中的一辆据说属“调包失误”，但其他三辆并未“失误”，如果杨永明将错就错，将刘亮中的那辆颁给刘亮，那就还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那么，为什么杨永明在已经稳赚三辆宝马的情况下，还不放过刘亮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当事人本身来讲，杨永明是个商人，而且已成长为一个不法商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是一个奸商，如果说商人经商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那么，奸商的本质特征就是以各种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一般商人知足知止，且受“诚信不欺”等道德信条的约束；奸商则不知足不知止，或者说做不到既知足又知止，“诚信不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哄人的口号，是无论如何都践行不得的。因为和一般商人相比，奸商已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以不正当手

段获得钱财，又要以钱财来养护不正当手段，周而复始，没有尽头。也就是说，他们已欲罢不能，不奸不贪都不行了。

从客观因素来讲，前面讲过，杨永明只能拿到彩票销售所募资金的11%。但在接受《华商报》记者谢正罡的采访时，杨永明表示自己只能拿到9%。这中间差了两个百分点。以此次销售总额一千七百多万来算，两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三十几万元。这三十几万元跑到哪里去了呢？一些知情人士认为，作为拿到三年彩票销售权的回报，杨永明肯定会出让一些利益给相关者，“你不打点，就有别人想进来”。

“如果单纯靠这个钱，彩票商是发不了多大财的。特别是近些年，福彩对体彩形成强烈竞争，前期投入越来越大，合法的获利空间也越来越小”。曾任陕西省体彩中心会计、七十二岁的栾文堂老人如是说。

2003年，陕西省体彩中心副主任张永民代表陕西省体彩中心和杨永明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合同规定：杨永明必须在2003年1月10日起至2005年1月9日止，完成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规模销售三千三百万元。销售地点为西安、渭南、延安等城市。根据合同，杨永明要“负责彩票销售现场棚架、人员安全等问题，并承担一切经济风险和各项支出以及相关法律责任；在彩票销售过程中如有彩票丢失、亏款、超兑奖金、假币、票据短缺等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将由杨永明赔偿和承担。”

“这样算下来，杨永明每次至少要发行一千万元以上，才有赚钱的可能。”一位熟知彩票内情的人士分析说。但要把一千万元的彩票发出去，谈何容易。2003年底，杨永明在渭南发售即开型体彩，就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据说“销售情况异常惨淡，四地共卖一百七十余万元，不得不草草收场”。而在陕南、陕北的发行中，情形似乎也不理想。

“这些年的确在各地方做过彩票发行工作，但没有赚上钱，销售额都不高。”这是杨永明在4月14日和媒体记者“聊天”时讲的话。后来被抓的孙承贵在其《自首悔过书》中也说到这个问题：“在2003年中，杨永明开发的市场都不太成功，去年西安亏损了，宝鸡亏损了。”

按陕西省体彩中心公布的数字，此次体彩的实际销售额是一千七百二十二万，那么，按11%算，杨永明的收入是一百八十万；按9%算，杨永明的收入也

达一百五十万。杨永明不否认这样的算法，他对记者说：“是这样的，但投入真的很大。”

杨永明的“投入”到底有多大？都“投”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谜有待揭开。但是可以推测，这很大的“投入”，是促使杨永明把手伸向 50%的返奖部分，以及不想放过刘亮的重要因素。

杨永明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这么打的：中奖彩票中出现了假票，这个假票有可能是刘亮所持，也有可能不是刘亮所持——最好是刘亮所持，或认定是刘亮所持，这样，追查假票就意味着扣下那辆宝马，那么，这辆宝马就可以成为下一次体彩销售的奖品，也就意味着，还在我杨氏的掌控之下。要是几万块钱的奇瑞 QQ，也就算了，可那是一辆宝马外加十二万呀，六十万呢，怎么能轻易放手！

假票事件发生后，面对中央媒体，杨永明曾说，“我们特别相信你们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客观公正对这个事件。我们现在急于想让公安马上破案，现在你们这种动机好象是怀疑发行商在这里面做假，谁做假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这就是谁造假，谁在这里面侵吞国家的，你说返奖也好，公益金也好，这里面有什么不法的动机也好，谁受到法律的制裁。”

什么叫“贼喊捉贼”？什么叫“贼无赃，硬如钢”？杨永明的表演即是。

将和杨永明发生关系的众官员及公务员排列一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且看——

高直，陕西省体彩中心第一任主任。于 1998 年将杨永明引入陕西体彩，让其做体彩中心的“发行技术指导”。从此，杨永明摇身一变，由“卖床单被套的”浙江小伙，变成了“卖体育彩票的”工作人员，开始脱颖而出，“飞黄腾达”。高直 2000 年因严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标高奖金标价赚取差价）被免职，并被“双规”，不久竟离奇出逃，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高直任职期间，体彩中心内部账目混乱，1996 年到 1997 年期间，有不少名字陌生的人在体彩中心领工资。中心名下还出现过一家莫名其妙的公司，后来又无声无息地消失，至今无人知道其中的奥妙。

张长安，陕西省体彩中心第二任副主任。主持工作期间，发生了后来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李选利事件”。2000 年 11 月，西安彩民李选利摸中五万元的奖，

体彩中心却出现了李选利中二十万元奖的公证书。此次彩票发行商正是杨永明，“他是想利用造假的公证书把十五万元留下来”，但露了馅。

贾安庆，陕西省体彩中心第三任主任。2000年下半年上任之初，有人曾提醒他，两任体彩领导（指高直和张长安）已栽在杨永明的手上，对杨永明要小心点。贾安庆点头称是。但提醒人后来发现，贾主任与杨永明的关系早已非同一般。

而且“很奇怪”，几乎每次发行彩票后，杨永明都向体彩中心叫苦“亏了”，但他并不撤走，反而以此为理由，要求继续承包下一次彩票发行。杨的要求总是被贾安庆满足。杨的承包金额，还从2003年的一千五百万元，上升到2004年的一千八百万元。2004年，杨永明甚至还被陕西省体彩中心封为即开规模彩票的销售主管。

2002年渭南发生体彩风波，杨永明有造假之嫌，贾安庆知情而未做任何处理。此次“宝马风波”中，贾安庆力挺杨永明，言拿其头担保，体彩中心没有作假，还说一些律师想出名，为刘亮辩护，“最终会身败名裂”。

被责令辞职后，贾安庆沙哑着嗓子说：“……这个事情的发生确实不是我能想象到的，所以我对此现在也是感到自责、感到内疚。”接下来，贾安庆就被从家中“带走”了，其情形被人目击：“从来没见过老贾这样惨，穿着旧布鞋和旧夹克衫，头发乱糟糟的。”而过去贾安庆是十分注重仪表的，也从来不穿布鞋。

张永民，事发前为陕西省体彩中心副主任。代表省体彩中心与杨永明签订了2003和2004年的彩票承销合同，代表省体彩中心对这次彩票活动现场进行全面监管——监管了六天，都没有发现兑奖员孙承贵不是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还代表省体彩中心说刘亮持假票兑奖。此前，杨永明曾将一辆奖品车“借给”张永民无偿使用，案发后才被追回。

被责令停职检查后张永民对记者表白道：“监管不力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们尽了努力了，对于我来讲，我尽了努力了，我每天都得到现场。”还给打电话问情况的昔日同事说：“没想到杨永明给体彩中心挖了个坑。”

吴燕华，事发前为陕西省体彩中心发行部副部长，负责陕西全省的即开型彩票的发行和管理工作，是杨永明的顶头上司。认为杨永明没有向她汇报过假票事件，是杨的“工作失误”。当记者提出“你觉得他为什么没有向你及时汇报”的问题时，吴燕华选择了沉默。记者追问她：“你事后问过杨永明吗？”吴燕华

显得很难堪：“你别这么问我行吗？”

说来吴燕华和刘亮的父亲刘耀利在其他场合曾有过一面之交，算是个相识。3月23日在兑奖台前，她曾口气和婉地劝刘耀利“今天太晚了，明天来也可以啊”，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刘耀利。但是到了第二天，当刘氏父子被告知有可能持的是假票时，刘耀利向她打电话询问，这时吴的口气变了，冷冷地说：“这事我不清楚，你问小杨吧，他是负责人。”

据有关人士披露，1998年在陕西铜川销售彩票时，吴燕华犯下一个低级错误：将非奖符号“丹顶鹤”放进中奖公告里（本应放“梅花鹿”）。因为这一符号代表五等奖，量很大，十块钱能出五个，于是引起销售、兑奖的巨大混乱，彩民们纷纷拿着“丹顶鹤”来兑奖（一个标价二十八元的铝锅）。现场铝锅兑光了还不够，工作人员被迫跑到商店去买，买得商店里的铝锅涨到五十元。结果三个小时就眼睁睁地流失了二十八万。这应当算是一个不小的事故了，但事后却没有做任何追究。

2002年，吴燕华将杨永明带到渭南搞体彩销售，她将杨介绍给当地体育局以及体彩管理站的负责人，说：“杨永明非常有经验。”

蔡全发，西安市体育局主管体彩工作的副局长，对杨永明和省体彩中心签订的违反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的合同，也即对杨永明的不合法的承包商身份，蔡言“不是非常清楚”。对记者提出的“为什么西安市体彩中心的违规操作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的问题，蔡说，“这个不能由承销商来进行兑大奖的工作，这个我是不清楚的。虽然国家财政部和体育总局都有很明确的文件规定，但是这也是在事后我才见到这个文件规定，在此之前没有见到。”当记者提出，想查阅近三年来西安市体彩中心和杨永明所合作的即开式体育彩票的中奖情况的相关资料时，蔡拒绝提供。

樊宏，事发前为西安市体彩中心主任。认为市体彩中心跟杨永明是一个“合作关系”，即杨永明负责销售，“我们负责配合办理前期相关的手续，搭桥、卫生、保安等”。记者问他如何对杨永明施行监督，樊宏回答说“杨永明经常在陕西做彩票，是省上指定的，不好说是监督，只是大家互相配合把工作做好”。他与杨永明“配合”了三年。在“合作”期间，人们发现，杨永明常常像保镖或马仔一样，跟在他的后面。

这一次，他依然按“惯例”，放手让杨永明印制重要的开奖器具——决定着彩民究竟是中四十八万元的宝马轿车，还是中四万元的QQ轿车的中奖证明单，并让杨永明自己去公证处把中奖证明单装进信封进行封存，接下来，又将大奖的兑奖环节交给杨永明负责。假票事件发生后，樊宏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刘亮是持假者，而“没有怀疑过”杨永明。

当杨永明正在向央视记者就其承包商身份和是否造假等问题做解释时，樊宏上前将杨强行拉走，以致于采访中断。他还多次以上级有指示为由拒绝媒体采访，某次竟然粗暴地一把将装在记者上衣口袋里的采访机拽出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樊宏“数次摘掉话筒，站起就走”，使“双方都很不愉快”。

被责令辞职后，樊宏对记者说：“现在想起来，就是工作失误，把这个兑奖环节，没有考虑到这么严重。”

董萍，事发前为西安市新城区公证处公证员。她与杨永明“合作”过多次，而且看样子“合作”得很愉快。在她的“公证”下，杨永明的三个持假身份证的做案同伙都顺利地过关，取得了公证书。而且，对“中奖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也没有保留。

被吊销公证员执业证后，董萍对记者说：“出现这个事情吧，我很遗憾，也很痛心吧。……由于我们的一些疏漏吧，才能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 第十三波

### 央视追踪 巨额奖金归何方 省长发话 设立专案查到底

从2000年到2004年，西安市共举办了七次即开型体彩抽奖，全部由杨永明承包，出现宝马彩票案的是第七次，那么杨永明在前六次的彩票抽奖过程中有何表现呢？5月24日，针对这一问题，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一期题为《西安宝马彩票案 重重迷雾待揭开》的特别节目。

据了解，彩票发行的行政主管部门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从2000年以后变成了财政部，不管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老规定，还是按照财政部的一系列新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必须对获奖人员，特别是获大奖人员进行详细的登记备案，以接受检查和监督。记者的调查就从寻找这六次行动的获奖人员名单开始。

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全省即开型体育彩票的发行和销售工作，他们是体彩资金的掌管方，所有体彩抽奖活动的账目都保存在这里。按规定，获奖人员的名单和相应的身份信息也应该保存在他们这儿。在陕西省体彩中心，记者刘庆生找到了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发行部副主任吴燕华。

记者问：“活动结束后，比如谁获了奖，获奖的级别，他的身份证号、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的复印件等等，是不是事后也应该交到你这儿？”吴燕华答：“是应该交给我，交到省中心。”再问：“那您这儿现在有吗？”吴答：“我现在没有。”再问：“那这些资料在哪儿？”吴答：“应该在管理站。”再问：“在哪个管理站？”吴答：“各地市管理站，搞这些活动的管理站。”

于是，刘庆生来到西安市体彩中心，找到了原主任樊宏，樊宏说：“我是把票根和中奖证明单全部交给省中心，在结账时候全拿走了，我们地市级不留这个东西。”记者问：“七次活动你都交给省中心了？”樊答：“每次活动结束后来结账，结账的时候连票根连中奖证明单一块就拿走。”

省中心说在市中心，市中心说在省中心，到底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刘庆生请樊宏和记者们一起去省体彩中心查找这些资料。

见了吴燕华，记者说：“您看我把樊主任请来了。樊主任说东西都交到您这儿来了。樊宏主任他们那儿的市体彩中心，到底这几年交了这些姓名和身份证号过来吗？”吴答：“没有。”再问：“一次都没有？”吴答：“没有。”再问：“您很确定？”吴：“嗯。”

记者对樊宏说：“那您看，您听听。”樊说：“我还是说那句话，我现在这没有留那底子。”记者问：“您现在就一口咬定，听吴主任也说了，您肯定没有交过？”樊说：“再回忆回忆，反正我这儿是没有，我这儿是没有留这个底子。”记者问：“你是没有留，我现在就问，你到底交了没有？”樊答：“交了。”

三对面的情况下，樊宏咬定自己交了。为了证明市体彩中心的确没交，吴燕华把封存的档案找了出来，当场打开。

记者问：“这是什么？”吴答：“这是05花朵，一等奖。”刘问：“当时就交了这个票回来？”吴答：“对。”刘问：“这个票后面写了什么没有呢？”吴答：“第一名的，五十万。”刘问：“人的信息呢？交到你这儿了吗？”吴答：“这我是密封的，没有。”

看到这种情景，樊宏的口气软了。记者问：“实际上交了没有？”樊答：“也有这个情况，有时候结账我不在，结账由省中心直接和杨永明就把账结了，我不在现场，就不知道这些细节。”再问：“那么当时这个单子，据您所知，杨永明交给省中心了吗？”樊答：“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了。”再问：“现在省中心告诉我们没有交到他那儿，那这个单子在哪儿呢？”樊答：“那就应该在杨永明那儿了。”

按常规，即使西安市体彩中心没有上交中奖名单，省体彩中心也应该在结账时找他们索要，因为这些资料是日后进行查验的最重要的依据，按规定是必须保存的。就这个问题，记者问吴燕华：“你现在连资料都没有，你怎么去查验呢？事实上你们查验了吗？查验了没有？”吴回答：“没有。”

如果说由于工作失误，缺一两份名单没有保存下来还有情可原的话，整整六次活动的六份名单一份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且甚至是连一个名字都没有保存下来，这就太不正常了，显然，这不是拿工作失误能解释得了的？那么名单到底去哪儿了？是丢失了？还是被人藏起来了？或者干脆就已经被销毁了呢？记者手里拿着的是这六次活动的结账明细单，根据统计，这六次活动总共返还奖金二千六百多万元，其中万元以上的大奖兑付了一百零八个，奖金总额高达一千九百多万元，

由于没有获奖人员的名单，这么一大笔奖金到底去了哪儿，作为活动组织方，也是资金管理方的省市两级体彩中心根本说不清楚，这样的调查结果让我们感到既意外又非常震惊。——刘庆生分析说。

接下来，刘庆生抱着一线希望，到公证处寻查。按规定，万元以上的获奖者都会在现场做获奖公证，公证处那儿应该有一部分资料，据了解，这六次活动当中有四次是由新城区公证处负责公证的，于是，刘庆生一行来到了这里。公证处的上级单位新城区司法局副局长陈文社接待了他们。

陈文社说：“根据公证档案管理办法，公证档案作为保密的资料，个人秘密资料，目前除了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其他单位不能查阅这些档案，必须经过特别的一些程序。”

这样的拒绝听上去理由似乎非常充分，记者不能查阅这些档案。那么，“从杨永明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刘庆生问，“有资格查阅这些档案的司法局和公证处有没有重新对这些获奖人员的真实身份进行核实呢？”陈文社答：“过去档案的一些整理查阅归档，我们正在做这些工作。”再问：“有没有出去外调？”陈答：“目前还没有。”

拒绝给记者提供线索，自己拿着线索又不进行外调核查，司法局和公证处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获奖人的隐私吗？

接下来，刘庆生向观众展示了由一位知情者提供的一份获奖公证书的复印件。从公证书上看，一个名叫李选利的彩民在2000年西安市的一次体彩活动抽奖中，抽中了一个二十万元的二等奖。几经周折，刘庆生一行终于找到了李选利。

刘说：“我们今天过来主要是跟您核实一个事，我们了解一下，在2000年的时候您有没有在碑林区参加过一次体育彩票的抽奖活动？”李答：“有。”刘问：“那次活动中您抽中奖了吗？”李答：“抽中了，得了五万块钱。”刘问：“给您什么凭证了没有？”李答：“有公证书。”刘问：“这是当时的公证书？”李答：“对。”

对比这两份公证书，姓名一样，身份证号码一样，获奖的时间、参加的活动都一样，只是获奖的金额一个是五万，一个是二十万。

刘问：“这上面说您获得了二等奖，奖金是二十万元，您是又摸了一个二等奖吗？”李答：“这个不知道，上次就摸了一次，得了五万块钱。”刘问：“您也

从来没得过这二十万奖金？”李答：“从来没有。”

显然，这份二十万的公证书是假的，那么这份假公证书到底是谁伪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近日，碑林区委区政府对此展开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份假公证书居然是碑林区公证处伪造出来的。

中共西安市碑林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张西城宣布：“经查明，2000年11月初，体育彩票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碑林区体育局局长李新义两次找到碑林区公证处主任万元模，要求出据一份假的二等奖二十万元的公证书，其目的就是要套取一笔资金。公证人李群在两个领导多次要求下，根据一个真实的彩民身份证复印件，制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伪造的二等奖二十万的假公证书。”

正规的公证处居然也参与作假伪造公证书，记者不知道在这六次活动中，这样的假公证还有没有，还有多少。而不去核查，在那些至今仍被公证处封存得严严实实的资料里边，还有多少秘密，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刘庆生说。

主持人总结道：杨永明操纵的前六次体彩抽奖，二千六百多万的奖金兑付之后，竟然找不到中奖人的任何资料，本该是监管部门的省体彩中心，没有，市体彩中心，没有，公证部门也不予提供，记者经过了一番调查，目前仍然是一团迷雾，那么在迷雾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哪些秘密？是否还有人在其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只有把这一切彻底查清，让违法者受到惩处，才会对广大的彩民有一个交代，才会真正地起到警示的作用。

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2004年5月25日，国家司法部党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成调查组对节目报道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5月26日上午，司法部调查组抵达西安。

5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了省委、省政府针对宝马彩票案的态度以及所部署开展的处置工作。据通报，5月25日，按照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要求，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再次召集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西安“3·25即开型彩票造假案”的处置工作。贾治邦指出，要充分认识到案件的严重危害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快案件的侦破和查处工作。

贾治邦说，省委、省政府和西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案件的处置工作，前一阶段做了大量工作，案件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调查无论涉及谁，涉及哪个

单位，都要一查到底，不袒护，不遮掩，给群众一个交代。公安、检察院、纪检等部门要密切配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快查清案件。体育、司法部门要在自查的同时，配合省市纪检委、检察机关把历次即开型彩票销售和公证情况彻底查清楚。贾治邦对新闻媒体在此案中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表示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要及时对新闻媒体发布信息。

会议决定，成立“3·25即开型彩票造假案”专案组，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负责调查杨永明违规操作体彩等全部犯罪行为，对西安市以外的案件也要彻底查清。成立违法违纪查处组，由陕西省纪委、省检察院负责，调查重点放在体彩中心和公证部门，进一步查清杨永明七次承包体彩发行情况，对每次体彩中大奖人员逐一核查，涉及违法违纪问题和公职人员渎职失职问题，由省纪检、检察机关立案查处。

此前，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已暂停了陕西省即开型体育彩票的销售活动，接着又做出决定，要求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体育局体彩中心停止即开型体育彩票规模销售活动，更不能搞二次开奖和实物兑奖。

体彩中心一位负责人透露，国家体彩中心和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将陕西“宝马彩票案”定性为一起“恶劣的诈骗案”，将一查到底，肃清害群之马，无论查到谁都决不姑息。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陕西“宝马彩票案”教训深刻，各地体彩中心要严格执行即开型彩票销售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对销售全过程的监管，尤其是设奖、验票、兑奖、开奖、中奖彩票查询、公证等关键环节。

读到这些消息，人们有理由感到欣慰，毕竟将问题揭露出来了，毕竟领导重视了，下令彻查了。然而，仔细想想，你的欣慰就很有有限了。如果央视记者不进行追踪调查，还会有人过问那巨额奖金的下落吗？省市体育局都设有纪检部门，他们多年来为什么不监督、不调查？还有，如果省级领导不发话，还会有人去调查吗？还能做到“无论涉及谁，涉及哪个单位，都要一查到底，不袒护，不遮掩，给群众一个交代”吗？领导这样发话，说明在查处一些案件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袒护”“遮掩”“查不到底”的问题。

什么时候，不管新闻媒体介入不介入，都有人监督和调查；不管领导发话不发话，都会“一查到底，不袒护，不遮掩”，那我们才算真的进入法制社会了。

## 第十四波

### 案情再突破 托儿王军落网 公证又露丑 开奖细则出台

2004年3月24日下午3点半左右，一名叫王军的中年男子，在西安东新街体彩大卖场，声言他“刮开”了一张特等A奖彩票，于是他便成为继杨小兵（岳斌）、刘晓莉、刘亮之后的第四名“宝马大奖得主”。

由于刘亮爬上广告牌，假票事件升级，多少知道些内情的王军便闻风而逃。宝马彩票案立案后，犯罪嫌疑人杨永明、岳斌、刘晓莉以及孙承贵相继落入法网，王军却逍遥于法外近两个月。然而，有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自以为有可能逃过一劫的王军还是没有躲过做阶下囚的命运。

其实，王军是个化名，真名叫王长利，祖籍河南，现居汉中，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他是经孙承贵介绍认识杨永明的。2003年，杨永明以承包商的身份在延安搞即开型彩票销售时，王长利就当过一回“托儿”，“中得”当时的“奇瑞”轿车大奖。在此次西安的即开型体彩活动中，孙承贵按照杨永明的指使，再次找王长利“帮忙”，做中“宝马”大奖的“托儿”，王长利满口答应。那天，他按照杨永明的安排，采用假名、假身份证、假地址、假联系电话兑了奖。之后，他将杨永明给的两千块钱报酬揣进怀中，逃回到汉中老家。

王长利是在家门口的麻将桌上被抓捕的。5月14日，当来自西安的民警将手铐卡在他手上时，他多少有点意外，心里说：都过去快两个月了，想着都快没事了……

于是，因涉嫌诈骗罪，犯罪嫌疑人王长利被西安市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与杨永明、孙承贵、岳斌、刘晓莉一起被羁押在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内。

5月29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一期《西安宝马彩票案追踪：大奖落谁手》。这期节目调查的是杨永明在陕北榆林定边、绥德、靖边、横山四县即开型体彩活动中的造假情况。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央视记者行程一千多公里，走街下乡，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对中得特 A 级大奖的获奖者白玉亭、王强、李强、高明、高强逐一进行核实。结果发现，这五个人的身份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全是杨永明找来的冒名顶替的“托儿”。如公证登记的白玉亭是绥德县城关镇人，经反复查找，全镇九百七十一人，没有一个叫白玉亭的；另一名中奖者是横山县高镇李家洼村的李强，村里确有李强其人，但李强本人从没有买过彩票；高强是靖边县青阳岔乡黄家湾村的，但在黄家湾七个自然村的户籍档案中，没有查出高强这个人；在紧邻宁夏的定边县安边镇，还有一个特 A 奖中奖者高明，当地派出所的档案显示，安边镇共有四人名叫高明。其中一人年仅五岁，不具备领奖资格，另一名经民警电话联系后确认未曾中奖，剩下的两个高明，经查访，其中奖情况也纯属子虚乌有。而且，记者还发现，“在这些即开型体育彩票抽奖过程中，对体彩发行负有监管责任的榆林市体彩管理站和各县公证处依然存在着严重失职行为。”

且看下面一段——

解说：……记者来到了绥德县四十铺乡，按照中奖名单表明的姓名和住址寻找第五名中奖者王强。

四十铺乡派出所民警：有二十一个王强。

记者：二十一个王强！

四十铺乡派出所民警：二十一个，所有的王强，都是四十铺乡的。

解说：就在记者犯难的时候，派出所所长透露，绥德县的公证处田主任也在急着寻找王强。

张红军（绥德县公安局四十铺派出所所长）：昨天县公证部门负责人，给我打过电话。

记者：姓什么？

张红军：姓田。

记者：等于说是他们部门处的一个领导。

张红军：是。

记者：意思是什么呢？他给你来电话。

张红军：意思是查一下我们辖区有没有王强这么一个人，要办啥公证手续。

记者：问没问他为什么要查王强这个人？

张红军：他只说要办啥公证手续，完善一下手续。

耿建峰（绥德县公安局四十铺派出所民警）：调出来以后，我说你要哪一年的？他说你找一找 1962 年的，最后好像年龄都看了，住址都看了，只是最后确切定不下来是哪一个。

解说：既然连公证处都不能从这二十一个高强中找出中奖者，记者也就没有必要一一查找了。连公证处自己都搞不清楚谁是中奖者，这样的公证还有什么真实可言呢？

下面的画面更有意思——

记者转而来到绥德县公证处，办公室没人。后来在知情人的指点下，在一家饭店找到了公证处的田主任。

记者：有点事情想跟您咨询一下。

田益名（绥德县公证处主任）：你们怎么过来的。

记者：我们坐汽车过来的。

田益名：待会再说。

记者：是这样，这个公证书是您做的吧？公证员是您吧？是不是您做了这么一个公证，你们县有一个王强的人，买体育彩票，获了特 A 奖。

田益名：我跟你讲，我们有个规定，就是要记者采访，必须要我们司法局同意。

记者：现在跟司法局的领导联系一下。

田益名：可以可以。

解说：田主任一面答应向司法局请示，一面加快脚步走进屋内，可这一走，便不知去向。

记者：是从这儿过去了吗？

路人：过了，从这儿走了。

记者：从这个门过去了？这儿还有一个门是吧？

白玉亭和高强两名特 A 中奖者的证明书是由靖边县公证处的陈煜开具的。为

寻找陈煜，记者来到靖边县公证处。

记者：陈煜同志吗？

公证处工作人员：不在。

记者：哪位是陈煜同志？

公证处工作人员：今天没来。

解说：既然陈煜不在，记者便向在场的这位工作人员咨询了有关情况。

公证处工作人员：这个我也不好说，当时我不是主办，不太好说。

记者：按照规矩的话，应该是他出具身份证，应该是吧？

公证处工作人员：应该是这样。

记者：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身份证号这一栏给它划了一道，没有填上呢？

公证处工作人员：这个我不好说，我不好解释，因为这不是我办的，这我不太好解释。

记者：那么陈煜是你们的主任吗？

公证处工作人员：不是的，不是的。

记者：他在哪儿，要不您找他一下吧？

公证处工作人员：行，我去看看。找找看看。

解说：然而记者没有料到，这个说陈煜不在，并回答了记者提问，还要为记者去找陈煜的工作人员就是陈煜本人。

记者：陈煜是哪个人？

郭生光（靖边县公证处会计）：陈煜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个人。

……

作为一个“端国家饭碗”的工作人员，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和个人隐私外，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可公开的。可面对记者的采访，绥德县公证处的田益名主任和靖边县公证处的陈煜公证员，一个借口向上级请示，来了个“金蝉脱壳”，从另一个门溜了；一个声称陈煜不在，要去找陈煜，也溜了。——民间语言中有“骑着驴找驴”的说法，而这里则是“陈煜找陈煜”。田、陈二位大概是按“光棍不吃眼前亏”，即保护自己的本能这么做的，什么叫滑稽？什么叫虚伪？什么叫拙劣？什么叫丑陋？这时候都顾不及了。他们当时或许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在

镜头前的表演，是要播放给普天下人看的。

“真是把人丢扎了！把陕北老区人的脸丢了，把国家公务员的脸丢了，也把公证机关的脸丢了！”一位看过这期节目的人这样说。

据此，《三秦都市报》（2004/05/30）发表了一篇题为《公正我们的公证》读者评论。作者白丁义愤地指出，“且不说他们到底与彩票中奖作假公证有无干系，只看他们那番表演，那么没有底气、那么缺乏诚意……这样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公证的主儿混迹于公证队伍，我们的公证工作能够公正、能够诚信、能够让老百姓放心吗？看来要使公证公正，必须公正公证！”“在宝马彩票案中，一些公证人员充当了极不公正的角色，随着央视‘焦点访谈’的步步深究，人们发现，‘问题公证’不仅仅涉及西安市新城区的某些公证人员，也不仅仅是一次公证有问题。笔者禁不住要问：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公证！”

的确，如白丁先生所言，公证机关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其自身的公信力如何无疑又是检验全社会公信度的试金石。日臻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迫切要求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公证人员强化自身素质、端正自身形象、一身正气地面对媒体、面对公众，严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否则就难以胜任这神圣的职责。”

公证人员在西安宝马彩票案中的失职行为暴露后，引起国家司法部和陕西省司法厅的高度重视。5月26日至27日，以司法部律师公证司负责人为组长的调查组专程来到陕西，督查西安市新城区公证人员在西安宝马彩票案中的失职行为，了解公证人员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并要求吸取宝马彩票案的教训，整顿公证人员队伍。

陕西省司法部门以此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整顿公证人员队伍活动。陕西省司法厅厅长赵英武告诉媒体，虽然公证人员在西安宝马彩票案中的失职行为是个别人所为，但教训是深刻的，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目前，我们已经在省一百一十个公证处、四百五十多名公证人员中开展整顿队伍活动，并对公证人员进行培训，以全面提高公证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杜绝公证人员失职行为的再次发生。”

5月30日，国家司法部印发了《开奖公证细则（试行）》（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通知，目的是为了“规范开奖公证程序，发挥公证监督职能，维护开奖活动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公证员协会秘书长江晓亮专门就《细则》的出台做了解释，说这是司法部一直在对开奖公证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最近发生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催生”的结果。

江晓亮介绍说，现场监督公证主要包括开奖、招标投标、拍卖、抽签等具体公证事项。公证人员参与现场监督，代表国家行使公证证明权，依照法律进行监督并提供服务，并始终要保持客观的第三方立场。“但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目前关于现场开奖等活动的立法比较滞后。”

江晓亮说，如今年2月发生在湖北的双色球摇奖事件：湖北省公证处的两名公证员刚刚公证过“本次开奖的摇奖器具完整”，现场彩民却检查出用来摇奖的乒乓球里竟然藏有螺帽。江晓亮分析，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监督制度，因此，《开奖公证细则（试行）》的及时出台非常重要。

江晓亮介绍，《细则》根据《公证程序规则》制定，遵循了一般的办证原则和程序要求，充分考虑到开奖公证的特点，覆盖了开奖公证的各个程序环节。对申请人申请公证应提交的材料，公证人员重点审查的内容和拒绝公证的情形做出了具体规定。突出强调了申请人的义务，明确了公证人员的审查监督职责，并规定了相应的违规惩戒措施。

《细则》规定，对发生开奖纷争或者秩序混乱、开奖器具出现技术故障等情况，公证员应当要求主办单位妥善处理。无法当场解决的，应建议主办单位中止开奖活动。情形解决后，开奖活动继续进行的，应当给予公证；主办单位拒不解决的，应拒绝公证；开奖活动中止后仍然无法解决的，应终止公证。

针对开奖公证存在的薄弱环节，《细则》还加强了制度防范。对公证人员封存开奖器具做出了明确规定，使开奖活动能够自始至终置于公证人员的监督之下。中奖结果产生后，要求公证人员对公证词中涉及的中奖号码、中奖凭证、中奖人姓名即时核对，并将中奖人的身份证件复印存档。

《细则》对公证处、公证人员与主办单位串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公证人员不得购买或者收受本次有奖活动的彩票、奖票或者设

奖物品。司法行政机关、公证员协会非法干预开奖公证活动的，应当依法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细则》是一个“规矩”了，有道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有规矩当然比没有规矩好，但是规矩得靠人来遵守，人以各种原因、各种借口不遵守规矩，这规矩也就成了“聋子的耳朵”。宝马彩票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 第十五波

### 五嫌犯被捕 作案手段曝光

### 四托儿在逃 收网之日可期

2004年5月28日，杨永明、孙承贵、吴星芳（在逃）、岳斌、王长利、刘晓莉等六人由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提请批准逮捕，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于5月31日，以诈骗罪对上述六人批准逮捕。6月1日下午3时，杨永明等五人被执行逮捕。

6月1日，全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西安宝马彩票案六名犯罪嫌疑人被批捕的消息。报道称——

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掌握的证据证明：2004年2月17日、3月18日，犯罪嫌疑人杨永明分别与陕西省和西安市体彩管理中心签订了即开型彩票的承销合同。此次活动于2004年3月20日至25日，在西安市东大街十字东北角举行六千万元即开型体育彩票实物返奖销售。每四百万元为一组，每组设特等奖十二名（标志为“草花K”），由十二名特等奖得主进行二次抽奖，产生特A、特B、特C、特D四个奖项，其中最高奖项特A奖为宝马325轿车加人民币十二万元。

杨永明伙同聘用人员孙承贵，采用在公证处封大奖时给信封上划痕做记号和用强光照射信封等手段，掌握了特A奖的信封编号，然后安排岳斌等人使用他人已使用过的中奖彩票再次抽奖，从而骗取特A奖。

3月20日，吴星芳受杨永明指使，联系岳斌（化名“杨小兵”）用上述方法骗取特A奖，吴星芳、岳斌共得“好处费”七千元。兑奖后，岳斌到陕西金华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领取宝马轿车交给杨永明。现该车已被追回。

3月22日，孙承贵受杨永明指使，联系刘晓莉，用同样手段骗取特A奖，刘晓莉得“好处费”两千元。由于刘晓莉身份证过期，兑奖后未能将汽车领走。现该车已被扣押。

3月24日，孙承贵受杨永明指使，联系王长利（化名“王军”）用同样手段骗取特A奖，王长利得“好处费”两千元。后因“刘亮事件”，孙承贵怕事情败

露，兑奖后未让王长利领车，现该车已被扣押。

报道称，此案还在深入查证之中。

报道中披露的杨永明和孙承贵“采用在公证处封大奖时给信封上划痕做记号和用强光照射信封等手段”是怎么回事呢？这和监管、公证人员的失职或渎职有关。

按财政部《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杨永明作为承包商，是不能参与彩票的印制、保管、发放，及兑奖方案的设计和兑奖过程的。然而这些规定对杨永明形同虚设，他和同伙参与了兑奖方案的设计、兑奖过程、打印了中奖证明单；装有中奖证明单的信封倒是由公证员封的，也加盖了市体彩中心和东城区公证处的公章，但杨永明却在场，他在递拿信封的过程中给信封上划印痕做记号是很简单的事情；信封封好后，本应由公证机关保管，但公证机关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是放弃了保管，交给了杨永明。

那么，接下来，杨永明会不会打开信封，看清楚那个里面是宝马车，然后再封上呢？——不少人这么猜测。其实用不着。他只许将一个空纸杯弄掉底儿，朝一只一百瓦的灯泡上一套，然后将信封放在纸杯上，牛皮纸内的中奖号码就隐约可见了，而哪一组号码最长，哪一组就是宝马车——这是杨永明事先就知道的。于是，杨永明记住了信封编号，即顺序号——宝马车只有四辆，也就是说只记四个号就行了。

再下来，杨永明指使孙承贵打印好一份出奖表，告诉孙第几号信封是“宝马”，让其提前将此顺序号勾掉。这样，不知底细的中奖者在二次抽奖时就根本与大奖无缘了。而其托儿们参加抽奖时，因杨永明已暗中将大奖的顺序号告知，也就很轻松地，如从自己的包里取钱一样将宝马抽中。事实上，岳斌、刘晓莉，还有王长利都是这么干的。

事后，媒体上曾有这样的疑问：杨永明在信封上划痕做记号、在用强光照射信封以掌握特A奖信封编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彩民正从腰包里大把大把地往外掏钱，想试试手气，心里想着最好能撞个大运。他们看不到杨永明做的手脚，但体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公证处的公证员，这些现场的工作人员看不见吗？还有，

杨永明指使人用他人已使用过的中奖彩票再次抽奖，当这些受其指使混迹于普通中奖彩民中，用已经使用过的中奖彩票再次参与抽奖的时候，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公证处的公证员，看不见吗？

其实，不是杨永明等人的手段有多么高明，而是他利用了公益事业的权威性和彩民们对公益事业的信任感，同时，那些负责监管和公证的公职人员面对杨永明这么个“人物”，面对“分割”给自己的那点“利益”，自己“瞎”了自己的眼睛。

不少人认为，杨永明能得逞是因为彩票发行立法不规范，和公证制度不完善。对此，陕西省政法委一位领导讲得很好：固然有彩票发行立法不规范的问题，固然有公证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但如果这些现场的工作人员恪尽职守，以现行法规实施监管，杨永明的骗术同样不可能得逞。

逮捕五嫌犯的同时，公安机关还公布了杨永明一伙在延安和榆林的犯罪情况。

据调查，杨永明 2004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6 日在延安市和榆林市的绥德、横山、定边、靖边等县承办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活动中，伙同孙承贵勾结王长利、白玉亭、刘小岗（化名张文青）、李奎（化名李强、高强）、杜成章（化名王强、高明）、张文琴等人冒领彩票特等奖，先后共骗取奇瑞轿车九辆（托儿们每辆车得酬金一千元）。杨永明等人将九辆车拉回西安存放在奇瑞代理商陕西伊势威汽车销售公司，并于 2004 年 3 月 20 日至 25 日在西安市东新街办六千万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活动中，将其中八辆作为奖品兑了奖——本次体彩的二等大奖奇瑞轿车共五十一辆，而真正由伊势威公司提供的奖品只有四十三辆，另一辆“借给”原陕西省体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永民使用。破案后，该车才被追回。

据称，5 月 14 日，疑犯王长利在汉中市被抓获；5 月 19 日，疑犯刘小岗在延安市被抓获；5 月 23 日，疑犯白玉亭在榆林市被抓获归案。李奎、杜成章、张文琴等人案发后逃匿，警方目前正在积极抓捕。

至此，此案共有七名犯罪嫌疑人被抓，四人在逃。

这里面有几个笔者前面没有提到的陌生名字——

吴星芳，杨永明的妻弟，杨小兵（岳斌，贵州省思南县人）的姐夫。

白玉亭，白莉（孙承贵与刘晓莉的中介人）的表哥。

刘小岗，陕北清涧县人，刘晓莉的亲哥哥。

6月1日下午2点半左右，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第二会议室内聚集了一大帮记者，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他们都准备好了自己的“长枪短炮”，等待着“目标”出现。

杨永明、孙承贵、岳斌、王长利、刘晓莉等五人已被提前从新城区看守所提到新城分局，关押在留置室内。他们身穿印有“看守所”字样的红褂儿，头都被黑色的头套罩着，别人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他们自己也看不清彼此，此手段使他们相互之间没法交谈。两个月前，他们都是陕西体彩大卖场上的风云人物，如今以这样的方式再次聚首，大概谁也想不到。



图十五 1 杨永明被押进公捕现场（资料图片）

快3点的时候，公捕仪式开始。杨永明是第一个被带到会议室的，民警让其坐在椅子上。他的气色看上去还行，神情也算镇定——用陕西话说，此人还有点“兜头”。

“姓名？”民警问。“杨永明。”“籍贯？”“浙江湖州。”……

民警简单地提问了几句，杨永明一一回答。随后民警宣布逮捕令。杨永明站起身，走到桌前签字、按手印。随后是孙承贵、王长利、岳斌，三个人接受询问时都低垂着头，表情木然。

刘晓莉是3点过后被女警民押进会议室的。例行问答后，刘晓莉被带出会议室，这时候，刘晓莉哭了，开始声音不大，抽抽泣泣。待到要上押解车的一刹那，刘晓莉突然瘫倒在地，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几个民警赶忙上前，连扶带搀地将其拉上车。

呜呜的警笛压倒了刘晓莉的哭声。

现年三十八岁的刘晓莉是六名犯罪嫌疑人中唯一一位女性。在《华商报》刊登的《读者“最”看宝马案》中，她被列为“最可怜的托儿”——为了区区两千元，不仅被逮捕，还落得一个“诈骗”的坏名声。其实，这都是利欲熏心，财迷心窍，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

## 第十六波

### 案中案 黄四清制造假彩票 骗连骗 孙承贵索贿中奖者

宝马彩票案从爆发之日起，人们就疑窦丛生。其中一个很大的疑团便是：那张假票的制造者到底是谁？是刘亮吗？如果是刘亮，他为何要爬那么高的广告牌，振臂怒呼，且以死相威胁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如果不是刘亮，哪又会是谁呢？是杨永明吗？如果是杨永明，他为何要向省体彩中心汇报此事？为何同意将假彩票送国家体彩中心做鉴定，为何向媒体公布，之后又向西安警方报案？

随着案情的进展，杨永明等人被刑拘了，被逮捕了，其操控体彩发行的罪行被揭露了，但假彩票的来源依然是个谜。根据杨永明交代，他是和孙承贵联手，采用指使托儿用兑过奖的特等奖彩票重复领奖，并暗中告诉其特 A 奖编号的方法进行诈骗的，那么，杨、孙二人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大奖，似乎没有必要再做一张假票来兑奖，而且杨永明和孙承贵从未承认自己是假票的制造者，也没有人站出来，用确凿的证据，说杨、孙二人是假票的制造者。

再从假票本身来看，国家体彩中心鉴定其真实面目是“草花 2”，那么造假者就得找一张有“K”的彩票，将其左上角和右下角的两个小“K”挖下，再将“草花 2”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两个小“2”挖下，然后将两个小“K”贴在两个小“2”原来的位置上。这显然是一个很精细的手工活儿，它不但要求将两个小“K”挖下，还要打薄，还要掌握好胶水的浓度多少，贴上去后要恰到好处，不翘角，不起皮，平平整整，若不特别仔细地看，就看不出来。

经过仔细分析，专案组认为，不排除假票的制造者和持有者是一个人，但更可能是分工明确的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心细，一个胆大，心细者手工活做得好，能保证造假成功，胆大者心理素质强，敢于冒着风险去兑奖。犯罪嫌疑人将奖品轿车骗到手后，很可能很快卖掉。如果是两个人，就会涉及分赃问题。据此，得将奖品车的下落纳入侦查的视野。

有道是“解铃还得找系铃人”，专案组推断，持假票者就在 23 日中特等奖的

那十二个人之中。于是，采用排除法一一进行排查。待查到一个叫刘先奎的中奖者时，民警们看到了希望。

二十五岁的刘先奎家住湖北省陨西县上津镇东河村六组，按其领奖时留下的手机号码一打，关机；再按其所留的小灵通号码一打，机主自称是该刘的姐姐，说刘先奎当日下午已回原籍，十几天后才能返回西安。民警又给陨西县公安局打长途电话，请其协助调查刘先奎其人。陨西方面很快有了回音，说确有刘先奎这个人，但其所在的村子远在偏僻的大山里，不通电话，不知人在不在家。

为了尽快查清案情，专案组于5月30日连夜派人赶往刘的原籍。他们先到上津镇，又步行进山，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在东河村六组找到了刘先奎，刘先奎承认自己中了一辆奇瑞QQ。刘的亲戚和乡邻也都知道刘中大奖得小车的事情，他的姐夫还燃放了一挂鞭炮予以祝贺。问其卖车的钱现在何处，刘说存了邮政储蓄，民警经过核查，其户头上确实新存了一笔款子。于是，刘先奎被带回西安。

审查过程中，民警以刘先奎和其姐、其姐夫三人对刘中奖、领奖细节的不同说法为突破口，使企图负隅顽抗的刘先奎防线崩溃，不得不交代了其犯罪事实。专案组连夜工作，在雁塔区响塘村租住处将涉案的湖南衡阳人黄四清（刘的邻居）、汪东东（刘的表弟）抓获。

原来，3月20日下午，做着发财梦的黄四清来到体彩大卖场，他购买了五张彩票，刮后全是空白，心中未免扫兴。在卖场转悠时，他捡到了一本（一百张）彩民因未中奖而丢弃的彩票，翻着这些废票，黄四清忽然产生了一个邪念，于是他将这些废票带回家中，用刀片和胶水采取挖补的方法“精心炮制”出一张可以兑奖的“草花K”，交给邻居刘先奎，刘先奎许诺如果有幸中奖，就给黄以“重金”回报。

3月23日上午，刘先奎带着十五岁的表弟汪东东来到东新街。他躲在一边，让汪东东先去验票以试探情况，结果汪东东持假票顺利地通过了保安人员、验票员、兑奖员三道关卡。接下来是二次抽奖，汪东东年少，没有身份证，抽不成，这时刘先奎才出面，递上自己的身份证。结果抽出12号信封，是一辆奇瑞QQ轿车。

兑奖后，刘先奎立即联系西部车城的奇瑞专卖店，商定以四万三千元的价格

出卖。专卖店经理很爽快，当时就给了他三千元现金，随后又把一个四千元存折交到他手中。银钱到手，贪婪的刘先奎便将给黄四清以“重金”回报的许诺抛到一边了，他决意做一回“铁公鸡”。在应付了杨永明和孙承贵等人的询问后，关了手机电话，带着老婆，携赃款潜逃回陕西老家。

6月3日，西安警方依法将黄四清、刘先奎二人刑事拘留，刀片、胶水等作案工具已查获，赃款被全部追回。

至此，假彩票的真相才算大白。而这个“大白”起码有三个特别明显的意义——

一是还刘亮了一个清白。此前，人们从情理上都不相信刘亮是假票的制造者和持有者，警方也认定刘亮伪造彩票实施诈骗的证据不足，但警方却没有充足的理由排除刘亮于犯罪嫌疑人之外。况且，刘亮的一些说法也与民警们后来的调查有出入。比如，刘亮曾说他二次抽奖时之所以选“9”，是因为头天晚上和同事打扑克，有一把牌一下子揭到了三个“9”，可当民警们走访他说的同事时，他们都否认有这事。现在，这些小出入已不算什么了。

二是说明，“长走夜路，总有碰见鬼的时候”之俗言不虚。还有句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这个案中案中，杨永明算是个“螳螂”，黄四清和刘先奎是“黄雀”。算计人者被人算计，骗子遭遇骗子。杨永明没有料到，在他用屡试不爽的手段操控体彩大奖的时候，湖南和湖北两个来西安打工的农民，竟也用造假的方式，从他的眼鼻子底下，堂而皇之地骗走了一辆奇瑞 QQ。当然，杨永明这个“精明”的江浙人在这里犯了一个只有粗心人才会犯的“判断错误”：没有将假票“实事求是”地安在中奇瑞 QQ 的刘先奎头上，而是想当然地安在了中宝马的刘亮头上。——这可能与中奖彩票的登记混乱有关，更可能与杨永明的贪婪有关：一辆宝马相当于十辆奇瑞 QQ！正是因为这个“判断错误”，导致刘亮爬上广告牌以死抗争，以至于东窗事发，使其苦心经营多年的“架构”——“利益共同体”轰然倒塌，破灭了我和相关一连串人的“发财美梦”。

——这在杨永明看来，自然是倒了大霉的坏事，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好事，而且是大好事！试想，如果杨永明将怀疑的目标一开始就定在刘先奎头上，或者放宽些，定在摸中奇瑞车的那些中奖者头上，事情可能就不会发展到后来的局面，

可能就是只将造假者刘先奎和黄四清挖出来了事，那杨永明就还会一如既往地操控体彩，广大彩民就还会一如既往地蒙在鼓里，一如既往地把大把大把的血汗钱朝黑窟窿里塞！那陕西体彩（当然不仅仅是陕西体彩）的黑幕就不知牛年马月才会被揭开了。所以说，杨永明的失误，是一小撮人的不幸，是广大彩民的大幸，是中国彩票事业的大幸！

三是可以看出体彩发行业的漏洞有多么大。前面写到过，刘亮在说明自己不会造假时曾言，“我若持假票的话，怎么可能连过三道验票关而不被发现？”现在清楚了，的确确实是连过三道验票关而没有被发现，不过持票者不是刘亮，而是被刘亮还要小两岁的、被刘先奎用作“探险者”的刘先奎的表弟汪东东。陕西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永民在新闻通气会上曾言，那张假票，即使用肉眼，只要仔细看，都能分辨出来。而事实是，由他监管的工作人员们，就是用肉眼没能看出来，那么，只能说他们不“仔细”了，那么，为什么不仔细呢？

宝马案中的案中案还不止一桩。在对案件的深入调查中，孙承贵索骗彩民李伟中一万元的事实也被揭了出来。

李伟中是祖籍广东潮州的生意人，平时喜欢购买各种彩票。3月23日，他在东新街体彩大卖场刮出了一张“草花K”，这当然是令他喜出望外的事，这意味着他至少可得到一辆奇瑞QQ，当然，李伟中想，如果手气好些，得一辆宝马也说不定——宝马当然比奇瑞QQ好多了，漂亮，神气，体面，高贵。然而，让他倍感意外的是，当他上台进行二次抽奖时，兑奖员孙承贵却主动凑近前对他讲：“你给我一万元，我给你个大奖。”尽管孙承贵的声音不高，但李伟中还是听明白了。不愧是市场中人，李伟中迅速做出反应：“哪我要宝马。”“宝马已被人抽走，现在最好的车是东方之子。”“你能知道哪个里面装的是大奖？”李伟中有点怀疑。“这你不用管。”孙承贵说。“好，一言为定。”于是，孙承贵告诉他一个信封编号，李伟中按照这个编号去抽奖，果然就中得一个“奇瑞东方之子”。领到车后，李伟中没有食言，将一万块钱付给了孙承贵。

有道是“看样学样”。孙承贵给杨永明做下手，杨永明的那一套把戏，孙承贵一看就会，而且，他比杨永明玩得更简捷。杨永明看信封用的是纸杯套灯泡，他则买了一把强光手电筒。这种手电筒可以充电，其光亮是灯泡的若干倍。用其

照射装有中奖证明单的信封，可将其内容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在杨永明盯过宝马之后，他便盯住了“东方之子”。“我是看姓李的是个老广，穿着打扮像个有钱人，才跟他谈这笔生意的。”孙承贵在招供时说。

那么，这个案中案是怎么发现的呢？上面笔者说过，专案组判断那张假彩票出在3月23日中奖的那十二个人之中，于是进行逐一摸排。真正的中奖者对警察的工作是配合的，也是支持的，问什么答什么，让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让几点到就几点到。但是摸排到第五个中奖人李伟中时，情况就有些异样了：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接听电话的李伟中态度生硬，语气紧张，不愿意到专案组来接受询问。据了解，李伟中曾私下里向他的哥们弟兄打听如何编瞎话来对付警察。常言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既然是真中奖人，为什么不敢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呢？为什么还要想“招儿”对付警察呢？警察当然不是吃素的，李伟中自然抗不过去，结果是核桃枣儿一谷堆，全都倒了出来。

善于做生意的李伟中没有想到他的这笔“生意”做砸了。因涉嫌商业贿赂，他抽中的那辆“东方之子”已被警方依法扣押。请客，挂牌照，连同给孙承贵的那一万元，李伟中为这辆车已花出去了几万元，如今全“鸡飞蛋打”了。想占便宜，却吃了个大亏——李伟中的教训，可谓深矣！看来，无论做人还是做事，还是光明正大些好，那些“日鬼捣棒槌”的暗箱操作，给你带来的往往不是福，而是祸，甚至是大祸！

至于向李伟中索要的一万元，孙承贵当然不会交给杨永明，这大概也是杨永明想象不到的。杨永明和孙承贵的关系是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也可以视作“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孙承贵在这里玩了一个“仆人”背叛“主人”的现代版。看来，自私和贪欲大概是人的根性，这种根性在金钱面前往往表露得很丑恶、很充分。

至此，公安机关查清的杨永明等人的犯罪事实如下：一，2004年2月，杨永明伙同孙承贵等人，在延安榆林体彩抽奖活动当中，作弊冒领奇瑞轿车九辆。二，2004年3月，在西安即开型体彩销售活动中，杨永明伙同孙承贵等人以同样手法冒领宝马轿车三辆。三，刘先魁、黄四清制作假彩票骗取了奇瑞QQ轿车一辆。四，李伟中伙同孙成贵作弊抽中奇瑞东方之子轿车一辆。

真的造假者出来了，不是造假者的刘亮就清白了。宝马案发生以来，刘亮家的电话已成为热线，6月3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刚一落幕，就有记者给刘亮打电话，通报公安机关抓捕黄四清、刘先奎的情况。晚上，省市电视台也都播放了相关新闻。

看罢电视，刘亮的父亲刘耀利禁不住走出家门，情绪激动地逢人便说：“洗清了，洗清了，刘亮的冤屈终于洗清了！”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最近几天，好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个个都让他们全家激动和高兴。两天前，公安机关逮捕了杨永明等人，全家人就很高兴。但是，由于假彩票的谜底还没有揭开，到底谁是真正的造假者还不清楚，心里就还不怎么踏实。没想到，公安机关这么快就公布了假彩票的来源，抓住了造假票和冒领大奖的人，这真让人太激动了。现在，整个案件已经真相大白，“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法院尽快开庭，为刘亮兑奖。”刘耀利说，“刘亮能够洗清冤屈，应该感谢政府、感谢媒体，还要感谢公安机关。”

近期这段时间，刘亮的生活已经趋于正常，6月2日，他还到责任田里收了一天麦，忙到晚上才回家。他告诉媒体记者，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但由于自己没有作假，“身正不怕影子斜，因此从来没有害怕过。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事实证明我没有作假，我当然很高兴。”

真相大白了，刘亮清白了，宝马车也就该归还给它的主人。然而，有媒体登出一篇文章，说刘亮重得宝马车前还得面对一个年龄难题：国家颁布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里有一条，禁止向未满十八周岁者出售彩票和支付中奖奖金。看到这篇文章，关注宝马案的人都不禁为刘亮捏一把汗：不要闹腾一整，造假的帽子掀掉了，宝马车还是得不到。

对这个问题，刘亮的代理律师毛家兴不以为然，他告诉媒体，这个条款是体彩发行方在发售彩票时必须履行的一个义务，他是针对彩票发行方而言的，对彩民没有这方面的义务，依此当然不能认定刘亮和体彩中心之间形成的合同无效。再说了，对于彩民购买年龄的限制，体彩方面并没有采取明示的方式告知彩民。在这个前提下，体彩方面也应负有责任。还有，刘亮虽然未满十八周岁，但他已参加工作，能够独立生活，因此应该视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他对刘亮拿回宝马，“充满信心”。

## 第十七波

### 兴高采烈 刘亮领回宝马车 扬眉吐气 小院再开记者会

人生常遇到好事，也常遇到坏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降临的时候，往往迅速得让人措手不及。这样的措手不及，就让刘亮遇上了。这不，2004年6月3日下午公安机关刚宣布刑拘真正的制造假票者和冒领大奖者，晚上就有媒体记者给刘亮打电话，说明天可能要给他兑奖，这消息让小伙子激动不已，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6月4日，早上9点多，灞桥区政法委书记亲自登门，通知刘亮下午两点半到西安高新四路宝马销售公司领奖。刘家才确信此事，于是忙碌起来，紧张地为兑奖做准备。

二次领奖，对刘亮来说是一件大事、大好事，刘家人的高兴自不待言，对媒体来说也是一个爆炸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大新闻，记者们的兴奋不亚于刘亮。上午10点多，冒雨进城的刘亮就被消息灵通的记者盯上了，他到公安新城分局，记者们追到新城分局；他到专案组所在的西一路唐苑宾馆，记者们就追到唐苑宾馆。在专案组办完消案手续，刘亮回到灞桥街子村家中，记者们就追到刘家院子里。中午，刘家照例从街上买回来一堆包子，让记者们充饥。

刘亮是下午1点50左右走进销售大厅的，早就等候在那儿的记者们蜂拥向前，纷纷把摄像机、照相机、采访机对准身穿白色新衬衣、有意收拾了发型、咧着嘴憨笑的刘亮。许多人走上前和刘亮合影，一位来这儿修车的外地女士对刘亮举起大拇指，连说：“了不起，真伟大。”这时候的刘亮，享受的是大明星的待遇，那些演艺界的大腕来西安，情形也不过如此。而那辆车呢，已先刘亮十分钟进入大厅，停在兑奖台一侧，新崭崭的蓝黑色宝马，亮亮地闪着耀人眼目的光气。

下午2点30分，主持人宣布兑奖仪式开始，刘亮走上设在大厅里的领奖台。公安局新城分局负责人首先介绍了案情，宣读了刘亮获奖的宝马汽车予以解封的决定。接着，西安市体彩中心负责人宣读了刘亮2004年3月23日所获特A奖彩票有效的决定，陕西省体育局局长李明华、西安市体育局局长王凯利分别向刘

亮道谦。王局长紧紧握住刘亮的双手，郑重地说：“请你相信，今后体育彩票绝对由政府负责发行，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这件事让你受委屈了！今后我们一定改正工作态度，进一步提高管理。”这位王局长的话当然不仅是对刘亮一个人说的。李局长接过话头，面对众多记者，说：“感谢媒体的舆论监督，省市体育局谢谢你们了！”

再下来，新城区公证处的公证员将公证书递送到刘亮手中，刘亮郑重地在公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然后微笑着同女公证员握手道谢。新城区中山门地税所的税务员当场为刘亮办理了纳税手续，人们注意到，刘亮上的税额是 11.977 万元。

之后，刘亮从西安市体彩中心负责人手中接过扣过税后的奖金和两把宝马车钥匙，他将钥匙举过头顶，让记者们拍照。面对伸到面前的话筒，刘亮说：“此时此刻我非常高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公安机关，是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破案，才洗刷了泼在我身上的污水，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随后，刘亮坐进已属于自己的宝马车里，接过现场工作人员献上的鲜花，不停地挥动，向周围的人们致意，车则由宝马公司的工作人员驾驶着，缓缓驶出大厅。这样的情形，刘亮已不陌生，大家也不陌生。七十多天前，就上演过一次。



图十七 1 刘亮笑了（资料图片）



图十七 2 刘亮再次乘宝马（资料图片）

想起来，人生真好比一出活剧，一折喜，一折悲，一折又是喜……今天的刘亮演的是喜剧了，那么，下来该不会再有什么预料不到的事情吧？这一层，十七岁的刘亮大概还想不到。但年长刘亮一辈的人就不能不想了。你瞧，陪坐在刘亮

身边的刘亮的舅舅、退休干部杨答民，和刘亮的大伯刘志涛就一直面色沉静，几乎一言不发。

3点10分左右，刘亮的父母冒雨赶来，因司机路不熟，他们来得有些晚了，但不算太晚，刚赶上刘亮乘坐的宝马车从大厅出来。刘亮的母亲杨敏贤快步走到宝马车前，从袋子里取出一条事先准备好的大红色的缎被面，在亲友的协助下，由车头左侧挂到车头右侧。——这是民间庆贺礼仪之一种，谓之“披红”。

披完红，一个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意想不到的情形出现了，杨敏贤突然两腿软倒，双手捂脸，放声大哭起来，泪水和着雨水满面流淌。跟在身边的刘亮的姨妈赶忙将她扶起。有记者上前问她有什么想法，她抽抽泣泣地说：“我娃……终于……清白了……”

——这是宝马案发生以来，杨敏贤的第二次当众痛哭。第一次是在七十天前家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流的是悲愤冤屈之泪，而这一次，流的就是悲去喜来之泪了。

3点过半，刘亮同父母亲属一起，乘坐着已属于自己的宝马车，高高兴兴地驰上回家之路。

一个小时之后，宝马车出现在街子村的村道上。

噼哩啪啦，噼哩啪啦……鞭炮响了起来。——这也是刘家事先准备好的，两大盘呢。在鞭炮腾起的烟雾中，刘亮打开车顶上的天窗，站了起来。他一手高举鲜花，一手做出胜利的姿势，让记者朋友们拍照个够，也让乡亲们分享他的喜幸。这时候天雨已住，空气湿润而清新。

宝马车缓缓地停在离刘家门口几米远的地方，刘亮从车上下来，乡亲们却围了上去，你摸摸车门，他瞅瞅标志，车头抚一下，车里看一看，嘴里啧啧着，流露出羡慕之情。

刘亮进屋端出来糖果和瓜子，让众乡亲享用。这时候，刘亮父亲上前，交待司机把车开到他做水暖工的干休所去，那里有车库——家里地方小，放不下这个大宝贝。

5时左右，刘家人将一张写字台抬放到院子里，铺上一条干净的床单，将宝马公司送给刘亮的那束鲜花放在台前。众记者和乡亲们围上前来：刘家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细微的雨丝中宣布开幕。



图十七 3 刘亮将宝马牵回家（资料图片）

刘亮的父亲刘耀利首先发言，他说：“我们想到过，迟早有一天，这宝马车是要回来的，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公安机关迅速破案，才让刘亮领回了宝马。”

接下来是刘亮的大伯刘志涛，皤皤白发的老先生清清嗓子，沉静地道：“3月27日，我们在这儿举行过一个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同一个地点，我们再开这样一个会，都是面对记者，但心情截然不同。上一次是被迫的，心里充满了悲愤，这一次是高兴的。对我们来讲，领回宝马车并不是整个事件的全部意义，最重要的是卸掉了刘亮无辜背上的‘造假’恶名。记得最初家里人让我来挑头做这件事，我并不同意，因为我感到和政府部门打官司实在有很大的压力。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还是承担了这件事。大家应该都记得，我在那次会上曾经说过，之所以会发生这件让人伤心的事情，肯定是有一小撮人在搞鬼，我们是相信政府、相信公安机关、相信新闻媒体的，他们一定会以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处理这件事，事情最终一定会水落石出。现在一切都得到验证，我们确实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首先要感谢新闻媒体的记者，他们始终能够坚持真理，伸张正义。这件事的发展也说明新闻媒体监督的力度已经越来越大，说明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其次要感谢公安机关。据了解，杨永明等人曾恶人先告状向新城区公安分局报了案，要求立即拘留刘亮。但公安人员始终表现得非常慎重，并没有轻率地采取行动。后来，专案组的人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极高的工作效率，在很短时间内就侦破了这个案子，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还刘亮以清白，我们一家人对此非常感激。”

有记者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刘家人说：“道歉只是对方做了应该做的一步，目前事情只是完成了一个段落，还没有完全结束。至于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我们还得商量商量。”

宝马由刘亮牵回，新闻被媒体热炒。第二天，6月5日，西安的大大小的报纸，都以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这一事件，图片，特写，言论，札记，满登登地齐拥而上，有的标题做得特别棒，如《曾经披红戴花空手归，如今洗去冤屈再领奖——刘亮昨终于开回“宝马”》（《西安晚报》）；有的照片发得特别大，占了头版一个整版，如《刘亮的宝马回家了》（《三秦都市报》）；有的论点很显明，如《刘亮的胜利，正义的胜利》（《陕西日报》）。



图十七 4 胜利的喜悦（资料图片）

中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度，也是一个英雄诗辈出的国度。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几乎每出一个英雄，都会涌现一批歌颂英雄的诗篇。

“祝贺你，刘亮！/你用坚信的眼神，/敬答千万颗庆贺的心/……全省全国人民赞扬你；/是反腐败的勇士；/是打假的英雄；/是敲响彩票市场警钟的先锋，/是杨永明团伙的掘墓人……”（《三秦都市报》2004/06/07）这是一位笔名“山水”的退休干部看了宝马案的报道后写给刘亮的诗。年已古稀的山水先生不但将自己的诗作送到报社，还专程从住地西安西郊赶到东郊灞桥街子村刘亮家，当面向刘亮诵念了这首诗。老先生念得抑扬顿挫，充满激情。刘亮连声感谢，他接过诗篇，仔细地阅读了一遍，这才郑重地放进抽屉里。

从艺术角度讲，你会觉得这首诗直白了些。但是，他反映的是一种心声、一份真情。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一位名叫陈益昌的退休师傅想注册“刘亮”商标，后因刘亮的父亲刘耀利坚决不同意而作罢。

年过花甲的陈师傅家住西安市长安区，平时喜欢阅读报纸。宝马彩票案发生

以后，刘亮成为他关注的对象。他觉得，刘亮敢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其性格堪称“陕西愣娃”性格之典型，让人佩服。几天来，他和朋友一直在讨论注册“刘亮”商标的事，因为他以前做过药材生意，就想把“刘亮”注册在药材上，不知刘亮及家人是否同意。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华商报》（2004/06/05）记者张蕙，希望张记者代为转达。

“刘亮”是否可注册为商标呢？张记者采访了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称，按照《商标法》规定，“刘亮”只是一个普通名字，国内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多，名字本身并没有专属权和排他权，谁都可申请注册。去年，“杨利伟”商标也被人到处注册，申请注册是申请人的权利和自由，和刘亮家人是否同意没有关系。陈师傅只要带上身份证和相关费用就可以直接去商标代理机构申请注册了。

于是，张记者拨通了刘亮家的电话，刘亮的父亲刘耀利接了电话，听完记者的陈述，刘耀利说：“这不行，这是人权啊！这件事得等刘亮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再说！”张记者将刘耀利的话转达给陈师傅，陈师傅说：“人家不同意，就不注册了。”记者把专业人士对《商标法》有关规定的解释告诉陈师傅：申请注册“刘亮”商标是申请人的自由。陈师傅听了半天，末了回应道：“这咋能行，刘亮家人不同意，我们咋能注册呢？”——看来，这位陈师傅也是个实诚人。

8月8日，笔者到刘亮家采访时，刘耀利曾谈及不同意的原因：“现在的药材市场很混乱，如果出了一个以刘亮的名字命名的假药，怎么办？”

## 第十八波

### 六大员被铐 刘家罢打官司 百余人涉案 陕西深挖蛀虫

2004年6月8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3·25即开型体育彩票造假案”协调小组召开媒体通气会，该案违法违纪查处组组长张启钧向新闻媒体通报称：经调查，省、市体彩部门、公证部门少数工作人员在案件中涉嫌渎职的违法违纪问题现已初步查清。检察机关已依法对贾安庆、张永民、樊宏、吴燕华、田伟东、董萍六人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刑事拘留。

造假案发生后，陕西省和西安市有关部门先后成立了专案组和违法违纪查处组，由省纪委、省检察院牵头，省体育局纪检组、西安市纪委、西安市检察院、新城区纪委、新城区检察院、碑林区纪委、碑林区检察院等单位参加。自5月26日成立以来，违法违纪查处组先后设立了四个工作点，抽调一百六十多人参加调查工作。期间，由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对十人分别采取了“双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或“两指”（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措施。

调查发现，在这次彩票销售过程中，省、市体彩中心派往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公证部门的公证人员，在执行监管和公证工作中严重渎职，使得彩票销售在二次抽奖和公证等环节的监督形同虚设，给杨永明、孙承贵等人合伙实施诈骗留下了可乘之机。

经对陕西省体彩中心原主任贾安庆、副主任张永民、发行部原副部长吴燕华、发行部原管理员田伟东、西安市体彩中心原主任樊宏、新城区公证处公证员董萍等人的涉嫌违法违纪事实进行审查，违法违纪查处组认为，上述人员的行为已违反了党纪政纪规定，并涉嫌违法犯罪，分别移交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审查。

根据违法违纪查处组审查的情况，5月31日至6月7日，有关纪检监察机

关分别对贾安庆、张永民、樊宏、吴燕华、田伟东、董萍立案调查。

6月2日至8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和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贾安庆、张永民、樊宏、吴燕华、田伟东、董萍立案侦查。

6月4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吴燕华、田伟东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实施刑事拘留；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董萍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实施刑事拘留。6月8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贾安庆、樊宏依法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张永民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实施刑事拘留。

张启钧还透露，违法违纪查处组已开始对此次体彩规模销售中有关人员的领导责任展开调查。同时，对已发现的2000年在省体育场举办的即开型体育彩票规模销售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另外，对1998年以来全省即开型体育彩票规模销售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问题，包括经济方面的违法违纪问题，也正在深入调查中。

同一天，在陕西省政府《行政许可法》实施动员办公会议上，贾治邦省长严厉斥责“宝马彩票案”，指出：这一案件严重损伤了政府公信力。

贾治邦说：这个体彩案件曝光出来以后，使老百姓对政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老百姓现在能相信谁，本来最相信政府，这个体彩案出来是啥问题呢？使老百姓不相信了，政府都在干什么呢？公信公证单位在干什么？这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极度的损失。

贾治邦指出：公证部门在这个事件中作假本身就是没有依法履行职责，知法犯法，这个事件对政府职能部门触动很大、很深，引发的思考也很多，其中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如何依法行政，树立便民、诚信、高效的政府形象。

贾治邦要求：全省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真正摆到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严格执行这部法律确定的原则、制度和措施，规范政府许可行为，建立诚信、法制型政府。

——某平面媒体在报道贾省长的讲话时，用了“痛斥宝马彩票案”一语，此语似有语病，应该痛斥的是涉案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行为，而不是作为“有关诉讼和违法事件”的案件。因为案件发生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也不全是坏事。

就这次宝马彩票案而言，因出现假票、刘亮被诬强烈反弹而有此一案，如果不出现假票，或刘亮受诬而放弃反抗，或媒体被封锁而不予以关注，或关注的程度不够，那么，很可能就没有此案，或有此案而达不到现在的程度，杨永明等人很可能像历次体彩那样，设法“摆平”方方面面，从而逍遥法外，继续他们的为非作歹。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此案，杨永明一伙的罪恶行径才得以暴露，那些“公”字号的蠹虫才现出原形，才给了纪检、司法机关以惩治罪犯的机会。好比一个人身上生了疮，腐烂流脓，患之者感到痛，观之者觉得丑，怎么说也算不得一桩雅事。然而，需要明白的是，之所以生疮是因为体内积了毒需要朝出排，疮不过是毒的“外化”而已。那么，动手术把这个疮剜了，对这个人是好处多呢还是坏处多？不言自明。

随后，陕西省政法委书记、“3·25 即开型体彩造假案”协调小组赵姓组长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专访。赵组长告诉记者，此案件发生后，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李建国书记、贾治邦省长都作过多次指示，后来随着事件的不断深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等领导也都十分关心此案。目前，陕西省已成立“3·25”专案组、违法违纪调查组等五个小组，其中仅违法违纪调查组就由一百六十多人组成。最近在全省各市又成立了专案组，要对所有的即开型体彩彻查一遍。要求重点查明几个问题：

一是杨永明是怎么开始承包陕西体彩发行的，谁为他提供了方便？二是省市体彩中心有关人员的问题。我们已经对原省体彩中心主任和副主任以及负责发行、管理的人员采取了措施，他们的问题已基本查清，准备移送司法机关。目前还查明西安市体彩中心不按规定、三次超额发行彩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人让发行商如此大胆？三是公证部门的问题，有些人也将受到惩处。整个案件共涉及一百多人。

赵组长说，杨永明正在交代他对政府官员的行贿罪行。我们还在调查体育、财政行政部门，要搞清责任。我们将彻底查清有关问题，无论涉及到谁，涉及到哪个单位，都要一查到底。一句话，就是决不让一个涉案者、违法者、违纪者逍遥于法纪之外。

谈到彩民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赵组长说：我们是以诈骗罪对杨永明实施逮捕的。从广义上理解，杨永明欺骗了所有的人，因为他欺骗了大家对彩票发行的

信任。但从狭义方面看，还得作具体分析。现在掌握的情况是，杨永明在发行彩票过程中，对第一次抽奖的安排并没有做什么手脚，获奖的机会对大家还是一样的。他造假是放在第二个阶段，就是抽取大奖的时候。在“3·25”案件里，每组十二个中奖者抽取宝马的机会被他用非法途径剥夺了，他侵犯了这十二个人中大奖的权益。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这部分彩民的利益，准备让他们重新进行一次抽奖。这次彩票发行共有五十四个人进入第二阶段，除掉三个“托儿”和刘亮，还有五十个人，他们还有赢取宝马的机会。

谈到“3·25”案件的影响，赵组长说：这个案件的影响十分恶劣，不仅暴露了彩票发行、管理的很多漏洞，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失去了公信，影响了民心，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制订了很多关于彩票发行的条例，可是这些在杨永明身上都没有好好地得到执行，以至于杨永明自己就可以使用体彩中心和公证处的公章，自由支取，完全无法无天。

赵组长认为，体彩发行是国家的一种公益事业，广大彩民对体彩的信任实际上是对政府的信任，而发行商一旦进入就将彩票发行变成了市场行为，监管不力就会出现腐败和犯罪。加强立法和监管，应该是今后彩票发行工作的一个重点。至于究竟是政府直接发行好呢，还是沿用过去的做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广大彩民应相信政府，对彩票发行的管理会日臻完善。

赵组长的上述谈话有几个值得品味的“亮点”——

一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十分关心此案”。总理怎么会关心此案呢？——大概媒体，尤其是中央媒体的报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面当然有刘亮的功劳，是他的冲天一怒，给了媒体一个特别“抢眼”的“由头”。那么，总理为什么要关心此案呢？有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彩票业的年销售额已达四百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数十万，而彩民人数发展迅速，粗略统计已接近一亿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中国，大约十三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买彩票。新一届政府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于是，作为一个受老百姓爱戴的“亲民总理”，关心此案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还有，总理关心此案有什么意义呢？哪可就多了！别的不说，陕西方面后来能对此案如此重视，人们有理由认为，是和温总理的“十分关心”有直接关系的。据了解，此案初发的时候，一些媒体曾接到过“不报”的通知，只是在中央媒体多方位介入后，才“放

开”的。难怪新华社在转发此稿时，要以“国务院领导关注宝马彩票案，陕西将彻查体彩问题”为题。

二是此案涉及上百人，查案人员多达一百六十人，这两个数字，在一个地方的办案史上，应当说是罕见的。笔者年近半百，在西安生活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这样的情形还是第一次听说。

三是“杨永明正在交代他对政府官员的行贿罪行”。作为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这样的话当然不是随便说的，从话中，人们已经感觉到，虽然杨永明的交待还处于“现在进行时”，但专案组对涉案官员的受贿罪行分明已有所掌握，这便应了大家的推测：杨永明早把体彩的官员买通了！

当天下午，媒体通气会一结束，记者们就立即驱车赶往灞桥街子村。听到汽车喇叭声，刘亮的母亲杨敏贤迎出门来，记者们注意到，杨敏贤脸上已晴空如洗，曾见过的那团愁云，已一散而去。当记者一边把会上发的《情况通报》递给她，一边说贾安庆等人被抓起来了时，杨敏贤笑逐颜开，高兴地说：“这些人真是罪有应得，处理得好，处理得及时。”

刘亮的舅舅杨答明也迎上前来，一边招呼记者入座，一边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处理得太好了。我以前在有关媒体采访时就曾说过，贾安庆、董萍等人的落网是迟早的事，因为他们都是咎由自取，但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刘亮和父亲刘耀利都不在家，他们上午就出了门，到新城区人民法院商谈有关撤诉的问题去了。记者们等了一会，门外传来说话声，杨敏贤说：“人回来了。”话音未落地，刘亮和父亲就跨进了家门。记者们围上前，你一句我一句地向他讲述发布会的情况。杨敏贤把《情况通报》递给儿子，刘亮立马捧着读了起来，嘴角扯开一丝笑意。

刘耀利喝了一口水，又给大家的杯子里添了水，然后告诉记者们：由于体彩中心已履行了兑奖义务，将宝马车还给了刘亮，以前的诉讼请求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他们决定撤诉，今天已对法院讲了，相关法律手续过几天就办。当然，宝马彩票案发生后，刘亮和家人在精神上、身体上、经济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此，他们下一步将进行精神赔偿的诉讼。目前正在做准备工作，具体起诉谁、如何起诉、起诉的标的是多少，都还需要全家人商量后再说，当然，还要听听律师们的意见。

## 第十九波

### 卖掉宝马 开心刘亮飞北京 感谢媒体 鲜亮锦旗送报社

生活中有一种“不遇”现象，即你最需要的东西，往往是任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而你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又常常不期而来，你不想要都不行。

刘亮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刘家需要宝马车吗？听听刘家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要这车干啥？也没有人会开。这两个月家里为了应付这件事已经花了一万多元，可把人整扎了，家里每个人身体都被这车弄得有病咧。刘亮他妈有胃病，他爸今天早上才去了趟医院。要这车也没有人会开，干啥嘛！”这是七十多岁的刘亮奶奶的话。

“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宝马开回家后，我和刘亮又去电视台做了几回节目，加上又要收麦子，把人累得都有点招不住了。前几天下了点雨，没有及时晾晒，麦子都有些发黑了。麦子收后该种玉米，可收割机留下的麦茬，那么高，又不允许放火烧，这宝马车也不是拖拉机，不能帮咱干农活，对咱这个农民家庭确实没什么用处。再说开了车，油钱谁来出啊？卖掉吧，一时还没有个合适的买家，家里院门小又放不下，现在只好放在人家单位的院子里。”刘亮的父亲刘耀利说。

“宝马领回来后，我兴奋了几天，新鲜了几天，但几天眼瘾过罢，烦恼就来了。我一个农民娃，要一个高档车干什么？再说这车放在人家单位的院子里，心里总是个事，好家伙，那一个轮子就八千元，要是谁给咱卸去了，还不把人心疼死了？就是谁给车上划一道子，咱也受不了。”刘亮说。

刘家当下最需要什么？钱。招待来客要钱，看病要钱，交电话费要钱，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抬脚起步离不了钱……彩票事件发生后，为应付各种开支，刘家几乎花光了仅有的九千来块钱，还欠了不少债，包括领车时交的三千块钱公证

费，也是借来的。“还有电话费，也让人吃不消。”刘耀利扳着指头对记者说，“没有这事前，一个月顶多一百来元，而现在呢？4月份一百六十七，5月份四百八十九，6月份四百四十五。”

于是，刘家人产生尽快把车卖掉的想法就很自然了。既然要卖，就有个价钱问题。发票上开的价格是47.3万余元，据了解，当下的市场价是46.8万余元。“咱也不贪心，只要买主真心实意，不漫天砍价，咱啥话都好说。”刘耀利说。

刘亮要卖宝马车的消息是6月5日通过媒体公开的，当天就有几十个人打电话咨询，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山西一位公司经理说，自3月底起，他就一直关注“宝马假票”事件，也在关注刘亮的命运。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一步，看到刘亮讨回宝马车，他也感到高兴。目下他的公司刚好要添一辆车，如果能买到刘亮的宝马，也算沾了点刘亮的“喜气”，给公司讨了个好的“彩头”。

除了打电话外，一拨一拨的人还跑到刘亮家中，有代表单位的，有以个人身份来的，有专门贩卖二手车的老板，还有拍卖公司经理。贩卖二手车的老板把价都压得很低，想从中多赚一些。拍卖公司经理来，是想帮助刘亮以拍卖的方式处理这辆宝马车。有的拍卖公司还提出优惠条件，说如果答应由他们公司来拍卖，他们可以考虑不收有关费用。

——汉语中的有些词汇是耐人咀嚼的，比如带“利”字的“权利”“胜利”“名利”：有权就有“利”，有胜就有“利”，有名就有“利”。刘亮头上没顶官帽，手中无权，谈不上权之“利”；但刘亮在这起案件中是获胜者，这便有了因胜而来的“利”；况且，刘亮因登高一呼，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几乎一夜间，便由一个不为人知的农村小伙子，变成了万众瞩目的“打假英雄”、声名远播的“新闻人物”，这便有了因名而来的“利”。人说“名气不能当饭吃”，但名气也的确能让人得些“利”。比如，拍卖公司为了把这桩具有特殊意义的“拍卖”抓到手，提出免收拍卖佣金，如果这样的拍卖成功，就等于刘亮在拍卖所得款项之外，还多得了一份佣金的“利”。当然，拍卖公司也不是傻瓜，他们看中的是刘亮的名，他们相信，这名会给他们公司带来声誉，从而得到更多的“利”。

十天后，6月15日，刘亮的宝马终于卖掉了，买主是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南方客商。据说这个南方人十分谨慎，为买这辆宝马先后两次来西安，第一次来，只将购车手续办了，第二次来，才向刘家人付了全部车款。至于卖了多少钱，那

个男方客商到底是个什么身份，“这都是敏感问题，我们和南方客商达成了协议，对外界保密。如果我们向外界透露了他的信息，我们就得付 20%的违约金。再说了，这事我们也不愿意过于声张。”刘耀利对记者说，“价钱嘛，虽然比发票上开的那个价低些，但我们对这个结果还是满意的。车一出手，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唉，说实在话，这卖车，也不是个容易事。”

“卖车的消息是在网上发布的，报纸也都登了，打电话的人很多，来看车的人也不少，但实心实意想买的没有几个，我们觉得这个南方人是诚心诚意的。”刘亮说。

人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华商报》记者李克在报道中写了这么一个人，自我介绍是外省某大公司的老板，在电话中声称：“啥话都不要说了，我一口价七十万把车买下来，别人就不要想了，你给刘亮说，让他等着我，我马上坐飞机去西安。”李克听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家。然而，当天下午，当李克再拨打此人的电话时，电话里却传来了一句“你所拨打的电话已欠费停机”，之后三天，该电话一直关机。

至于问问价格就将电话挂断，或听了价格后表示再考虑一下，从此再不联系的情形就更多了。于是，李克判断，打电话的人，大部分人是“虚张声势”，不少人是“瞎搀和”。

尽管刘家人不怎么愿意说出宝马车卖了多少钱，但一些媒体还是紧追不放。6月下旬的一天，成都某报纸的记者来到西安，他们先到灞桥刘家采访了刘耀利，又不辞劳苦，驱车数十里，赶到秦岭山麓刘亮的舅爷家采访了刘亮。在随后发出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反正你们报纸是在四川卖，我们这里人也看不到，就告诉你吧：兑奖的宝马车卖了三十万元。”刘亮爽快地说出了卖车的收入。“我爸没骗你，钱真是都借出去了。”刘亮说，如果他拿去做生意，肯定要亏本，所以卖车的事都由爸爸做主，卖车的钱怎么花也由爸爸决定。“毕竟我还没满十八岁，严格来说我还是个孩子，总得听老人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刘亮说，在宝鸡的二舅跟他家关系特别好，二舅的二儿子因为经济拮据一直没有买房，卖了车后二舅就上门，爸爸二话不说就借给了二十四万元。“都没打条子，亲戚之间信得过。”刘亮不假思索地说，“等我再长大些，能支配这些钱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还我，那时我就

要用这些钱和我当兵的哥哥做出点事，现在主要是要多学本事。”但就是在刘亮的家，刘亮的父亲却不无忧虑地说：“亲戚借钱都没啥说的，可又不好意思开口让他们打条子，将来啥时还啊……”

对上述报道，刘家人颇有微词。在另外的场合，刘亮对记者说：“反正是卖多少钱我不可能说，反正就是三十万到七十万中间吧。”对有关卖了三十万元的报道，刘亮笑称：“那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就要承担责任了！”当记者谈到有人说刘亮已把卖车得来的钱挥霍一空时，刘亮还幽默了一把：“肯定挥霍一空，因为我存在银行里边了，用于国家的资金周转吧。”他还讲他存的是死期，“存上十几年，等我长大了，我就知道这个钱怎么花了，但现在我肯定不知道这钱怎么花。”

刘家人以为，车一卖，就轻松了，就再没有人来打扰了，就可以过以往那种平平静静的安生日子了。一些关心刘亮的人士也撰文呼吁：“让刘家人平静地生活吧！”

这其实是一厢情愿。淳朴的刘家人可能没有想到，人要是一出名，往往就身不由己了，想安静下来都成难事了。因为，这样那样的“利”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这些“利”已不是一般的蝇头小利，而是和人的本质中高层位的那些欲求相契合，与被承认、被尊重、价值实现、地位提高等等联系在一起了。

这不，刚把宝马卖了，中央电视台的“小崔说事”栏目的邀请电话就打来了——案子初发时，央视的“今日说法”“实话实说”栏目就曾邀请刘亮到北京制作节目，鉴于案子真相未明，一家心情都不好，就婉拒了。现在，案子告破了，宝马也出手了，就没有理由再拒绝了。再说，和许多人一样，对崔永元主持的节目，刘亮和家人也都很喜欢。

于是，刘家组成了以刘亮为首的亲友团，包括刘亮的父母、舅父母、表嫂、侄儿一行七人，于6月16日订了第二天西安飞往北京的机票。

“这次宝马假票事件，前前后后七十多天，让我们一家人太累了。这次去北京，除了做节目，还要去放松一下。登长城和看毛主席是两个最大的愿望。不到长城非好汉嘛，我这次也去当当好汉。”刘亮说。

6月17日一大早，刘耀利工作的单位派了一辆吉普车送刘亮一行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到达候机大厅后，有旅客认出了刘亮，扬手和他打招呼，刘亮也笑

着回应，引起不少人侧目。这时候，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吧，机场派出所的几个公安人员来到了刘亮身边，他们是通过机场的监控扫描仪发现刘亮的。他们带着刘亮办理登机手续，办完手续后，又带着刘亮一行人通过贵宾通道直接登机。

刘亮和父母都是第一次坐飞机。宽阔的跑道，绝对漂亮的空姐，堆山连海般的云团，耀眼的阳光，碧蓝的天空……这些景物，过去只在电视、电影里看过，如今身临其境，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当然，也有点害怕：这飞机会不会掉下去呀？飞机起落时，耳朵里头发聩，有些不适应，好在一会儿就过去了。

当日午后，刘亮一行下了飞机。一出机场，他们就看到了“迎接刘亮”的横幅。拉横幅的人他们都不认识，猜想可能是北京媒体的记者们。他们上了央视的面包车。

接下来的三天里，刘亮先后坐在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社会记录”“小崔说事”等栏目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嘉宾席上。几个月来频繁地同媒体打交道，面对镜头和话筒，刘亮已历练得相当自如。看得出来，他依遵的是“本色”原则，是什么就说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就干脆不回答，一笑了之。给人的感觉是憨憨的，实实的，挺可爱的农村大男孩的样子。

北京之行，在了解京城风光、风情的同时，刘亮也充分地体验到了所谓的名人效应和受人尊重的滋味。央视承担了刘亮和其父母的往返机票。在候机厅，在飞机上，在电视台，在北京街头，许多人都一眼认出了刘亮，纷纷和他握手、合影，至于“做得对”“好样的”之类的话，更是不绝于耳。做完节目，两家媒体还给刘亮题了词。“新闻调查”栏目的题词是“好小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题词是“佩服你，祝一切都好”。

刘亮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胜利者才有的自豪感。在“社会记录”做节目时，他说：“我为国家作贡献了，国家也不可能把我忘了，要为我颁奖，我也不要十大新闻人物奖了，把社会贡献奖给我就行了。……我觉得我贡献挺大，我家几辈子没见为国家弄出来这么大的事，没想过。……我不觉得骄傲，倒觉得很光荣，很自豪。”

做节目的间隙，刘亮还和家人游览了天安门、颐和园等景点，不过还是有点遗憾：“毛主席纪念堂和长城都没去成，纪念堂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没开门，长城是因为那天下雨了。不过没关系，下次去北京我一定补上。”刘亮说。

从北京回来后，6月下旬，刘亮和父亲先后给《三秦都市报》《西安晚报》等媒体赠送了锦旗，锦旗紫红底，金黄字，醒目地写着：“仗义护真理，为民论是非”。刘亮感激地说：“没有你们的报道，就没有我今天的清白。”刘耀利也连声道谢，说：“等把帮助过我们的媒体和朋友都答谢完了，我们会提起名誉侵权和精神赔偿的诉讼。”

我们相信，刘亮和家人对媒体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的确，若没有众多新闻媒体的参与，刘亮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记忆犹新，事件初起的时候，刘亮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要势有势，要阵地有阵地，相比之下，刘亮不过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娃，要权没权，要钱没钱，要势没势，要阵地没阵地，处于绝对的弱势。

但是，自从新闻媒体介入以后，形势就起了变化。“咱娃没文化，人家有文化，咱拿没文化跟人家有文化碰，碰不过哩。”读者一定还有印象，这是笔者前面提到过的七十多岁的刘亮奶奶的话。你不能说老人家的话没有道理，你也不能说老人家的话不是某些实际情况的反映。但在媒体介入以后，刘亮就有了“文化”，这“文化”是由那些有胆有识、有才华、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记者们，和他们身后的强有力的媒体联合起来构成的。

于是，很快，杨永明、贾安庆、樊宏一方就由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强，转化成了穷于应付、难于招架的弱了。这里面最本质的原因，是刘亮事实上没有造假、没有犯罪，真正的罪犯是杨永明一伙。于是，刘亮才敢登高一呼，才敢在自己家里举行前所未有的新闻发布会，从而引来众多媒体关注、同情、支持、声援的目光，以及随之面世的那些激浊扬清、旗帜鲜明的节目和文章。

据刘亮的父亲刘耀利介绍，宝马彩票案发生以来，刘家接待过的媒体已达一百五十多家。仅上门造访的媒体就有六十余家，其中中央电视台就有七个栏目。另外，约有四十多家媒体几乎每天打电话关注事件的动态和进展情况。在关键的那些天，刘家的电话都快打爆了，几乎每天都有五十到六十个电话打进来，早上7点左右电话铃响起，一直会持续到次日零时，有时凌晨2点左右也停不下来。

过去常见到的情形是，司法、纪检部门调查在先，初步有了结果了，才见媒体报道，这次事件的情形不同，是媒体充当了开路先锋，随后，司法、纪检部

门才赶了上来。这期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4月11日播出的《体育彩票个人承包》、“新闻调查”栏目4月22日播出的《西安体彩风波》、“焦点访谈”栏目5月15日播出的《造假者如何轻易得手》、“时空连线”栏目5月17日播出的《解剖杨永明的角色骗局》、“焦点访谈”栏目5月29日播出的《大奖得主无一属实》等节目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图十九 1 刘耀利、刘亮父子在家中接受央视记者采访（资料图片）

对这些节目，一个叫“春暖花开”的网民评价道：“这一次央视真的发飙了。……一次又一次的黄金时间追踪，借助于自己超然的影响力试图把陕西体彩这锅混水澄出个人影来。央视能成功吗？我们应该相信她能，因为除了她，已经没有第二个如此执着的‘揭黑者’了……”

另一个叫“大漠孤烟”的网民则提出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为什么黑幕的每一次曝光的‘猛料’都是中央以及外地媒体所披露？刚开始还是当地媒体最先报道，但是，随着事情的深入，在公众最想知道的关键问题上，当地媒体却淡出了，如果这种批评性的报道都是由中央级媒体和外地媒体肩负舆论监督的使命的话，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悲哀。”



图十九 2 笔者采访刘亮的父亲刘耀利（左）后合影

的确，在刘亮摸中宝马的第二天，3月24日，《三秦都市报》就在一版醒目位置发了《灞桥小伙中得宝马》的图片；3月25日，西安电视台记者李林，在现场拍到了刘亮爬广告架，登高一呼的镜头，并随之将其做成节目播出；4月12日，《华商报》登出了记者谢正罡在调查了其他三个宝马得主身份证、地址、电话号码等之后采写的《另三宝马得主疑点重重》一稿，此文对揭开陕西体彩的黑幕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但是，之后，无论从报道的广度、深度、力度，陕西地方媒体都落在了央视的后面，基本上是跟着走。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曾同一些媒体从业者讨论过，大家一致认为，不是地方媒体的记者们新闻敏感性不强，也不是他们正义感、责任心、采写才能等不足，而是他们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束缚和制约，常常是人还没去呢，打招呼的电话就打来了。至于劳神费力地采访一整，废寝忘食地把稿子赶出来，把节目制作出来，却发不出去的情形，更是经常发生。

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市某些部门某些官员出问题，市上的媒体监督不了，得靠省以上的媒体；一个省某些部门某些官员出问题，省上的媒体监督

不了，得靠中央媒体。道理很简单：你在我的领导管制之下，我怎么能允许你挑我的“刺”？揭我的“疮疤”？暴露我的“阴暗面”，影响我一方地面的“大局”和“稳定”？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关中人口语中的一个词汇：“呛茬子”。这个词是和“顺茬子”相对的。中央媒体监督地方部门、地方官员是“顺茬子”，地方媒体监督地方部门、地方官员是“呛茬子”。“呛茬子”是别扭的、不顺的、矛盾的、冲突的。

记得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给中央电视台题写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当然是很好的，如果能做到，对国家的文明和进步肯定功莫大焉。但是，曾有报道说央视“焦点访谈”的说情人都排成了队，连中央媒体都常常遭遇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阻力，地方媒体的监督之难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要和世界文明接轨，出台相关的法律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说到法律，舆论监督只能代表社会正义的一部分，她代替不了法律。健全的舆论监督和法律约束，当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发展到高度的两个标志，也是推动和维护这个文明继续前行的两个轮子。

谈及宝马彩票案中调查侦破过程中的舆论监督，有两个人不能不提：王晓斑和栾文棠。两人都在陕西体彩中心工作过，杨永明团伙的所作所为，他们一直眼有所观、耳有所闻、心有所疑。王晓斑在看到西安电视台的播放的刘亮登广告牌事件后，主动找记者李林，讲出了杨永民是体彩中心的发行主管，在四年前的彩票发行中就造过假的内幕。随后，他又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终使躲在幕后，被认为“最不可能造假”的杨永明浮出水面。如果说王晓斑是站出来揭露“体育彩票个人承包”真相的第一勇士的话，七十二岁的栾文棠则是揭露陕西体彩代理更多内幕的老当益壮的有识之士，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华商报》等媒体披露出来的许多体彩黑幕，都出自栾先生之口。——特别要提一笔的是，王、栾二位几年前就多次找有关部门反映过杨永明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不说，据说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

生活中有些事情不能细想，一细想你就觉得挺滑稽。比如，从一定意义上说，贾安庆一伙这次是栽在记者手中了，是记者们以“抄后路”方式深入调查，使贾氏与杨永明背地里的“猫腻”大白于天下。按常理，在贾氏的内心深处，要他不

恨记者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有所不知，正是这位贾安庆，直到案发后的 7 月 15 日，还兼任着陕西省体育记者协会的“主席”呢。

所谓体育记者协会，按其名称，应该是从事体育报道工作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协会，案发前，贾安庆的身份是陕西省体彩中心的主任，一个政府官员，既不是记者，也不是通讯员，却当上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头儿”。不难设想，如果协会内的某一个记者从事一下“舆论监督”，写一篇揭露贾安庆违法违纪问题的文章，作为“主席”的贾安庆，不知道不说，如果知道了，能允许吗？能同意吗？能不想着法儿打压吗？

这便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色，当然也是一个痼疾：官本位。一个群众性的社团组织，非得拉一个党政官员做头领不可。于是，一些党政官员的头上，常常是本职本任之外，还这长那长、这主席那主席地顶了一大堆衔儿。不出事不说，一出事，衔儿下面的社团组织就觉得不怎么光彩，就得开个什么会，声明将某某罢免或开除，然后推选新任，而这位新任，往往还是一个党政官员。

陕西省体育记者协会走不出这个模式。7 月 15 日，这个协会召开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正式罢免了贾安庆兼任的该协会的主席职务，并开除了其会员资格。有关报道称，“根据协会业务指导上级陕西省体育局党组的安排建议，经常务委员会协商提名，通过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表决，选举省体育局党组书记晓敏为新的省体育记者协会主席”。

## 第二十波

**揭黑幕 贾安庆受贿十三万**

**查省彩 舞弊者再现十余人**

2004年7月7日，陕西省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纪委副书记张启钧向媒体通报了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西安宝马彩票案”中涉嫌受贿的查处情况。

据调查，2000年以来，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陕西省即开型体育彩票发行销售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杨永明所送现金。其中——

陕西省体育局原助理巡视员、省体彩中心原主任贾安庆收受13万元；省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永民收受4万元；省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长安收受6万元；省体彩中心原财务科副科长谢有财收受1.2万元；省体彩中心发行部原副部长吴燕华收受8000元；省体彩中心发行部原管理员田伟东收受7000元；西安市体彩中心原主任樊宏收受9.4万元；延安市体彩管理站原站长李智文收受7.06万元。



落马后的贾安庆

图二十一 落马后的贾安庆（资料图片）



图二十 2 宝马彩票案有关责任人受审（资料图片）

6月23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张长安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6月26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谢有财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按照指定管辖，7月1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李智文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检察机关认为，贾安庆、张永民、张长安、谢有财、吴燕华、田伟东、樊宏、李智文等人已涉嫌受贿罪，日前，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前期因涉嫌渎职犯罪已立案侦查的贾安庆、张永民、吴燕华、田伟东、樊宏等五人予以逮捕。

此前，6月17日，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因玩忽职守罪被立案侦查的新城区公证处原公证员董萍予以逮捕。

6月18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对碑林区公证处原主任万元模和原公证员李群分别以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罪立案并刑事拘留。7月2日，碑林区人民检察院对万元模、李群予以逮捕。——经查明，2000年11月初，体育彩票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公证人李群在碑林区体育局局长李新义和碑林区公证处主任万元模的多次要求下，根据彩民李选利（中奖五万元）的身份证复印件，制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伪造的中奖二十万的假公证书，为某些人套取十五万元资金开了绿灯。

据查，1998年以来，陕西十个市和杨凌示范区共发行即开型体彩一百九十一一次，销售总额15774.8万元。西安市中五万元以上奖项的九十五人，其他市

区中万元以上奖项的二百零四人，已查证采取舞弊手段骗领大奖的十一人，发现重要疑点待查的八人。目前查处工作仍在进行中。

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建国在会上宣布，由于杨永明一伙在3月20日至25日在西安市进行的即开型体彩二次抽奖中造假，侵害了部分入围二次抽奖彩民的正当权益，经研究决定，西安市将对此次体彩销售的二次抽奖采取补救措施，让部分参加二次抽奖的彩民重新得到抽取特等A奖即“宝马车+12万元现金”的机会。

补救抽奖将于近期在西安市举行，具有参加补救抽奖资格的彩民将由体彩部门提前四天通知。具有资格的彩民如不能按通知的时间参加补救抽奖的，将视为自动弃权。

据了解，3月20日到25日在西安市进行的即开型体彩销售中，每四百万元为一个奖组，每个奖组设十二个特等奖。截至本次销售活动结束，共产生了五个奖组的大奖。在五个奖组中，第1、2、4组的特等A奖，均由杨永明的同伙骗取二次抽奖资格，并按事先约定的非法方式抽走特等A奖。1、2、4组的抽奖过程，实际上是十三个人抽十三辆车，其中多出的奇瑞QQ，系杨永明私下加入。

经查，在第3、5奖组的抽奖中，未发现杨永明实施造假。其中第3组，刘亮于3月23日现场所抽中的特等A奖“宝马轿车+12万元现金”真实有效，所得奖品奖金已于6月4日兑付。该奖组兑奖时出现的一张假票已查清，涉嫌造假的案犯刘先奎等人已被公安机关拘捕，所骗得的赃物（赃款）已追回。第3组十二人现场二次抽奖结果有效。第5组应销售彩票四百万元，活动结束后实际销售一百二十二万元，特等A奖未被抽出属正常，其现场二次抽奖结果有效。

参加第1、2、4组并入围二次抽奖者将有机会获得二次补救抽奖的机会。

此前，6月22日，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侦查处处长阎劲宇也向媒体介绍了该市三个县的四名公证员玩忽职守被查处的情况。

阎劲宇说，榆林市一些县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不按照有关公证程序规则和财政部的文件规定进行监管，造成杨永明、孙承贵等人在得以在榆林销售体彩过程中实施诈骗。经初步查明，2003年2月10日，杨永明等人在府谷县举办的即开型体彩销售活动中，县公证处副主任王晓林（三级公证员）、公证员曹向成（三

级)，没有认真负责审查现场中奖人的身份证明，致使此次活动中的两个十万元（现金）大奖，一个一万元大奖，共二十一万元全部被杨永明等人骗取。6月16日，府谷县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对上述两名嫌疑人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刑事拘留。

检察机关还查明，2003年8月2日和2004年2月2日至5日，杨永明在靖边县举办了两次体彩销售活动，县公证处公证员陈煜（笔者按：就是面对央视镜头，说自己不是陈煜，并以去找陈煜为名借机溜走的那个人）为两次活动的现场公证员，其在履行公证公务中也没有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致使2003年8月2日中出的一个十万元（现金）大奖，以及2004年2月2日中出的两个大奖（奇瑞风云轿车各一辆外加现金各3.97万元），被杨永明等人骗领。靖边县检察院于6月17日决定，对陈煜以涉嫌玩忽职守立案侦查，日前陈被取保候审。

定边县公证处主任张洲源，在2004年2月1日定边县举办的即开型体彩销售中，其作为现场公证员，对现场中出的一辆奇瑞风云轿车加3.97万元现金的大奖，同样被杨永明“麻痹”，既没有审查中奖人的有关证件，也没有核实其身份，对二次抽奖号码袋没有进行认真地检查检验，给举办这次活动的杨永明等人提供了作弊的可乘之机，致使这一大奖被杨骗取。6月19日，定边县检察院以玩忽职守对张洲源立案侦查，并决定取保候审。

阎劲宇还告诉记者，杨永明一伙还参与了榆林市属下的榆阳区、横山、清涧、绥德（笔者按：那位面对记央视者，借口向上级请示，来了个“金蝉脱壳”，从另一个门溜了的田益名主任，就供职在绥德县公证处）等区县的体彩发售活动，也同样存在着诈骗行为。目前，这些区县的公安、检察机关已抽调大量的人力，紧张地做着调查落实的工作。

7月8日，西安大小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查处贾安庆等人涉嫌受贿情况的报道。笔者走近街头报摊，听到的最多的话是：“果然不出所料！”“怪道哩，贾安庆能让杨永明搞体彩，人家早成一窝子了嘛！”“黑钱好吃难消化呀！”“看来，政府真的下势了。”……

顺便说说——笔者比较了一下各报同一消息的刊载情况，尽管都是一个内容，但《华商报》做得最醒目，有图片，有提要，将涉案人员受贿及处理情况列表刊出，尤其是题目，很精彩，别的报纸多是“贾安庆等8人涉嫌受贿42万”，或“贾安庆受贿13万被逮捕”，《华商报》则是“杨永明42万砸倒体彩8官员”“拿头

担保的贾安庆受贿 13 万”，“砸”字和“拿头担保”用得好，形象，生动，突出核心，击中要害。



图二十三 媒体报道

上班后，和同事讨论，觉得这个贾安庆很有意思，和以往揭露出来的腐败官员相比，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别的腐败官员，在任上时，也多有台下大肆索受贿赂，台上慷慨激昂、头头是道地做反腐倡廉报告的情形，但一旦露馅，精神上就蔫了，毕竟做下不光彩的事了嘛，岂有心不虚之理？而贾安庆不一样，狐狸的尾巴都露出来了，还那么钢板硬正，又是“拿头担保”，又是指斥刘亮、威胁律师……气势威严，咄咄逼人，大有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不可冒犯的劲头。大家分析，那张假票出来后，贾安庆肯定是问过杨永明的，问杨“是不是你干的，或手下人干的”，而杨永明也肯定给贾安庆拍了胸脯，说“贾哥你放心，绝不是咱们的人干的”，于是，贾安庆心里有了底，口气就硬了起来。

还有，公布的是贾安庆受贿十三万，这大概是落实了的。在这十三万之外，还有没有呢？会不会像有的腐败官员那样，贪污受贿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

千万、几千万，可只“烂包”了几万或十几万，于是就只“落实”了几万或十几万，到头来只判了个几年了事，脏款也只没收那几万或十几万。这样的疑虑并非没有道理，我们见到过一些贪官，“出事”后并不感到特别的沮丧，他们甚至有些庆幸：自己虽然名誉受损，且失去几年自由，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巨额财富，算起来还赚了！

有这样一张照片：贾安庆面带微笑地坐在省体彩中心主任的位子上，身后是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墙上有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全心全意为彩民服务”。联想一下贾氏的所作所为，你会觉得这幅照片很有些讽刺意味。其实，中国的贪官，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面面上给人看的是一套，背地里做的是另一套。

很快，同一内容的消息，出现在全国各地各种媒体上，一些有识之士们再度纷纷发表看法——

盛大林说（《燕赵都市报》2004/07/09）：“贾安庆为什么如此鞍前马后地为杨永明‘保驾护航’？难道他不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难道他不知道这其中的‘风险’吗？现在，已经有了答案。西谚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同理，天下也没有免费的‘保护伞’。贾安庆之所以‘奋不顾身’，只不过是收了他收了杨永明的‘保护费’——既然已经上了‘贼船’，就不得不与贼首‘同舟共济’。

“规律之所以成为规律，就在于它有着普遍的适用性。就天下没有免费的‘保护伞’这条规律来说，其实早已是屡试不爽。在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受害人已将情况举报到当地工商所，但工商所负责人在吃了被举报者的宴请后，既不处理责任人，也不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再想想近年来打掉的一个个黑社会性质团伙，哪一伙没有‘保护伞’？而哪一个‘保护伞’又是免费撑起来的？

“贾安庆等人的拙劣表演再次提醒人们：只要发现监管者对其监管范围内的违法违规行听之任之，甚至为违法违规行为大开绿灯，那就应该马上将这些监管者纳入调查的范围。即使他们‘以自己人头担保’，也不能轻易放过。经验说明，越是信誓旦旦的人，往往越是有问题。只要动真格儿，这样的调查几乎‘十拿九稳’！”

网友刘利军说（“新华网”2004/07/09）：“十三万元就可以贱卖国家机关的公信力！何其痛哉！与之伍，陕西省、西安市两级体彩部门管理人员，共同以

42.16 万元的低价，出卖了陕西体彩的公信力，出卖了陕西省体彩管理部门的公信力。而公证机关的公证员，则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卖了公证公信。由此，陕西宝马彩票案也就演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对政府公信的出卖！

“两级体彩中心的涉案人员，把自己手中掌握的社会公器当成了谋利的工具，把政府的公信力当作私产出售，正所谓利令智昏。令人欣慰的是，所有这些人等都将接受法律的严惩，但这样集体出卖政府公信的行为，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政府公信力一旦被出卖，必然要付出十倍百倍甚至更为高昂的代价。”

《广州日报》（2004/07/08）的闻过先生，则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的西安市政府“叫好”：“西安宝马彩票案，峰回路转，余波未了：幸运儿刘亮为自己讨回了公道，赢回了宝马；彩票案的始作俑者‘拔出萝卜带出泥’，正在和即将得到法律的严惩。在正义得以伸张的同时，人们不禁会问：相对刘亮——这个倔强、执着又无比幸运的小伙子，其他那些应该中得宝马却又未得的人们，他们期待的公正又在哪儿呢？”

“……宝马彩票案，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当然不光是刘亮一个人。因为杨永明一伙是在第二次抽奖中造假——1、2、4 组的抽奖过程，是杨永明一伙安排的十三个人抽中十三辆车——因此，这几个小组获得了二次抽奖机会的人，和获得了第三小组特等奖的刘亮一样，都是犯罪分子的最大受害者。没有媒体的“聚焦”，他们的公平在哪儿呢？这其实也是媒体一直在反思的问题：当媒体报道某一个特困家庭时，这个家庭就有可能赢得社会的特别厚爱，而其他类似的许多家庭，因为没有被报道，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从这点上说，媒体的报道带来的公正，大概还不是完全公平的公正。这是媒体的局限。

“要实现公平和公正，并不是什么难题，关键在于主办者不能有私心。……西安市政府决定给曾经入围者以再次抽奖的机会，就是让那些和刘亮一样的受害者，同样享受到公平、公正的阳光普照。”

7 月 20 日，各媒体都刊发了《陕西省体彩中心新班子亮相》的消息。新上任的主任叫陈世骏，原任商洛市体育局局长，是 2003 年陕西省的十大优秀公仆之一。选一个优秀公仆做体彩中心的主任，可见陕西省决策层的良苦用心。面对媒体，陈世骏坦陈自己“压力很大”。他表示，省体彩中心眼下最重要的工作是

树立体彩新形象，提高彩票和政府的公信力。为此，他代表新班子郑重承诺：欢迎并将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尤其是社会舆论的监督批评，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陈主任讲得很好，如果能扎扎实实的践行，就更好。

## 第二一波

### 现场森严 彩民重抽宝马车 前途光明 刘亮接踵好事来

2004年7月12日一大早，笔者同本单位的三位记者一起，乘车前往位于北郊张家堡的西安体育馆，采访即开型体彩的二次补救抽奖活动。车8点半出北门，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车上，笔者不免纳闷：这样的一个恢复体彩声誉的活动，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热热闹闹地放在市区的某个空地上搞，而要放在这样一个僻远的人烟稀少的地方？这和笔者事先的想象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大相径庭。“大概是怕再出什么事吧。”一位同行者说。

不少警察守在体育馆场地的大铁门口，因车的前窗上有“新闻采访”的标识，未被拦挡，直接开进了场地。这其实是第一道防线，一般老百姓都被挡在了这道防线之外。

宽阔的场地里安静得像什么活动都没有。一方红地毯上停放着三辆宝马轿车，一辆乳白，一辆银灰，一辆深蓝。三个多月前，这三辆车分别被杨永明雇用的托儿岳斌、刘晓莉和王军抽中，事发后被公安机关封存。如今，它们静静地候在明媚的阳光下，等待着新的主人。

笔者注意到，在场地里走动的只有三种人：工作人员、记者和警察。工作人员和记者比较少，加在一起，几十个人而已；警察却很多，据说有二百名干警上岗，另有二百五十名特警待命。他们有的来回走动，有的站着或坐着。场地上停放着十几辆有明显警方标志的大巴车、小轿车和防爆车。见不到一个参加二次抽奖的彩民，据说他们前一天就在北郊的桃花源休闲山庄集中，住了一宵，今天早上集体乘一辆大巴，在警车的护送下入场，从另一个门直接进到馆内。

9点左右，大家开始陆续进馆。入口处六名警察夹道站立，首先检查记者证。这时候，笔者所持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监制核发的灰黑皮的记者证失去了效用，人家要看的，是专门为这次活动印制的“即开体彩二次抽奖补救措施”活动、盖着“西安市公安局治安秩序管理专用章”的明黄色的记者证。这

样的黄牌记者证给笔者所在的西安日报社只发了三个，而我们去了四个人，怎么办？办法是“倒一下”，即同行的小杨和小郝先进去，小杨再把小郝的“黄牌”悄悄拿出来交给我，我再持这个“黄牌”进馆。



图二一 1 笔者站在三辆宝马轿车前



图二一 2 “即开体彩二次抽奖补救措施”活动记者证

检查“黄牌”之外，还要过一下专门设置的电子检测门，感觉和登飞机时的安检没有两样。进馆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抽奖现场，除正前方挂着“关注体育彩票发展体育事业”的红底白字条幅外，再无其他装饰。没有诱目的礼仪小姐，没有绕耳的伴奏音乐，看台上没有观众，场地间无人喧哗，感觉是空荡荡加静悄悄。

一圈高约1米的绿颜色的屏风板隔开了工作人员和记者们，省市体彩、公证、税务、监察等部门的人员可入屏风里，记者们只能坐在屏风外，而且还被告知，一会儿抽奖时最好就坐在椅子上，不可趋前，也不要随意走动。

笔者原以为可以将抽奖过程一睹在目了，没想到人家在开奖之前，又来了一次检查记者证。查到小郝时，因其“黄牌”挂在我的胸前，人家就要请她出场，声色俱厉的样子，还动手拉拉拽拽。笔者见状，只好把“黄牌”摘下，递给肩负有报道任务的小郝，起身走向馆外。出来后，笔者发现，没有“黄牌”的记者不止笔者一个，某电视台的一个小伙子和自己扛的摄像机一起，也被挡在了外边。

9时30分，主持人柯兴平先生宣布“抽奖活动开始”。柯先生是西安歌舞剧院的高级编导。为什么要请柯先生来主持？“我不是体彩中心和体育局的人，也不是政府官员，有公信力，也有主持大型活动的经验。”年过半百的柯先生事后对记者说。“我是四天前接到的通知，当时组织者要求严格保密，因此，我当主持人许多人都不知道。”

共有三十三个彩民获得了二次抽奖的资格。他们被分为三组，每组十一人。抽奖的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公证，现场公证人员首先核查证明彩民的身份，宣读核查结果，确认无误；接着核查抽奖密码箱的封闭情况、揭去封条、开启密码箱、检查放在箱中的密封袋，确认无误；打乱密封袋，将其一个个地插入摆放在现场中央的抽奖板上。第二步是抽奖，每组彩民按照原始抽奖顺序依次上前，从抽奖板上抽取密封袋。第三步，密封袋被全部抽走后，由现场的工作人员帮他们逐一剪开密封袋和里面的小信封，彩民自己亲手抽出小信封中的结果：或是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非常感谢您，希望您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国体育彩票！”或是一张中奖证明单——每组只有一个，由主持人当场宣布：“恭喜您中得‘宝马’+12万特等A奖！”

陕西省体彩中心，西安市体彩中心，西安市新城区公证处，西安市纪委、监

察局、地税局等部门指派到场的工作人员监督了整个抽奖过程。公证机关还将全部过程录了像。——教训是聪明和措施之母，新崭崭的密码箱，小信封外面再套个大信封，宣告杨永明之流的强光照射窥密法成为历史。而纪检、监察部门直接介入体彩活动，在中国彩票史上大概也是首开纪录。“我认为这个非常及时和重要，”主持人柯兴平事后评价说，“这也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契机，有利于恢复政府的公信力及体彩部门的形象。”

一个多小时的抽奖过程，产生了三个新的幸运儿。分别是：来自本省渭南，现在西安一公司打工的张平军；原籍福建，现在西安做建材生意的徐银忠；西安人，在本地做生意的邹丽华。中奖结果公布后，三个幸运者当场办理了公证、交税、退还原奖品及领奖等手续，然后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向放在馆外的已属于自己的宝马车。

彩民抽奖的时候，笔者候在馆外。天热，司机师傅就邀我坐进车内，打开空调聊天。正聊着，我忽然看见一个小伙子手捧鲜花，在一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于是说一声，“哎，出来了！”赶快下车，手持相机，奔向停宝马的地方。小伙子走得很快，我赶到时，工作人员已拉开了乳白色宝马车的后门，小伙子正抬脚坐进车里。见我赶到，小伙子冲我笑了一下，我立即按下快门，拍了一张，不等拍第二张，车已开动——体彩方面安排的司机已提前坐在车里，我连忙再按快门，又拍下一张。由于馆内的抽奖还在继续，绝大多数记者都没有拍摄到第一位中奖者张平军乘宝马车离开现场的照片。于是我拍的这两张，就成为“独家”，发表在第二天报纸的头版。



图二一 3 第一位中奖者乘宝马车快速离开



图二一 4 第二位中奖者被护送着步履匆匆

第二位中奖者徐银忠出来时，拍照片的记者就多了。依然是有人护送，依然是走得飞快，有记者欲上前采访，徐银忠也想说两句话，无奈护送者示意他不要发言。于是，徐银忠被搀上银色宝马车，屁股大概还没有坐稳当，车就呼一下开动，飞也似地驰离了现场。

第三位中奖者邹丽华戴一幅墨镜，表情沉静，无言无语。同样是前掩后护，左遮右挡，匆匆出场，匆匆上车，匆匆离去。

主办方事前曾宣布中奖者会统一离场，而实际上是抽一个，颁一个，开走一个。离开方式的临场改变，搞得记者们措手不及。也给笔者这样的感觉：好像不是中大奖、颁大奖，而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怕人追及，赶快一“逃”了之。

事后，面对媒体，三位中奖者都说了感谢这个、感谢那个的话。其实，他们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刘亮。没有刘亮的登高一呼，也就没有这个重抽宝马的机会。

宝马彩票案使刘亮成了名人。名人的私人空间与其声名的成反比：名声越大，私人空间越小。对一般人来说，谈恋爱呀结婚呀做一件什么事呀，除了有限的亲戚朋友师生同事外，没有更多的人关心。名人就不一样了，名人的大小事情，甚至打个喷嚏放个屁，都会被人关注。

刘亮原在一家超市当保安，案子出来后辞掉了。那么，事情过后，他会干什

么呢？这个问题也成了众人关心的“问题”。

5月上旬，刘亮曾对记者讲：“事情过去后，我想上学。”为什么呢？因为事发后，接触到了许多有文化的人，刘亮觉得自己在待人接物方面，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感到自己的知识相当贫乏，毕竟只是初中毕业嘛。而这一点此前根本没有感觉到。因此，他决定在事情平息后，“将中断的学业继续下去”。

上什么学呢？上中专，学一个与记者职业相关的专业。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呢？“当一名摄影记者呀。”刘亮说。这是一个理想了，这个理想，在买彩票之前，刘亮的脑子里是不曾有的。案件发生后，刘家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各种媒体的记者，这些记者有专门写的，有专门拍的，专门拍的都随身带着摄影机或摄像机。这便使刘亮对摄影记者这个行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咱目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文字记者要求高，咱达不到，摄影记者就相对容易些，加上这一段时间从社会各个层面来访者身上学到的一些知识，上个中专学校应该不成问题吧。”刘亮说。“先学习一下与记者职业相关的专业，然后通过和自己熟悉的记者朋友，要么在电视台，要么在报社找个摄影记者的活，专干些打抱不平的事。”

有了这样的念头，刘亮的眼眸，就常常落到记者们手中的“长枪短炮”上，一有机会，就凑上去看一看，问一问；或征得同意后，拿到手中玩一玩，学习着拍上几张。

过了不到一个月吧，刘亮的主意又变了，不想当摄影记者了，理想变成了“参军守边防”。原因是“记者这个职业太辛苦也很专业，我怕我干不了，”刘亮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觉得我还是干别的事比较好，比方说去参军，像哥哥那样全副武装保家卫国，也算是回报国家和整个社会这段时间对我和家人的关爱之情。”

“我家长年住在解放军二炮工程学院旁边，看着军人穿着绿色的军装，我感到非常威风。另外，我爸在二炮干休所上班，我哥也在湖南当兵，我想和我哥一样。其实，去年我就差一点当了兵，人家部队已经接上我了，把衣服都发到我手里了，只是因为年龄差一岁，加上服役地点在新疆，家里也有点嫌远，没有同意。要不去年我就和我哥一起走了。”

对儿子的心愿，刘耀利也表示支持，他说：“亮亮还是个孩子，如果去了部队，能经受严格的锻炼，能早点成熟起来，另外，在部队也能学门手艺，这对文

化水平不高的亮亮以后在社会上生存很有好处。”

人生常有“打算进这个房间，却进了那个房间”的事。等不到秋冬征兵季节的到来，新的工作就向刘亮招手了。7月中旬的一天，浙江吉奥汽车公司就刘亮出任该公司形象代言人事同刘亮草签了一个协议。7月22日，刘亮抵达杭州。在吉奥公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刘亮：“为什么会答应吉奥公司的要求？”“因为他们很有诚意！”刘亮回答得很干脆。的确，吉奥公司提出的培训计划是很有诱惑力的。刘亮相信，这些计划的实施，能使自己掌握一定的技能和技术，多一些谋生手段，对今后的工作有好处。

宝马彩票案水落石出之后，不少企业看中刘亮的名人效应，希望刘亮能成为他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这些公司涉及教育、通信、汽车、医药、房地产等行业，有陕西的、也有外省的，他们或派人登门造访，或来信来电商量。

6月18日午夜12点，吉奥汽车公司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陈喜慧接到了公司大老板——董事长缪雪中的电话。电话中，缪董事长讲了他做出的让刘亮做公司形象代言人的决定，说刘亮在宝马彩票案中表现出来的执着、不畏艰难的精神，正好与吉奥公司的企业精神相吻合。并给她布置了一项任务：尽快和刘亮取得联系。缪董事长原有聘请影视界明星出任公司形象大使的打算，只因入睡前无意中看到央视二套正在播放刘亮的节目，于是“灵机一动”，产生了聘请刘亮的想法。

人世间常有这样的事情，某一个人的“灵机一动”，往往使另一个人的命运发生预料不到的转机。当然，缪董事长的“灵机一动”并非“空穴来风”，他和一个企业家多年来形成的思考问题的角度、行事的作风，以及文化学养等等有关。比如，并非孤陋寡闻的笔者，此前就没有听说过，浙江还有个吉奥汽车公司。

陈喜慧不敢怠慢，第二天就成立了由自己担任组长的“寻找刘亮特别行动小组”，广泛收集有关刘亮及宝马彩票案的相关报道，通过分析，很快找到了一条“捷径”，即通过刘亮的律师毛家兴来找到刘亮。

7月初，陈喜慧女士不远千里，带着一份精心准备的培训计划书抵达西安，与刘亮及家人接触、交谈了几天后，向刘亮发出了诚恳的邀请。——初次接到陈女士的电话时，刘家人心里还有些猜测，因为宝马彩票案中的另一个主角杨永明就是浙江人，所以一听是浙江打来的电话，还以为跟杨永明有关呢。陈女士的真

诚，打消了刘家人的顾虑，遂有签协议、赴杭州之举。

在刘亮去杭州之前，还发生了几件值得写两笔的事情。

一是成都某媒体发表记者采写的专稿，说“因为种种原因和压力，刘亮已经在秦岭深山一小村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之所以到亲戚家，主要是为了保证安全——他在家时除了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记者外，还常有些身份不明的人打听他的下落，而在最近他更听说网上有人说要赌‘刘亮肯定活不过今年’。‘我不怕死，但不能不明不白让自己的生死成了人家下注的东西吧？’刘亮说，在这个山村里找到了安全的感觉，我就在这里住下了，直到秋季征兵再回去报名参军。”还说，“刘亮卖宝马车的钱都借给亲戚们了”。“今后我不想再接受电视台的邀请了。”“一个多星期以前，他应邀到北京去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但从此以后他将尽量不接受电视台邀请，主要原因是花费太多……北京之行刘亮贴了两千多元。”

二是该媒体报道说，刘亮在成都“录制完节目，又接受记者们采访后，已到中午12时许。‘超级女声’选拔赛恰好在电视台举行，刘亮偷偷溜到演播室的舞台边，‘贪婪’地看着穿着时尚的美女一拨一拨从眼前走过。要不是赶着去吃饭，刘亮才舍不得走呢。”当天下午，刘亮在准备赶飞机离开成都之时，还花了十元，买了五注“七星彩”，并得意地说，“成都是个好地方，说不定能给我带来好运气。”

三是在成都录制节目时，路过该市一宝马汽车经销店，刘亮产生了一种冲动。“虽然我曾拥有宝马轿车，却从来没有开过。”随后，经过协商，刘亮亲自驾着宝马轿车行驶了一百多米，虽然时间和距离都很短，但给刘亮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事后，刘亮挠着脑袋对记者说：“我真有点后悔当初卖了宝马。”

对上述报道，刘亮及家人认为有失实之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刘亮对《三秦都市报》记者说，上个月底去长安区，是去看舅爷爷，只住了两天，根本不是“过起了隐居的生活”。7月15日，刘亮应成都一家电视台的邀请，为该栏目做一期谈话节目。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录制节目，顺便在成都玩两天，但根本不是报道上称的“看美女”。

对此，刘亮父亲刘耀利称他看到这些报道很伤心，“该报纸在没有得到任何许可的情况下，随意捏造事实，引起许多网民和媒体的猜测，对刘亮的身心造成

了伤害。……现在刘亮的舅舅和我们已渐生隔阂，原来经常给刘亮打电话，目前好几天没打了。目前我们正在与该媒体联系，如果他们没有明确的答复，我们将考虑向法院起诉该媒体。”

对刘家提及的报道失实问题，笔者的观点是不必过分计较，把真相说明就可以了，因为从全文的倾向性来看，报道者并无恶意。——你说我“隐居”，我频频地在电视上出现，那说法便不攻自破；你说我“看美女”，且不说我没看，就是看了，又有什么了不起？难道美女不是人看的？七老八十的人都会对美女产生好感，何况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笔者觉得，刘亮及家人倒应该重视另外一些意见，请看下面几段话——

“……刘亮出名了，刘亮发财了，这件事情无论怎么说，都会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刘亮的生活，说严重点，很可能会影响他一生，甚至他那个家庭或家族的命运。可这财发的，总让人觉得不那么欣然。可能大家还记得一个老电影吧，好像是英国的，片名叫《百万英镑》，大意说的是两个富翁打赌，一个说给一个穷人一百万就能让他过上真正的百万富翁的生活，另一个好像不认可，于是就找了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流浪汉当赌具，这个流浪汉一下拿到了一张一百万英镑的支票，成了一个‘真正’的百万富翁，可这个百万富翁却处处闹笑话，处处遇尴尬，喜剧色彩的背后透出的是人世间不尽的悲哀。我担心这辆宝马会成为那张支票……”

“……相对中年以上的人来说，刘亮其实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孩子凭着自己的执着、勇气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于是有人就说，刘亮了不起，刘亮是英雄，也有人说要给刘亮颁个奖，弄个杯什么的。可以肯定，这件事对刘亮的影响很大，但是，谁能保证这种影响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如果这种影响是消极的、负面的，那么我就要问一句了，坏事毁人是坏事，好事毁人难道就不是坏事了？……”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个曾经因为骑摩托成功地飞越黄河而成为英雄的小伙子，还有那个曾经荣获过很高荣誉的缉毒英雄，这两个人不同，一个是商业炒作出来的名人，一个是国家、政府承认的杰出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却相似，最后都身陷囹圄，而他们所代表的恐怕也不是个别现象。迷人的光环，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刘亮原本要的，恐怕也并不是公道之外的东西。”

这是一个署名“偶尔喝多不算坏”的网民，在某“论坛”上发表的言论。话说得有些重，但出发点是善意的，读得出一颗拳拳的忧虑之心。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应当重视，但也不必为此而惴惴、而惶惶。人生在世，得意忘形，骄横跋扈固然不可取，但过于谨小慎微、诚惶诚恐也未必是好事，一个人如果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活着，那他的日常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对于休咎福祸，笔者曾提出过“两受说”，即坏事来了能承受，好事来了能享受，如果能在苦难中享受到快乐，在快乐中警惕着苦难，那就是比较高的境界了。

（成稿于2004年7月至9月。《海南日报》以《宝马彩票案全调查》为题连载七十期（2004年8月27日至2005年2月15日）。《太原日报》以《古城宝马奇案》为题连载八十期（2005年1月20日至2005年5月25日）。

## 后记

2004年3月，西安宝马彩票案初发生的时候，我和周围的人们一样，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惹眼的新闻事件而关注，并没有想到写点什么。到了该案件基本尘埃落定的2004年7月，在和文学界的一位老同志聊天时，老同志说：“宝马案是纪实文学的好题材，庞进你在报社工作，眼界宽阔，采访也方便，何不花点时间、下点功夫写一下？”我说：“自该案件暴发以来，众多的报纸、电视台、网络媒体都在跟踪，报道已很充分了，还有必要再写吗？”老同志说：“报道是很充分，但大多是新闻的角度，你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写得再细一些、全一些，挖得再深一些，多揭示些这个事件背后的东西，提供一个让人们作进一步思考的文本。”我想了想，采纳了老同志的建议。

于是，放下手头正在做的事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的报道、图片、资料，采访相关当事人，然后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分析、思考、敲字，写成了这部约17万字的书稿。

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刘亮家人的大力支持，刘亮的父亲刘耀利将杨永明写的《说明》、刘家人向媒体提供的《声明》、刘亮写的《详细过程》《控告信》等原始文件提供给我，对我提出的问题也是有问必答。记得那次采访结束告别时，刘耀利让妻子“给庞老师装几个馍”，我谢辞说“不用不用”，刘耀利说“自家的新麦面蒸的，你尝尝，跟你在街上买的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我将馍带回城后，尝到了关中农家馍特有的那种爨（cuàn）香，当然，也品味到了刘家人纯朴的情谊。

此书稿，《海南日报》以《宝马彩票案全调查》为题连载了七十期（2004年8月27日至2005年2月15日），《太原日报》以《古城宝马奇案》为题连载了八十期（2005年1月20日至2005年5月25日）。这次以《西安宝马彩票案》为名，作为《庞进文集第三卷》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出版发行。

这里，谨向本书涉列到的，关于当年此案的报道采写者、图片拍摄者、资料提供者致谢！

时间已过去二十个年头，当年不满十八岁的刘亮已人到中年。其他与该案

相关的人士，自然也都会变化多多。

对地球人而言，大凡地球上发生过的影响较大的事件，都有一看再看的价值，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这本书与你有缘，你能从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出些新意，并能引发你一些思考，作为本书作者，就感到欣慰了。

庞 进

2023年7月1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